

# 决策参考

- ★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笔谈）
- ★ 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
-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重审学科本质及其演化规律
- ★ 高等教育研究的重新定位
- ★ 破“五唯”立新规：教育评价改革的本体追求与成本约束

2022年第2期

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申请博士  
学位授权单位工作办公室）

主办

#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要求，为我们实现学校“十四五”时期擘画的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今年10月，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开展了第二轮省级“双一流”建设方案编制工作，学校编制完成了《宝鸡文理学院“双一流”建设高校整体建设方案》《宝鸡文理学院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宝鸡文理学院拟建设省级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同时，要深入落实《宝鸡文理学院关于加快推进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宝文理院字〔2021〕125号）文件精神，按照“3+2”博士学位授权拟建设学科建设规划，全力推进新增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双一流”建设方案的实施和博士授权学科建设等工作，迫切需要积极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以高质量学习教育成果引领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本期《决策参考》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学科建设、“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研究、教育评价改革、教育资讯等六个方面遴选了相关内容文章，帮助大家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究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以期提高政治站位，开阔理论视野，深化思想认识，拓宽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力求工作实效。真诚希望各位读者深入学习，认真思考，结合实际，推进工作，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推动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而团结奋斗！

联系电话：0917-3566128，电子邮箱：bw1fgc@163.com。

# 决策参考

2022 年刊  
(总第 24 期)

主办：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申  
请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工作  
办公室)

责任编辑：孙宏健 赵林记

本刊地址：宝鸡市高新大道 1 号  
宝鸡文理学院高新校区  
服务楼 420 室

邮政编码：721013

电子邮箱：bwlfgc@163.com

电 话：(0917) 3566128

## 目 录

<b>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b> .....	1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笔谈) .....	1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	24
<b>学科建设</b> .....	27
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 .....	27
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及其路径优化 .....	43
<b>“双一流”建设</b> .....	63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重审学科本质及其演化规律 .....	63
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	82
<b>高等教育研究</b> .....	87
高等教育研究的重新定位 .....	87
面向 2030 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	109
<b>教育评价改革</b> .....	115
破“五唯”立新规：教育评价改革的本体追求与成本约束 .....	115
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 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 .....	138
<b>教育资讯</b> .....	14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 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	146
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领学科专业目录调整 .....	153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笔谈）

### 高等教育要支撑引领现代化强国建设

杜玉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思想深邃、视野宏阔、意蕴深远，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宣示了新时代新征程的庄严使命，给全党以方向和引领，给人民以信心和力量，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政治宣言，是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行动指南。我反复研读、认真学习，令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单独成章进行一体部署，把三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统筹推进，更加突出了教育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更加明确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目标要求，更加彰显了教育是影响国家未来的战略性事业，而非仅仅是社会民生事业的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体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深刻认识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放眼长远看教育，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从以下四个方面发力。

一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建设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就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体系，是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体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系，是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是体现公平而有质量的体系，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体系。这六句话概括起来，从根本

上讲，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 新发展格局需要的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将会在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两个方面，促进高等教育发生格局性的变化，赋能教育强国 建设。

二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我们要重视“破界”思维能力培养，鼓励学生关注本质、打破局限，开展更有价值和战略性的创新，培养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杰出人才。要夯实基础学科能力素养，在“强基计划”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2.0”基础上，扎实走好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要统筹基础学科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成长所需的不同营养元素，做到因材施教，将两者的共性需求相结合，在面向国家战略的实战中磨砺意志、训练思维、锤炼能力，探索建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范式。

三是发展素质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素质教育提出 20 多年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看各地区成效不够平衡。说到底，是立德树人的要求没有完全落实到体制机制上。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发展素质教育”。我们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教学规律，把知识传授、素质提升、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融为一体，深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互促的培养模式改革，构建家庭 学校 社会教育协同育人体系，加强学校德智体美劳教育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形成“五育”并举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家庭、学校、政府、社会四个主体都要坚持“五育”并举，形成育人合力，同心同德、同向同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贡献。

四是促进教育公平。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我们要厚植人民情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要加快建成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努力使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要不断完善教育公平政策制度体系，创新区域教育发展体制机制，以推动教育信息化、数字化为引领，进一步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深入推进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高校招生向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着力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等教育是促进社会进步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我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等教育一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契合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贡献度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为加快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质赋能、贡献力量。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 **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撑作用 全面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姜治莹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列为专章进行整体论述、作出整体部署，并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一步彰显了党中央对于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高度重视，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在现场聆听后，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如何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杜玉波会长提出，要从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四方面发力，我非常赞同。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科技创新的重镇，是服务发展的源泉，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理应坚决扛起光荣使命，充分彰显高校担当，奋力谱写崭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具体而言，我认为，要把握“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是要用创新理论引领学生。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让学生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二是要用时代价值教育学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管理体系各方面，使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三是要用优秀文化感染学生。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启迪思想、浸润心灵、熏陶品行，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笃定前行方向，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第二，坚持“四个面向”，勇攀科技高峰。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一是要聚焦国家需求。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的核心关键、国家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进一步强化有组织科研，切实担负起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推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重任。二是要聚焦原始创新。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加大对学科交叉的扶持力度，紧密围绕“卡脖子”技术问题，不断强化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实现更多“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突破成果。三是要聚焦成果转化。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难题，从科技创新中寻找解决方案，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和高水平科技赋能，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与产业发展链条，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打造人才高地。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完全能够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一是要注重平台牵引。依托和打造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科研平台，用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吸引人才、培育人才，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造就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备军。二是要强化基础研究。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自主培养，突破常规，创新模式，更加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加大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三是要营造良好环境。尊重人才、尊重知识，鼓励创新、鼓励合作，允许失败、宽容失败，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规律，优化人才评价体系，为人才“减负松绑”，努力让人才享受良好待遇、获得最高礼遇、拥有发展机遇。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当前，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前所未有，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前所未有，这是我们的荣耀，更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坚守初心使命，潜心立德树人，矢志科研创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高等教育的智慧和力量。



## 勇担高等教育使命 奉献教育强国蓝图

杨振斌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是承前启后、再铸辉煌的一次盛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高屋建瓴、大气磅礴，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是指引中国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报告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专门作为一个部分，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目标，这充分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决心，让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报告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8年3月于全国两会上和广东省人大代表座谈时，就提出了“三个第一”：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因此报告所提到的“三个第一”，应当是基于总书记所强调过的“发展是第一要务”这一基本共识之上的。我认为，为了坚持和发展好这“三个第一”，我们要有“教育是第一根基”的强烈责任意识。因为科技、人才、创新都要基于教育，教育质量提高了，我们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拥有更加强有力的支撑。这是高等教育的历史使命，中国大学特别是“双一流”建设高校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全面开创新时代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贡献力量。

一是加快培养创新人才，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靠什么样的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大学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责任使命，不遗余力地把育人为本作为学校的战略选择，将“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建设、人格养成”融为一体；强化因材施教，分类发展，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得到最适合的教育、实现最大程度的增值；整合多学科知识体系，优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真正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厚植家国情怀，强化就业引导，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鼓励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是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将创新摆在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近10年来，高校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作为科技创新主力军的作用日益彰显。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进一步主动面向世界前沿，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聚焦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的重大理论和应用问题，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坚持立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统推进有组织的科研体制机制探索；胸怀国之大事、聚焦国之重器，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和服务国家决策能力，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三是加快推进内涵式发展，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在“双一流”建设的支持下，国内一批高校在可比指标上已经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从“数量积累”到“以质为先”；继续创新发展模式，

改进大学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将之内化为广大师生的自觉行为，转化为促进事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为人类文明进步、国家繁荣富强、丰富和引领世界高等教育作出中国大学独特的贡献。

##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建设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世界一流大学

郭新立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是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把“教育、科技、人才”专章 阐述，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体现了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战略部署。

国家的强盛需要世界一流大学来支撑；而国家的强盛，又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最根本条件。高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必须要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是坚定道路自信，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之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中国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立足点。要立足中国国情、回答中国之问，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办学范式，紧扣时代脉搏，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把党和国家事业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

迫切需要变成践行初心使命的实际行动和突出成效。

二是坚定理论自信，切实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办学治校的“金钥匙”。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告诉我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和取得辉煌成就的根本遵循、根本保证。山东大学改革发展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深刻感悟思想伟力，不断增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金钥匙”指导办学治校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新征程上，要不断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思想解放、理念更新，奋力谱写高等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三是坚定制度自信，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征程上，要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制度自信，加快完善以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持续把制度优势、治理效能转化为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发展动能。

四是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世界一流大学提供精神滋养。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征程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自觉自信，着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持续将文化自信转变为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不竭动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彰显强教育、强科技、强人才的时代担当！

## 全力打造“五位一体”立德树人体系

李元元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擘画了未来发展蓝图。我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报告，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同时作为一名高校管理者，更是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高度重视。华中科技大学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一盘棋”系统理念，积极探索形成各领域同题共答、各环节同向发力的育人工作机制，扎实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地落实落细，着力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一是深刻把握立德树人体系的科学内涵。构建系统完备的立德树人体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要深刻理解这一体系的科学内涵。首先，构建立德树人体系是推进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大学建设和管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构建立德树人体系，就是从顶层设计入手，致力打好人才培养“组合拳”，提升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其次，构建立德树人体系是深化高校育人工作改革创新的有效载体。构建立德树人体系，有助于破解制约立德树人成效的体制机制障碍，理顺权责关系，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面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取得良好育人效果。再次，构建立德树人体系是运用系统观念推动工作的具体体现。立德树人涉及学

校教育和人才培养各个环节，需要制度、评价、资源等方面的协同配套，只有以整体的眼光看待问题，系统设计、全面推进立德树人体系构建，充分调动全域、全员的育人积极性，才能实现整体效应最大化。

二是加快构建立德树人的完备体系。立德树人体系建设的基点是将立德树人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融为一体，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以制度为保障。在实践中，我们探索构建了“五位一体”立德树人体系，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和各环节，培养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知识教育体系，以“厚实基础、关注前沿、科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指导理念，注重打牢学科和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用高水平科研成果支撑和反哺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培养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为抓手，打造创新人才培养特区；实践能力教育体系，以实验教学和工程实训为重要内容，提升学生实践技能和动手能力；综合素质教育体系，通过打造高水平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学术讲座，培养既有科学精神又有人文素养的高素质人才。这五个方面彼此相顾，一体贯彻，成为相互贯通、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整体，是华中科技大学培养卓越人才具体实践的结晶，也是开展一流大学建设的具体行动。

三是不断完善立德树人体系的保障机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不仅需要育人体系的升级调整，也需要保障体系的协同跟进。高校要打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过程中存在权责不匹配问题，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进行条件保障和资源分配的配置部署。各项保障机制包括制度供给体系、资源分配体系、教师管理体系、服务提升体系与评价支持体系。制度供给体系旨在系统梳理并调整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相适宜的制度举措，提供良好的育人制度环境；资源分配体系意在根据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配置资源，以目标定任务，以任务配资源，将立德树人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院系年度考核和教师收入分配的重要标准；教师管理体系

重在引导教师回归育人初心，争做教书育人的大先生和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服务提升体系意在提升管理人员的服务育人意识，为立德树人和人才培养保驾护航；评价支持体系旨在破立并举，将立德树人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教师职务晋升、岗位聘用、评优评先以及院系考核和干部任用的重要标准，通过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激发和引导关键主体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加快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 为引领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贡献重大力量**

舒立春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重庆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高瞻远瞩、气势磅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现场聆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催人奋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在过去党代会报告中，科技一般安排在经济建设中，教育一般安排在文化社会民生建设中，人才安排在党的建设中，如：十二大报告第二部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高涨”中在明确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后强调“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十三大报告第三部分“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第一点“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十四大报告第二部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第四点“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十五大报告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提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六大报告第六部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第四点“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十七大报告第八部

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第一点“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十八大报告第七部分“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第一点“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第一点“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这一次把三大战略摆放在一起，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列在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二顺位，充分体现了教育是党之大计、国之大计的根本战略思想，教育支撑人才，人才支撑创新，创新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

我们要强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理念，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充分结合起来，推动高等教育体系与人才体系、科技体系、产业体系等高效对接，与时俱进为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二要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发挥高校汇聚人才高地、培养人才基地作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完善人才选育管用全链条体系，培养和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等。以造就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为目标，促进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助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

三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要与学科前沿、产业发展紧密结合。以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坚持“四个面向”，瞄准高峰、基础、前沿、新兴、交叉，强化有组织创新。弘扬科学家精神，全方位营造创新氛围，引导科研人员“揭榜挂帅”，产出



标志性转化项目，全面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

四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地处西部地区，重庆大学要深度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加速汇聚高质量创新资源，不断提升对国家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努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作出重大的贡献。

## 扎根中国大地 服务重大需求

### 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苏大新篇章

江涌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鲜明、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全面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描绘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贯穿了历史方位感、鲜明时代感、强烈使命感。报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历史使命，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第五部分统筹部署，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体现了教育观、科技观、人才观的辩证统一，进一步阐明了高等教育的使命定位和改革方向，吹响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前进的“冲锋号”。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苏州大学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定的历史使命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扎根中国大地，服务重大需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苏大新篇章。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铸魂育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核心使命。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高素质人才队伍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交汇点和关键推进

器，有着促进科技和人才深度融合、协同叠加的独特优势，在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的高水平创新体系中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大有可为。

新时代十年，苏州大学坚持“顶天立地”和“铺天盖地”科技创新战略，不断优化学科布局，持续聚集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孵化前沿性引领技术，以多学科交叉融合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瞄准航空航天、核能开发、辐射防护、高端装备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布局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科技项目，组建科研大平台，开展有组织的开创性联合攻关。学校先后建成放射医学与辐射防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平台，在神光二号和神光三号装置、神舟系列飞船、风云三号卫星、“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问天”实验舱等一系列大国重器的研发中作出积极贡献，相继攻克造血干细胞移植、全磁悬浮人工心脏、OLED照明等关键技术，以“零碳”“负碳”等先进技术研发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同时，学校深度融合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重点产业发展需要，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国家科技创新贡献了苏大智慧。

今后五年，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也是苏州大学“双一流”建设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积厚成势的关键五年。围绕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苏州大学将深入探索有组织科研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高校科技体制改革、推进“双一流”建设的结合机制，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以“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为宗旨，做到“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加强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各要素活力，为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第一，以体制改革完善科技创新体系。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深化从源头、过程、评价到运用的全链条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一是面向人类

文明进步和国家创新发展，找到制约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问题集。二是营造宽松、多元、竞争、有序的科技创新环境，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三是推行以科研团队为基本单元的创新体系，进行科研任务下达、管理和评价。四是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布局，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堵点，构建一体化科技创新体系。

第二，以有组织科研强化科技战略重构。引导科技工作者从单纯“自由探索”向“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有机结合转变。一是研究选题有组织，引导科学家瞄准大问题、发现真问题、解决难问题，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目标。二是研究手段有组织，建立面向重大任务的多领域、跨学科大型攻关团队。“大师+团队”的科研组织方式也是苏州大学近年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关键密码。三是研究平台有组织，发挥一流学科在高水平科技创新中的支点作用，促进优势特色学科与行业产业、区域发展深度融合；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为契机，通过研究院所、高校、企业强强联合，构建国家顶尖科技创新平台。目前，苏州大学与苏州国家实验室已达成初步协议，在材料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解决能源、医药健康、高端制造领域国家重大课题。

第三，以精准培养锻造创新人才高地。一是继续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打响“人到苏州必有为，才来苏大大可为”品牌，面向全球引进战略科学家和青年才俊。二是构建多元化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根据人才特点制定个性化培养路径，为人才发展提供平台、团队、政策全方位服务和支撑，健全人才分类评价和晋升机制，系统构建高层次人才阶梯式发展支撑体系。三是深化校地融合发展战略，就苏州大学而言，进一步推进“名城名校”战略，充分发挥高校和地方的互补优势，实现人才的“共引、共育、共享”，努力建成长三角地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和创新高地。

## 以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支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卢克平

(党的二十大代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专章论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 围绕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等作出全面部署,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认识, 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校是人才培养主阵地和科技创新主力军, 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引领者、主导者和推动者, 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 而人才是第一资源, 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和灵魂, 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创新人才, 创新人才培养离不开高等教育。因此,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 是“基础的基础”“关键的关键”, 居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 高校累计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7700 余万名, 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高校十年来获得了 60% 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 承担了全国 60% 以上的基础研究、80% 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0% 以上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为高铁、核电、生物育种、疫苗研发、国防军工等重点领域提供了关键技术, 有力支撑了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教育强、科技强、人才强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教育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科技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我们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探索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一是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实推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促进跨学科、跨院校以及国际联合培养，扎实推进一流本科教育和卓越研究生教育，着力培养国家未来发展需要、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一流拔尖创新人才。三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科学谋划布局新兴专业和交叉学科。四是坚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组建大团队，打造大平台，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努力产出一批原创性标志性科技创新成果，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五是坚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坚定不移实施人才强校工程，为科教兴国战略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展现“双一流”建设高校的使命和担当。

## 敢闯敢试、敢于斗争

### 争创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示范

骆清铭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海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非常荣幸地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心潮澎湃，倍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大家可能注意到，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章论述教育、科技和人才，充分体现了党对教育事业、科技事业、人才事业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也更加突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作为教育和科技工作者，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还系统地讲明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项事业的逻辑关系，为高等教育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大学既有人才培养的基本功能，也有科学研究的基本功能。一流科研是一流学科、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也是现代大学实现人才培养功能的关键途径。今天，我也结合我工作的海南大学近年来改革创新实践，从大学育人层面谈谈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之间的关系。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明确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作为大学，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一流的人才，首先要有一流的老师，而大学的特点决定了一流的老师必须参与一流的科学研究。

一是坚持“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围绕大学“育人”的核心任务，海南大学全面推行完全学分制改革、建立书院制育人模式、组建协同创新中心，构建“三大改革”个性化协同育人体系。完全学分制改革尊重学生个体的独特性，充分发掘学生潜能，允许每个学生定制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具有较强综合能力、分析理解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书院制育人体系能较好地解决新时期大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不均衡、师生交流不充分、个性化培养不突显的育人局限，做到“正业”与“居学”有机融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相得益彰，有效拓展学生成长的场域，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随着三大改革的持续深入推进，学校的吸引力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比如，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达到45个，绝对数位列全国高校前50；2022年，普通本科录取各省排名前10%的考生占比较2018年提升27.4个百分点，达到62.82%；学生团队获得“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冠军、首次问鼎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最高奖SIAM奖等。

二是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求贤若渴、不拘一格，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作为一所地方高校，我们深切认识到学校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依靠人才。为此，自2018年以来，我们借助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东风，在教育部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围绕学校人才引进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三年多来，海南大学全职引进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943人，占全校专任教师总量的1/3以上；国家级人才数量由5人增加到47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翻了一倍多，占教师总数的比例提升了22个百分点。人才聚集对学校学科发展的推动效应也逐步显现，学科学术影响力和贡献能力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的学科由2017年0个增加到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由2017年的5个增加到14个（含1个专业学位博士点）；上榜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行榜的学科，从2018年的7个增加到2022年的17个，其中法学学科进入前10%。

三是坚持“通过一流科研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斗争精神，并对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出深刻阐释，提出“加强干部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养成”“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敢于斗争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也是干事创业的精神密码。在大学育人和科研中应如

何发扬斗争精神？首先，要把优质科研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通过一流科研培养一流创新人才，要让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在纯粹的科研氛围中、在承担科研任务的过程中练就真本领、求得真学问。其次，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最高追求，面向海南自贸港发展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目标开展有组织科研创新。海南大学将继续围绕“自贸港发展和制度创新”“生态文明”“文化旅游”“南繁与热带高效农业”“海洋科技”“大健康”“信息技术”七个协同创新中心，打造高水平人才培养平台与高质量科研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最后，要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立志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海南大学瞄准南繁育种这一国家战略需求，在国家南繁基地核心区建立三亚南繁研究院，聚集 257 位高水平科研人员，取得突破性成果。首批 53 名科研人员加入崖州湾实验室，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这些“斗争”的基础上，学校科研水平不断走上新台阶，2022 年，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批立项 212 项（其中重点项目、优青项目等 12 项），较 2021 年同期增加 62 项，增幅在获批数量前 50 名高校中排名第二，较 2017 年增长 165%。

海南大学正在与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国家战略同频共振、同向同行。未来五年，海南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殷切嘱托，以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和支撑引领海南自贸港发展的一流大学为目标，发扬敢闯敢试、敢于斗争的精神，坚持扎根海南大地办教育，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努力在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新征程上有所作为，蹚出一条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力争成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的示范。



## 加强党的领导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郭 健

（党的二十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监事会监事，河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作为党的二十大代表，我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作的大会报告，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彰显了党中央对教育科技事业的高度重视，突出了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赋予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的历史责任与光荣使命。我谈三点体会。

第一，高等教育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是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定海神针”，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高教战线要牢牢把握党对事业的领导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河北大学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把学校党委建成“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全省率先实现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全覆盖，率先实现有本科生的23个学院二级纪委全覆盖，率先实现新时代高校党建“双创”示范高校、标杆院系、样板党支部、“双带头人”工作室全覆盖，并培育创建4个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形成落实党的领导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工作格局。

第二，高等教育必须全面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高教战线要牢牢把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一主线，“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保证高校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河北大学在全国高校首倡“滴灌”育人理念，把先进灌溉技术转化应用到思政教育全要素、全过程、全领域，坚持精准集约、主动介入、打通堵点、通达根系，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三全育人”理念、方法、体系，在青年学生人生“拔节孕穗期”浇花浇根、育人育心。

第三，高等教育必须全面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去十年，我国高等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建成世界最大规模高等教育体系，在学总人数超过4430万人；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8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高校承担，高校获得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高教战线要充分认识到在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中的职责使命，坚持“四个面向”，服务“国之大者”，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展现更大作为、作出更大贡献。河北大学过去五年紧抓“部省合建”战略机遇，引进各类高端人才540余人，打造了一支以中科院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五类人才兼备的高端人才队伍。依托燕赵文化、生命科学与绿色发展两大学科群，聚焦雄安新区历史文化挖掘保护、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等重大现实问题取得标志性成果。河北大学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更加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再立新功。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第1-10页。

#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刘涪祯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4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战略性要求，为其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构科学权威、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发挥其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目标引领与动力催化作用，对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问题、成因与影响

“五唯”评价体系盛行是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最大症结。在“学术 GDP”管理理念下，以计量为特征的学术评价盛行，造成了大批低水平论文发表，浪费了大量学术资源，扰乱了学术生态。

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上世纪末我国开始引入国际评价标准。第一，20 世纪 90 年代，国内自然科学基础尚且薄弱，既缺少统一标准，也缺乏国际影响力。个别大学将科学引文索引（SCI）引入理工科教师的科研评价与学生的博士学位评估，国内大学纷纷效仿。进入新世纪，这种计量方式蔓延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挥棒”。第二，依据各类世界大学排名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这些排行榜的标准是欧美科研数据库，其最大的特点是重论文数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五唯”评价导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愈演愈烈。

引入国际评价指标体系使哲学社会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但这种计量评价方法的弊端也不断凸显。一是缺乏本土的概念、体系与方法，缺乏文化自信。二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三是由于世界大学排行榜“重理轻文”，哲学社会的重大作用没有充分彰显出来，易误导大学办学方向。

## **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成为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重大命题**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迫切需要本土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有什么样的目标导向、制度机制和价值追求的评价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质量与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目的在于有效配置学术资源，促进良好的学术生态建设，营造富有活力与创新力的学术文化。这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命题。

第一，牢牢把握政治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助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做到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二，更好地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哲学社会科学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学科建设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学者要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本事。

第三，坚持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构建本土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研究方法，一种是纵向的历史分析，一种是横向的国际比较，两者缺一不可。

第四，做到科学分类评价。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众多，各学科之间差异性较大。根据各学科体系特点，分类制定符合其发展特征的评价体系，才能保证评价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建构要点

2022年年初，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方案要求，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强调优化管理评价体制。一些大学不再向世界大学排名榜提供数据，迈出打破世界大学排名榜“风向标”的第一步。有“破”也要有“立”。新形势对于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提出了紧迫要求。

首先，评价目标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知识、理论、方法的创新，坚持政治论与知识论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解决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其次，评价主体以同行评价为主。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观性较强，应以同行评价为主、计量评价为辅，秉持多元评价主体原则。此外，重视同行评价动态调整机制，这对于跨学科研究尤为重要。

再其次，评价客体涵盖不同形式的学术科研成果。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多样，包括论文、专著、教材、研究报告、咨询报告、主题汇报、非纸质出版资料等。近些年，一些高校将微信公众号阅读量“10万+”作为成果认定形式之一，这是拓展评价客体的探索，当然，认定质量有待进一步检验。

最后，评价标准分级分类，更加强调原创性指标。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种类众多、差异性大，评价标准与指标应结合学科自身特征有所区别。此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有不同的特点与要求。评价基础研究，侧重科学性与原创性。评价应用研究，侧重适用性与转化性。评价综合研究，两者均需兼顾。

作者单位系江苏开放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22年11月24日理论周刊栏目。



## 面向未来的高校学科建设

刘献君

**摘要:** 学科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面向未来, 加强学科建设, 要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 探寻学科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 特别要注重目标提升, 要素优化, 过程融合。目标提升中重点把握, 学科及学科方向选择要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发挥学科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要素优化中重点把握, 学科带头人要成为战略科学家; 建设高水平学科平台。过程融合主要体现在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城校融合。

**关键词:** 面向未来; 学科建设; 目标提升; 要素优化; 过程融合

学科是知识的划分, 是在社会发展、学科建设中创造出来的, 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学科既包括知识领域, 又包括组织建制、学科文化。学科制度化曾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的知识生产。学科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面向未来, 加强学科建设, 要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 探寻学科建设的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

### 一、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里的“宗”是指宗旨、目的及事物的基本性质和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 对一个概念的理解是无限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 我们认识一个事物总是从局部开始, 然后再到全局, 这有一个过程; 另一方面,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 其概念也在发展变化, 需要不断加深理解。面向未来, 加强高校学科建设, 要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

## （一）学科、专业、课程及其相互关系

学科、专业、课程是高校建设发展、人才培养中三个最核心的概念，但在学校建设、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往往关注不够。面向未来，加强学科建设，仍然要把握三者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什么是学科？《汉语大词典》把学科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或指学校的教学的科目。”<sup>[1]</sup>在英语里，学科被称为“Discipline”。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R·克拉克认为：“学科明显是一种连接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形式。它按学科，即通过知识领域实现专门化。”<sup>[2]</sup>简言之，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什么是专业？专业有学业与职业之分。高校的专业与职业有联系但不是职业。我国《教育大辞典》称专业为“高等教育培养学生的各个专门领域。”《国际教育标准》称之为课程计划（Program）。英国高校称之为主修（Major）。通常学者们将专业解释为“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

什么是课程？课程是由一定的育人目标，特定的知识经验和预期的学习方式构成的一种动态的教育存在，是为实现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而规定的所有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主要体现在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中。简言之，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

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学科与专业是一个非常接近的概念，因而人们常常将这两个概念相混淆。学科、专业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具有人才培养功能，都与一定的知识相联系；学科是专业的基础，专业是学科的应用。其区别主要表现在：①从结构上看，专业的构成要素是课程，学科的构成要素是知识单元；②从发展过程来看，专业发展的核心是教学，学科发展的核心是科研；③从发展动力来看，专业发展的动力是一元的，即社会需求，学科发展动力是多元

的，如社会需要、学者好奇心等；④从形成过程来看，新学科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与完善，而新专业的设置主要取决于学者对该专业社会需要的价值判断<sup>[3]</sup>。

课程与学科、专业的关系。课程与学科、专业关系十分密切，简言之，学科是课程的构成内容，课程是专业的构成要素。放在更大范围来看，课程体现了三个“结合点”：课程是学校和社会的结合点，社会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反映到学校，要通过课程来实现；课程是学生和学校的结合点，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课程，课程达到要求，学校则发给其毕业证书；课程是教学和科研的结合点，教师在科研中取得的成就，只有通过课程才能对学生产生作用，实现教学和科研的结合。

## （二）学科发展的动力

学科建设是指学科主体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学科发展的规律，结合自身实际，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由此可见，和任何事物发展需要动力一样，学科发展同样需要动力。这是学科建设的前提性问题。与专业发展不同，学科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主要有内动力和外动力。内动力是学科逻辑自主发展规律；外动力是指社会需求<sup>[4]</sup>。

首先，学科发展的内动力。学科发展的内动力表现在学科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学科发展在科学实践、科学理论以及两者之间的内部矛盾运动中实现突破。在实验层次上，新的实验工具和方法，导致新的实验结果和发现。如显微镜的发明，改变了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仅局限于用肉眼所看到的東西，导致了人们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更新，更促进了微生物学等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在理论层面上，表现为假说大胆提出和不断更新，逻辑的内在演绎与展开，以及理论自身内在逻辑统一性的探索 and 追求。如德国科学家魏格纳躺在病床上，从世界地图上发现大陆轮廓的吻合性，因而大胆地提出大陆漂移假说，后来的论证，支持了大陆漂移说的成立。



学科之间由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循环运动引导着学科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形式有三种：同一学科在不同时期发展不平衡；同一学科在不同国家发展不平衡；同一时期不同学科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学科就是在这种由不平衡-平衡-不平衡往复运动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

学科的交叉、综合性特点促进学科发展。学科发展经历了“高度综合-高度分化-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的过程。学科之间日益交叉、相互渗透、融合生长，并通过知识对流、模式组合、方法碰撞等，形成学科的协同共生效应，即：综合效应、交叉效应、综合交叉效应。学科的交叉、综合，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其次，学科发展外动力。学科发展的外动力表现为社会需求。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高校与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学者研究指出，大学 3/4 以上的变化，起因为社会。高校一方面受社会系统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需求对高校学科发展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表现在来自国家需要；另一方面还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文化发展、军事竞争等对学科发展的需要和对学科建设所起的作用。

### **（三）学科建设的主体**

学科建设的主体指对学科、学科建设有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机构和个体。学科建设的主体不同，所肩负的任务不同，在学科建设中的定位不同，实践建设的内容、方法不同。从总体来看，学科建设的主体主要有政府、高校、科研机构。本文讨论高校学科建设，因此，仅仅探讨以高校为主体的学科建设。

高校内部有不同的学科建设主体，但主要是学校和基层学科组织。两者各有自己的任务，在学科建设中要找准自身定位，明确建设任务和内容。

首先，学校层面的学科建设。学校层面的学科建设依靠学校领导和相关职能部门，其主要任务体现在目标、结构、重点、资源、评估等方面。

①目标。目标是对活动预期结果的设想。目标是方向、动力。高校学科建设的目标，就是对本校学科建设预期结果的设想，指学科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

②结构。结构是事物的存在形式，一切事物都有结构，事物不同，其结构不同，而且结构决定功能。从高校一般的学科结构来看，有单科、多科、综合，首先要确定本校追求的学科结构是单科、多科还是综合。但还不能就此止步，还要细化本校的学科结构，如同济大学的建筑、汽车、生物学科三足鼎立。

③重点。重点指某一类事物中核心的或重要的部分。

④资源。资源是指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资源可以划分为三类：基础性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性资源包括知识、政策、市场；衍生性资源包括理念、文化、制度。资源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高校与社会互动与交换的载体。高校学科建设中重视资源，包括资源获取、资源配置和资源转化三个方面。资源获取即争取和创建学科建设所需经费、项目、实验基地以及人才等。资源配置即学校根据学科建设需要配置资源，特别是如何保证重点。资源转化是资源在个体发展、组织发展、社会发展中的创造。资源转化有结合型转化、结构型转化、认知型转化等多种路径。

⑤评估。评估是指评价、估量与测算。学科评估是对学科建设过程和成果的评估。学科评估的类型包括：鉴定评估，即对政府、学校立项的学科建设项目以及对学位授权点进行评估考查；水平评估，即对学科发展水平的评价；选优评估，如评选国家、省级重点学科，进入“双一流”建设中的一流建设学科选拔；绩效评估，即以学科建设的投入与产出比来衡量学科建设的成效。学科评估的内容包括：人才培养评价、教师队伍建设评价、科学研究评价、社会服务评价、文化传承创新评价、国际交流合作评价等。学科评估的组织与实践可以采用多种方式。

其次，基层组织层面的学科建设。基层组织层面的学科建设，主要指学科点建设，即某一个学科的建设。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科方向建设、学科梯队建设、基地建设和项目建设。该方面内容已在《论高校学科建设》一文中阐述<sup>[5]</sup>。

#### **（四）重点、特色学科建设**

高校学科建设要加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实现重点突破。这是因为：首先，办学资源的有限性和学科水平提升的无限性的矛盾，决定高校学科建设要突出重点。学科建设需要大量投入，但任何学校的办学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同时重点建设所有的学科，必须有所取舍。即使是世界一流大学，也只有少数学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其次，一流学科具有示范作用。一所高校，重点建设一两个学科，使之形成优势，成为一流。这些学科将成为学校学科建设的标杆，影响和带动其他学科的建设。同时，学校的水平取决于学科的水平，没有一流的学科，建不成一流的大学。

再次，重点建设是我国政府推动高校学科建设采取的一项基本策略。通过重点建设，带来了学科的迅速发展，从而推进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学科建设如何实现重点突破？①重点突破要成为学校领导、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共识，制定和支持重点、特色学科建设的机制和制度。②重点突破要善于选择重点。学校层面，应对全校的学科进行分析，在竞争中选择一两个学科作为重点，加强建设；学科点层面，则应在相关学科方向中，选择一两个方向，重点突破。③重点突破要突出重点。重点一旦确定，就要打破常规，摒弃平均主义的陈旧观念，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加以建设。

## **二、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

社会思想家阿尔文·托勒夫指出：“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中的开放系统……许多科学的假说、理论、隐喻和模型，其

形式都由来自实验室外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决定的……”<sup>[6]</sup>。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要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在“社会→科学”“科学→社会”的交互过程中把握学科建设。

### （一）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形成的复杂局面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既指世界经历的大态势，也指中国面临的大态势，而且这两大态势彼此影响、互为因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表现在国际格局和经济发展上。从国际格局来看，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新型全球化从“单一中心”转向“多中心”“去中心”，社会思潮分化加剧。从经济发展来看，新一轮科技革新和工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是三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力量，中国几乎错过了这三次工业革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有能力抓住甚至主导这次工业革命。世界经济中心正在“自西向东”。

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百年罕遇的疫情不仅威胁人民的生命，同时对人类国际秩序、经济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导致大国战略竞争进入了全要素对抗，经济衰退、全球市场动荡，某些产业链突发中断，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等等。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形成的复杂局面，我们要有化危为机的意识和决心。“病毒无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新冠肺炎疫情倒逼人类各个领域创新，客观上加速了新的工业革命，世界发展、人类文明的走向，出现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引发了人们对文明价值的思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切；引发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深切变化；引发了人与人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百姓追求方向的社会重大变化。这些，也正是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所要深切关注的。

## （二）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影响的广度、深度前所未有。

首先，数字经济将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放眼全球，数字经济通过不断创新融合，驱动多领域升级变革，正在为社会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其主要表现在：数字转型驱动传统部门转型升级；数字革命深刻改变就业市场；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国际贸易格局，尤其对服务业影响巨大。

其次，数字经济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将引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五个方面：重构商业模式，提升劳动生产力，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万众创业，创造就业机会。

再次，数字技术，如芯片植入、智能计算、区块链、5G通信等，对其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攻坚，提出了严峻挑战。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数字是对象本身的存在，是自然界的特征。技术就是为了人的需要生成某种工具的原理和方法。数字的获取、生成、加工、增值的所有活动的总和才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涉及面广、更新速度快、十分复杂，而我国又相对落后，常常被人卡脖子。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我们要十分关注数字技术。

## （三）科学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

进入21世纪以来，科学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科学发展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极端，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

随着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科学发展越来越精细，这主要表现在：学科分类越来越细，如与中医相关的学科专业，现在发展到了 21 个；科学研究对象越来越细，如在物理领域，20 世纪前研究的对象是原子，后来发现原子由电子、质子、中子组成，接着又发现质子、中子由被称为夸克的粒子所组成；研究的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高端，如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在未来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威胁。因为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一样有着思考能力，人工智能机器将承载着人类一半的头脑，这将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以至于霍金等科学家提出要谨慎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其次，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发生着强相互作用。科学技术研究从分散的个人活动走向社会化的集体活动；大科学兴起，成为一种完整的社会建制；科学技术研究条件社会化，需要强大的社会支持，等等。因而科学技术发展离不开社会发展、社会支持。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产生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生产力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实现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挥着良好的社会功能，表现在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变革和协调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从而促进社会行为理性化，社会管理信息化，社会发展生态化。可见，科学和技术之间产生了强大的相互作用，两者相互推进、共同发展。

再次，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新兴学科不断涌现。著名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创始人马克斯·普朗克深刻指出：“科学内在的整体，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学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sup>[7]</sup>。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科学认识的深化，学科交叉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通过学科交叉以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产生新理论，如生物学中 DNA 双螺旋结构的

发现。通过多学科参与研究，产生学科新的生长点，推进学科发展。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生交叉学科，如计算机学科、环境工程学科，以及物理化学、数量经济、教育哲学、生物化学等。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必须关注科学发展的新特点。

#### （四）国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这一论述十分重要。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向，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主动选择的战略举措。构建新发展格局应把握以下方面：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使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特别要重视目前我国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被其他国家“卡脖子”的问题；强大动力是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优势条件是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强大支撑。

在建构新发展格局中，还要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主攻方向，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中心任务。同时要处理好供给与需求、开放与自主、发展与安全三大关系，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面向未来，学科建设要在新发展格局下进行。

### 三、面向未来，如何加强高校学科建设

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要总结过去学科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点，遵循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关注未来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要从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视角，思考整个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特别要在目标提升、要素优化、过程融合上下功夫。

#### （一）目标提升

目标是方向、动力。高校学科发展要关注建设目标。面向未来，学科建设中要把握目标的变化，根据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升建设目标。

首先，学科及学科方向选择要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百年巨变、世纪疫情、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科学研究的深化，关键技术的破解，关系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高校学科建设中，关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责无旁贷。现在，学科建设目标选择中，要关注的国家战略有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建强国战略、扩大内需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很多高校都在开始根据国家战略需求，调整自己学科建设的目标。

其次，发挥学科建设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作用。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高校的学科建设要在立德树人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专业建设的重点是教学；学科建设的重点是科研，对于育人重视不够。现在强调课程育人、课程思政，笔者认为，首先要发挥学科在育人中的作用，探寻其内在规律。下面以艺术学科为例，探讨艺术的育人功能。艺术具有重要的、特殊的育人功能。其一，艺术是精神性的审美活动，给人美感，艺术是审美的过程循环，通过提升审美使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其二，艺术是情感的表达，能促进情感交流。任何品德都由知情意行构成，品德形成需要情感深化。艺术通过丰富情感而提升学生的品德。其



三，艺术创作是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用的结果，艺术欣赏同样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通过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四，艺者，道之形也。艺术内容是心灵的表现，并通过带有技术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艺术通过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启迪人的心灵。

## （二）要素优化

学科点的建设主要抓住学科方向、队伍、基地、项目等要素。面向未来的学科建设，要在优化要素上下功夫。根据学科发展态势，要素优化，要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学科带头人要成为战略科学家。学科梯队主要由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要把握本学科学术前沿，有开阔的视野，抓住学科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带领梯队成员不断开展研究，产出新成果，推动学科发展。学科水平取决于学科带头人的水平。如前所述，面对百年变局、新科学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学科交叉的大趋势，学科带头人要成为战略科学家。作为战略科学的学科带头人，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有跨学科的学术视野，看待问题有哲学高度，对科学发展趋势有准确的判断力，在组织团队科技攻关上有很强的学术组织领导能力。

其次，建设高水平学科平台。随着科学发展，科学知识与实际应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现、发明、开发、建造形成一体。同时，教学与科研、社会服务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需要建设高水平的学科平台。学科平台是科研、教学、社会服务、队伍建设的综合体，在面对未来的学科建设中，学科平台建设十分重要。实验室是学科平台最重要的一种存在形式。高水平实验室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阵地，实验室的数量和水平是一所大学科技创新能力的基本标志。高水平大学和一流学科都十分重视学科平台，特别是实验室建设。如华中科技大学在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中，十分重视平台建设，建成了脉冲强

磁场、精密动力测量两个国家大科学装置；武汉光电国家研究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两个国家级研究中心。一流实验室是高水平人才、先进仪器设备、优质科技成果和项目的结合体，是重要的学科平台，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建设。

### （三）过程融合

学科建设是一个包括知识体系建构、活动体系建构、社会建制建构的复杂过程。面向未来，高校学科建设过程中，需要多种要素的融合，各要素通过

“相加”“相融”“相生”，从而形成新的事物。因而学科建设要实现过程融合，在过程融合中特别抓住学科交叉融合、产教融合、城校融合。

首先，学科交叉融合。如前所述，学科交叉是科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创新思想的源泉。在学科交叉的过程中，通过知识对流、理论互鉴、模式组合、方法碰撞，产生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推进学科建设。在学科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要特别把握：其一，尽量以本校主体学科和优势、特色为基础，选择处于前沿的学科和学科方向，通过与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新学科。这样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二，创新学术建制，建立矩阵式的学术组织制度。传统的学术建制已经不能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甚至成为学科发展的阻力。创新学术制度，要构建矩阵式学术组织架构，增强综合研究机构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改革评价制度，强化学科建设的贡献导向，创新导向；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综合交叉研究机构增强吸取和应变能力<sup>[8]</sup>。其三，建设开放、多元的学科文化。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文化，不同学科文化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在学科交叉研究的过程中，学科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研究中产生冲突的重要根源。因此，建立开放、多元的学科文化是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基础。在学科文化建设中，要开放学科知识的边界，促进学科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包容；探索学科交叉研究

的共同范式，形成学科成员统一遵循的研究范式；形成学科交叉研究的共同认知参照框架，走向学科文化对接与交流<sup>[9]</sup>。

其次，产教融合。学科发展既有内动力，又有外动力。学科交叉融合属于学科发展重要的内动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是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加强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产教融合中加强学科建设有多种路径，代表性的有：①在产教融合中形成新的学科方向和新学科。学术性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在高校就可以发展。但应用性学科，如计算机、环境工程、电力系统自动化等学科，只有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才能发展。如环境工程学是人类同环境污染作斗争，保护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开发和保护水源，消除工业生产造成的粉尘污染，处理固体废物，控制噪声等过程中，根据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基础理论，解决上述问题，逐步发展为环境工程学科。②在产教融合中提升学科水平。在产教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平台，开展深入的科学研究，产生重大成果，从而提升学科水平。武汉纺织大学采用各种方式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融合的过程中，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纽带，会聚多学科人才，联合攻关。通过经常性的跨学科、跨行业对话机制，实现不同学科视野、学科方法、学科文化的交叉和渗透，产出有重大理论价值、实践价值的跨学科成果，推进了学科建设。③在产教融合中提升教学水平。学科具有育人功能，其育人通过教学来实现。在生产实践中优化教学过程，是其方式之一，生产过程和教学过程的结合，是产教融合最为重要的方式，能发挥实质的融合作用。生产过程和教学过程的融合有多种方式，主要有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即学生顶岗实习，直接参加生产过程；或观摩实习，直观地了解生产过程和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一方面直接学习相关知识；另一方面在实习中自己发现问题，形成项目，建立二至三门课程，

并努力完成课程学习。“请进来”，即在学校建立有企业参与的实践平台，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同开展课程教学和指导生产实践；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共同编写教材，或将企业的教材引进学校，使学生适时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在生产实践中优化教学过程，还有很多方式，有待我们去开发。

再次，城校融合。在大学历史演进中，大学与城市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其关系始终难以割舍。城校融合主要表现在：大学与所在城市融合发展，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与城市产业结构匹配，人才培养为城市所需，文化氛围与城市相融共生。就学科建设而言，城校融合突出表现在：

高校学科专业与城市发展全面对接。如近几年来，临沂大学推进学科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精准对接。在对山东省、临沂市深入调研之后，停办了 13 个专业，强化建设化学化工、物流工程、电子商务等区域主导产业紧密对接的专业，增设中药学、环境工程、城市地下空间工程等应用专业，积极培养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工科专业，实现了传统型专业结构向新动能专业结构转型，学校的学科专业蓬勃发展<sup>[10]</sup>。

高校的重点优势学科和城市的优势产业相互推进。如华中科技大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瞄准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在国内率先开展激光研究，创办激光专业、学科。经过艰苦努力，从打出第一束激光，到建成激光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经学校黄德修教授建议，在武汉市建立“中国光谷”，集中发展光电子产业。光谷的发展，又推动以学校为主体，联合多家企业，在华中科技大学建立光电国家实验室。在相互作用中，中国光谷的光电子产业和学校的光电子学科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面向未来，高校学科建设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把握学科建设的基本规律，紧密关注未来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走出一条新路。

## 参考文献

- [1] 辞海(中)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2947.
- [2] 伯顿·R·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34.
- [3] 刘献君. 院校研究 [M]. 2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146-159.
- [4] 刘献君. 论高校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10).
- [5] 刘献君. 论高校学科建设 [J]. 高等教育研究, 2000(5).
- [6] 伊·斯·普里戈金, 伊·斯唐热.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 [M]. 曾庆宏, 沈小峰, 译.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前言 3.
- [7] 岳漫宇, 王小理. 知识、技术和社会的会聚 [N]. 光明日报, 2017-02-08(14).
- [8] 袁振国. 创新学术建制, 促进一流学科建设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8).
- [9] 周朝成, 李敏. 大学跨学科研究组织的内涵、特征与管理模式探析 [J]. 复旦教育论坛, 2003(11).
- [10] 王焕良. 实施城校深度融合推动区域综合性大学高质量发展 [J]. 山东教育(高教刊), 2020(12).

作者刘献君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文华学院校长,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0期, 第1—7页。

# 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及其路径优化

贺祖斌 陈 洋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桂林 541004)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黄石 435002)

**摘 要:** 学科作为大学的基本元素, 其发展水平能够折射出一所大学的办学质量。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是支撑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主力军, 是我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重要助力, 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双一流”建设为地方高校提高学科实力提供了一次发展契机, 各省级政府先后出台相应的省域层面一流学科建设方案, 加大对地方一流学科的专项建设资金投入, 推动地方高校提升办学水平、重视人才培养质量、争取高水平科研项目、服务区域发展。

**关键词:** 地方高校; 一流学科; 学科建设

为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加快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水平, 使之成为知识发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先进思想和优秀文化的重要源泉、培养各类高素质优秀人才的重要基地<sup>[1]</sup>, 2015年11月, 国务院发布“双一流”建设方案。为了科学评价第一轮“双一流”建设成效, 2020年12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 强调评价要突出中国特色, 探索分类评价, 以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为重要导向,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2021年12月,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进一步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2022年1月, 财政部、教育部发文要求“支持地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22年2月,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正式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时强调, 将重点探索建立

分类发展、分类支持、分类评价建设体系，引导各高校重点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sup>[2]</sup>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此基础上陆续出台省级“双一流”建设方案，积极筹措资金支持鼓励省级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引导、鼓励地方高校建设优势特色学科，争创一流。例如，2016年江苏省颁布《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预计每年安排投入资金17亿元左右，另外推出全国百强省属高校建设项目，对综合办学实力进入全国百强的省属高校给予重点支持，每年每校1亿元专项资金；河南省为支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提出2015—2017年安排10亿元，2018—2024年每年安排3亿元资金支持建设；2017年广西印发《统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多渠道统筹50亿元资金支持“双一流”建设，2019年安排6.21亿元支持自治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积极抓住“双一流”建设机遇，提高区内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在此背景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重要力量的地方高校，既拥有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 **一、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教育部等部委出台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中要求：省级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统筹推动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方案，“一流学科”一词也被广泛提及。不同学者对一流学科的内涵有不同的表述，大多从学科评价标准概括一流学科的内涵。张德祥认为：一流学科是推动一流大学建设的基础，处于学科金字塔的顶端，是同类学科中的卓越者或出类拔萃者，是某类学科的高峰。<sup>[3]</sup>同时，一流学科也是相对的，不同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办学历史不同，学科发展各有千秋，各自拥有学科特色和优势。<sup>[4]</sup>一流学科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抓手，是

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经之路。为建设成区域一流大学或国内一流大学，地方高校以学科建设为重要抓手，积极响应“双一流”政策，多维度提升学科实力。

### **（一）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重心**

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提出了“坚持以本为本，加强一流本科教育”，强调学科一流不代表专业一流，要在“双一流”建设中重视本科教育，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才是高校的立身之本。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群体规模日益壮大，面临的竞争压力也逐渐加大，加上用人单位对国内外名校毕业生的青睐，大多数普通地方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明显处于劣势地位。要打破传统的高校等级观念，提高普通地方院校的社会声誉，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是重中之重。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同时一流人才提升了学科的社会声誉，学科引才能力进一步强化，进而推动地方高校生源质量的提升，学科水平得以提升，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 **（二）立足地方的科学研究成果**

科学研究是高校的主要职能之一，一流学科建设在逻辑上被认为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从国内外各类学科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发现，高校科学研究是衡量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我国高校主要从科研平台、科研经费、科研项目、科研创新团队等方面加强科研投入，以期获得高水平研究成果，提升学科声誉。一流学科应产出一流的科研成果，但与入围国家“双一流”建设的一流大学不同，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应更突出科研成果的应用性、地方性、特色性，传承和创新地方优秀特色文化，重点解决区域性发展问题，包括技术攻关、地方社会发展难题，以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三）重视优化学科师资结构**

人才是高校建设一流学科的关键，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



华大学考察时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笔者认为，所谓大先生，即卓越的师资，建设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创新型师资队伍，是一所大学行稳致远之根本。<sup>[5]</sup>在各高校一流学科的竞争态势下，人才资源作为核心要素，其战略地位不断强化，一流的师资所带来的高回报率和辐射作用不容忽视，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争取重大项目、产出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重要驱动力量。一流的学科团队除了要拥有高端学科领军人才，还须有科学合理的学科师资结构，通过加强学科师资队伍梯队建设，培育优秀青年教师，最终促进学科教师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一流学科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 （四）突出服务地方社会的使命

刘小强等分析国外发达国家科研评价改革的趋势，指出发达国家科研评价体系从过去仅关注学术影响力扩展到关注科研成果的社会服务能力，引入科研的“社会相关性”和“生产性互动”等作为评价指标，学科知识生产的社会逻辑逐渐受到重视。<sup>[6]</sup>美国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Johns. BruBacher）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如果大学拥有大量的为社会服务的知识，但是缺乏把这些知识用于实践的决心和责任感，那么大学将因无用而失去存在的根据。<sup>[7]</sup>一直以来，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作为学科建设的两种价值取向，彼此之间既相互促进，也相互博弈、对立乃至冲突，但两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二律背反关系，而是紧密相连、辩证统一的。<sup>[8]</sup>19世纪中期逐渐开始兴起的威斯康星大学及威斯康星思想成为地方大学践行社会服务办学理念的典范，威斯康星思想认为高校必须冲破象牙塔式的封闭办学模式，教学活动不应仅仅局限在校园，而应在全州展开，加强与地方的联系与合作。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应将服务社会的思想融入教学和科研中，成为地方发展的人才培养基地、技术转化中心和政府智库。

## （五）科学高效的学科管理理念

潘懋元提出地方高校应该把“一流”内化为办学理念和精神品质，将“一流”视为一种质量诉求，一种信誉和承诺，一种持续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应当是通过树立卓越的办学理念来释放学术活力，持续改进学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sup>[9]</sup>一流学科应具备一流的学科管理理念，大部分地方高校在经费投入、师资水平和实验室平台等方面与中央部属高校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如何把资金花在刀刃上，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便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在管理过程中脚踏实地、立足长远，拥有开放包容的眼光、虚心学习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 二、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成效评价

一流学科的遴选建设必然伴随着学科评价的诞生。在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印发的《“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中，明确提出“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不能简单以条件、数量、排名变化作为评价指标，此次成效评价主要有大学整体建设评价和学科建设评价两部分。其中，大学整体建设评价按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六个方面相对独立组织，综合呈现评价结果；学科建设评价则主要检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教师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综合成效。各级政府往往将学科评价作为绩效评价方式，以此遴选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从而确定政府经费配置依据，因此，各高校逐渐强化对标对表的“双一流”建设模式。自“双一流”方案发布后，地方高校在一流学科建设方面下功夫，无论是经费投入、人力投入还是物资投入，基本强调集中资源建设本校的优势学科或特色学科，增强学科实力，提升自身学科地位和社会声誉。地方的“双一流”建设，特别是一流学科建设取得丰硕的成效。

## （一）学科结构不断合理优化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基于各种政策导向，我国高校逐渐将“内涵式发展”融入学校办学以及学科建设的理念中。地方高校在学科建设中开始关注学科结构生态，不少高校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针对建设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与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学位授权点进行调整、撤销，新增与学校优势学科相关、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学位授权点，开始从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逐渐转向重视质量的内涵式发展。比如，2020年广西高校新增6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另外，在2019年动态调整学位授权点中，广西有4所高校撤销8个学位授权点，包括广西大学、广西科技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师范大学，涉及专业包括工程管理、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层次上不断提升，研究生培养规模逐步扩大，尤其是专业硕士培养逐渐受到重视，不断满足区域高水平人才需求。

## （二）人才引进机制不断完善

一流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人才，师资队伍是高校建设一流学科的关键要素。各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主要从外部引进和自身培育两个方面共同发力，在引进上采取更加灵活的引才模式，自身培育则重视本校青年教师的专业成长，优化职称、年龄、学历等结构，加强高层次人才和优秀中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育。在人才引进方面，地方高校重视引进和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和海外优秀学者等高层次人才，给予相应的行政权力、物质激励和生活保障；在人才引进的同时，地方高校开始重视现有师资的培育，为本校教师的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提供平台，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的“内生”发展，对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优秀教师提供不同的培育方案，鼓励教师“走出去”，走向实践，走向国际，聚焦学术前沿和现实需求，提升科研能力和学术影响力。

### （三）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双一流”建设提出要对接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地方高校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它的使命。在此过程中，地方高校积极建设高水平科研平台，提升承接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在科研平台建设、科研项目承担、论文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进步。除了为社会输送高素质人才，科研成果转化也是高校服务社会的重要途径。这些年地方高校科研开始从高深学问研究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更加关注区域发展难题、关键技术突破的研究，在重视理论研究的同时强调大学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如在国家全面脱贫攻坚工作中，众多地方高校依托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做出突出贡献。

### （四）学科国际化水平持续推进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一流大学建设，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主动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人类共同福祉。<sup>[10]</sup>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是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外部动力，在势不可当的国际化趋势下，地方高校抓住一流学科建设契机，发挥优势学科的引领作用，对内提升课程国际化水平，营造开放多元的校园环境，增设全英文授课课程，在教学中介绍国外主流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研究方法，聘请国外学者到校开办讲座、授课；对外积极开展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合作交流，积极与国外高校进行联合培养、合作办学，提供多种形式的留学深造项目，设立留学基金和奖励计划，鼓励教师进行国际访学，扩大在校生出国交流的规模，并积极承办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在留学生教育规模上也持续扩大。

## 三、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问题分析

现代大学起源于欧美国家，我国大学基本属于“后发型”大学。“双一流”战略的实施旨在以学科建设为基点，提升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

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水平，促使国内高校完成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地位变更，在国际教育舞台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政府先后出台“双一流”政策，遴选省域一流学科，给予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为地方高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中新增了7所地方高校，其学科实力获得广泛认可。但不可否认，地方高校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

### **（一）重视要素投入，忽视资源整合共享**

虽然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资源投入在持续增长，但其效用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依然存在资源浪费、利用率低的现象。各学科组织间缺乏资源共享、信息互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未能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高效配置。例如广西高校，尤其是9所区内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基本集中分布在南宁、桂林两座城市，形成了桂林、南宁两大高等教育集聚区，拥有先天的

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为校际、学科间的交流学习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实际上，当地高校在资源共享方面的作为不够，城市公共交通设施不完善，客观上限制了校际互动、资源共享；课程、实验室、教学场所等优质资源未实现对外开放，未建立成熟的课程共享机制，没有实现课程互选、学分互认；高校与地区科研机构、产业中心并不临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领域缺乏深层次、多元化的合作，与当地政府、社会和企业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区域高等教育集聚优势尚未被开发。

### **（二）重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意识不足**

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大学的功用》中提到：“就大学来说，目前的基本现实是人们普遍承认新知识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刻，我们意识到大学的无形产品——知识可能是我们文化中影响各个专业，甚至社会各阶级、各地区，以至于各个国家之兴衰

的最强有力的因素。”<sup>[11]</sup>地方高校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是区域人力资本的供给者，也是地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科学研究是面对新的实际问题对知识的重组和创新，科研成果转化是高校切实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实现知识应用的主要途径之一。据我国教育部《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19年教育部直属高校校均教学与科研人员约3815人，地方高校校均约456人，在研发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数量上，地方高校校均19人，而教育部直属高校校均291人。<sup>[12]</sup>显然，地方高校在科研人员和成果应用服务人员数量上与部属高校存在很大差距，地方高校在成果转化智力投入上亟待加强。许多地方高校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转移部门，缺少专业人员为科研人员、教师进行技术成果应用和转化提供帮助和引导。此外，教师在从事科研时，倾向于理论研究，注重学术水平，将研究局限在实验室、论文发表上，应用型研究成果产出较少。

### （三）学科发展水平不高，交叉协同能力有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原理强调，整体与部分是相互依赖、互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要建设好局部，发挥局部的支撑作用，同时也要立足整体，发挥整体的统领作用，实现整体效应最优。有学者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哺育与反哺”关系，不同学科通过协同，实现同生、同长、同进、同发和同升，达致整体生成和发展，这种学科的协同具有基础性和过程性，是一流学科的生发机制。<sup>[13]</sup>

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演化，从纵向维度理解即单一学科建设要注重高水平、高质量发展，从横向维度上来讲即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目前，地方高校在建设一流学科过程中，出现了纵向水平不高、横向交叉不足的问题。在纵向上，地方高校的高峰学科数量偏少，学科发展水平有待提高，难以发挥高峰学科的集群效应，对其他学科的辐射力有限，如根据国家第一轮“双一流”建设名单

统计，入选一流大学建设的地方高校仅 3 所，入选一流学科建设的地方高校 44 所，占比不到一半，其中非原“211 工程”地方高校仅 19 所，且入选学科基本仅 1 个，部分高校学科入选形式为“自定”。<sup>[14]</sup>

#### **（四）人才引进困难，师资培育力度仍待加强**

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中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培养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学科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人才队伍尤其是高层次领军人才在学科建设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是实现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的关键。面对高层次人才的稀缺和高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广泛需求之间的矛盾，各省级政府以及地方高校纷纷出台相应的人才引进政策；地方高校斥巨资加强对高层次人才的“笼络”，部分高校提出高薪待遇，提供住房、子女入学、配偶安置等一系列优惠激励政策，以壮大师资力量。

在人才争夺过程中，受到区域位置、财政状况、科研平台等因素的影响，人才引进困难一直是限制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城市人才引进更占优势，中西部地区人才引进难度更大，人才争夺反而造成中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流失，产生“马太效应”；而且人才竞争往往是地方高校之间，甚至是同省份地方高校之间的“内部斗争”，造成人才无序流动。

#### **（五）管理创新不足，学科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一流学科需要有一流的管理，对地方高校而言，地理位置、生源质量、办学设施等先天条件的不足，加上后天的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办出水平，提升教学质量，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科研能力，争创一流，这对地方高校的组织管理能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尽管在学科评价体系中无法看出组织管理的贡献和价值，然而它确实在影响学科资源配置和建设效率。第一，部分行政人

员专业的管理知识和能力有所欠缺，缺乏服务意识，对学科建设的内涵并没有进行主动研究，对自己业务范围内的政策和职责认识不清晰，对学科建设工作缺乏创造性和积极性。管理者本应对组织的管理绩效负责却转变为对上级负责，本应对学校的长远发展负责却转变为对任期内的短期效益负责，这些都是有悖于高校办学理念的。<sup>[15]</sup>第二，在学科建设方面地方高校做法趋同，缺乏创新意识，模仿中央部属高校或地方高校间互相模仿，学科专业设置类似，没有形成彰显自身特色的建设模式。

#### **（六）对外交流有限，国际合作层次不高**

地方高校在教育国际化潮流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合作办学蓬勃发展、师生国际交流机会增多等。但办学水平、财政能力、社会声誉等短板反过来又造成地方高校对外开放能力有限、国际化办学理念相对落后、师资队伍国际化程度较低、人才培养目标与国际接轨存在差距、国际化教学模式难以开展、学校国际化氛围淡薄等劣势。<sup>[16]</sup>总体来说，地方高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整体处于不利地位，高水平国际合作高校数量较少，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不够，留学生生源质量不高。从合作形式来看，地方高校对外交流合作以参与国际会议、教师出国访学为主，实质性的国际科研合作并不多，在读学生出国留学、交流的人数较少。

### **四、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问题成因分析**

从上述地方高校建设一流学科中所呈现的问题，进一步剖析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一）对传统建设模式的路径依赖**

从我国高校学科建设的政策变迁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强化了重点学科建设的价值导向，各省级政府受到中央扶优扶特政策引导，也相继开展省级特色学科、重点学科、一流学科的建设任务，将大部分经费投入到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学科，支撑区域内某几所高水平大学的优先发展。地方高校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基本将全校有限的资源集中



在某几个优势学科，开展校级重点学科建设，进而提高优势学科的水平，以获得更多的政策倾斜、资源投入，并逐渐成为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固定模式。地方高校基于之前积累的经验，在后续操作中得心应手，边际成本递减，如果改变建设策略，就要从头开始，增加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大多数高校会维持已有的优势而忽视可能存在的更好的机会。

不可否认的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种重点建设的导向有力地推动了地方高校的学术研究水平、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平台建设，大大提升了地方高校的办学效率和学术影响力。但同时，这对地方高校后续的学科建设制度设计、行为方式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短时间内，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仍将持续，地方高校在初始行为选择的影响下，依旧选择将资源向学校重点学科倾斜，形成单一学科领域的一枝独秀，并基于优势学科建设形成的正反馈机制，延续过去的学科建设模式，增加一流学科的要素投入，忽略了一流学科的带动辐射作用，对结构性优化认识不足，忽视学科交叉融合，资源整合能力不足，进一步拉大优势学科和弱势学科的差距，学科生态遭到破坏。

## （二）建设资金筹措渠道相对单一

基于我国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无论中央部属高校还是地方高校，其经费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都是政府财政投入，政府通过制度设计、资源配置、质量评价引导高校学科布局 and 治理。地方高校的一流学科建设涉及众多利益方，包括教育行政部门、高校管理者、院系管理者、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以及社会行业企业等多元利益相关主体，在学科发展中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诉求。对于地方高校来说，由于绩效评价竞争的导向，它必须集中资源建设一流学科，保证一流学科的建设水平，在质量评价中获取优异的成绩，以此换取政府的经费投入、高质量的生源、师资的引进、科研项目，按照“投入—评估排名上升—扩大再投入”的路线建设一流学科；另外，国内、国际学科评估体系对科

学研究的指标比重设置普遍偏高，且人才培养质量滞后、难以量化，我国高校普遍形成了重科学研究、轻人才培养的局面，为了维护既得的学术声誉和资源，降低建设风险和成本，地方高校不会轻易改变现有的建设模式，即使它存在缺陷和潜在的低效率。多数地方高校逐渐形成了对政府经费投入的过度依赖，能获得的校友捐赠、社会捐赠十分有限，且缺乏“开源”精神，忽视科研成果创收、教育捐赠等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 （三）对学科评价价值的认知偏差

重点学科、一流学科遴选建设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学科评价的诞生。我国的学科评价呈现出制度化的发展。政府主导的学科评价主要目的在于对学校的学科建设进行绩效考核，并以此作为经费投入的重要依据，是政府对高校资源投入、引导学科发展的体制创新。通过学科评价将政府经费进行合理配置，提高资金回报率，使学科发展与国家人才战略、科技战略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满足国家和区域发展。

因此各高校、各学科在参与学科评价上表现出高度的重视和积极性，取得好的学科评价的结果对高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着政府的资源投入倾斜，意味着该学科的学术声誉和社会声誉得到了肯定，在生源质量、师资引进、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就有了较强的竞争力，这无疑会进一步提高学科水平。面对如此物质诱惑和“一流”品牌的吸引，许多地方高校对标对表形成了数据指标导向的学科建设模式，习惯按照学科评价中的量化指标进行学科建设，将学科建设束缚在指标体系之下，重视学科要素投入，忽视了一流学科特色化、区域性发展需求，缺少了对学科知识生产的创新性、前沿性的关注，忽略了大学学科管理能力、学科文化等学科软实力的建设。

## 五、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路径优化

2020年12月，教育部等部委出台《“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该评价办法是在总结首轮“双一流”建设成效基础上制定的，对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此轮评价，积极引导高校结合自身特色优势充分聚焦国家需求，优化学科布局和科研体系，不断提升学科建设与国家需求的契合度，围绕国家需求确定科研方向，主动加强与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的对接、联动，实现产学研用的全面协同发展，提升高校科研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融入度。同时，还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旗帜鲜明地鼓励和引导教师潜心育人和顽强攻关。其评价指标为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建设目标，将促进地方高校进一步落实服务区域发展的办学定位，根据自身特色，有的放矢、因地制宜地开展一流学科建设工作。2022年1月，财政部、教育部印发《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该办法要求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重点加大对困难地区和地方高校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支持“部省合建”高校建设，提升办学能力和水平，推进中西部地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支持地方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sup>[17]</sup>特别是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地方高校如何抓住机遇，强化一流学科建设，提升学科发展水平，是地方高校值得思考的问题。

### （一）明确学科定位，对接区域发展特色

潘懋元等提出“双一流”建设不应局限于原有的“985”“211”高校，各级各类学校都应有佼佼者，因此要用多元的评价模式和标准激发高校活力，合理定位高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sup>[18]</sup>作为区域知识创新、知识传承和知识应用的重要机构，地方高校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转变单一学术逻辑为主导的建设思维，注重社会逻辑的引领作用，针对不同学科的属性特征采取不同发展策略。

地方高校应充分认识学科价值属性，明确学科定位，利用学科知识

服务社会，并在服务社会中促进知识创新。例如，针对基础性学科应以知识创新为主线，强调对知识本身的兴趣和探索，鼓励原始创新，扎根理论知识，以支撑本校应用学科的发展；在人文艺术学科领域，应积极传承和挖掘地方优秀文化基因，抓住新文科建设发展机遇，丰富地方文化内涵，发挥优秀文化的社会价值，打造地方文化名片，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提供素材；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领域，地方高校要积极对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立足区域发展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坚持自主创新，加强横向研究合作。目前一些企业的科研能力已经走在高校的前列，加强产学研合作是必然趋势，力争突破关键技术难题，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解决区域社会发展矛盾问题。另外，为更好履行社会服务职能，地方高校应成立相关社会服务职能部门和科研转化专业服务团队，加快研究成果转化，提高学科对地方发展的贡献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拓宽学校资金来源渠道，形成多元的学科资助体系。

## （二）立足一流学科，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我国政府和高校在学科建设上一贯秉持扶优的原则，一流学科数量占比较少。若地方高校一味强调少数几个优势学科的重要地位，政策和资源投入持续向优势学科倾斜，一方面，虽短时间内提高了少数优势学科的评价绩效，但大范围的资源累积势必会进一步强化绩效指标做法的合法性，从而弱化了“目标学科”的学术创新能力，抑或规避了具有较大风险但离重大理论原创较近的学术探索；另一方面，仅关注“目标学科”势必将进一步恶化大学的学科生态结构，导致“目标学科”缺乏其他高水平学科的支撑而增长乏力<sup>[19]</sup>，且挤占了其他处于相对劣势学科的生存空间，破坏了学科生态系统。一流学科不应该是孤芳自赏，要发挥引领作用，反哺其他学科共同发展，促进各学科和谐共生。

地方高校须本着同等尊重的原则，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学科理念，立

足本校优势学科，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挖掘特色学科，形成相互支撑、良性互动的学科发展模式。地方高校应培养合作意识和共享精神，避免各院系、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课程教学、实验室等出现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学校资源闲置浪费，因此要打破学科组织壁垒，加强学科间、院系间的沟通交流，搭建校内交流平台，完善相关制度保障交流畅通和常态化，分享优势学科建设经验，促进资源共享和科研合作，提高学校资源利用率。另外，各学科的交流可以推动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为单个学科自身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纵观世界大学的学科发展史发现，发展经历了“高度综合—高度分化—高度分化基础上的高度综合”<sup>[20]</sup>三大阶段。如2021年1月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成为我国第14大学科门类，对我国学科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有利于拓宽研究领域、丰富研究方法、产生交叉学科，形成专业化的学科群，促进学科知识生产和创新。

### **（三）注重师资培育，增强本校内生动力**

高层次人才并不是一朝一夕就成长起来的，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财力栽培，是一个投资周期长、收益见效滞后的工程，因此不少高校选择高效、直接的引进办法，重视“输血移植”挖人才，忽视自身造血功能，对本校的高层次人才培育工作重视不足。当然，面对一流学科建设的迫切要求，地方高校仍要加强人才引进工作，积极利用国家和区域相关人才政策，继续完善本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和管理制度；避免盲目引进造成人才的无序流动，根据地方自身学科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不仅要考察人才的真实专业水平，还要重视职业道德修养的考评，提高人才引进的质量，以免资源浪费。

另外，与人才引进这一短期行为相比，本校师资培育则应是长期性的常规工作。地方高校应立足长远，重视存量管理，对引进人才和现有师资一视同仁，建立和完善本校优秀师资的选拔、资助、交流、激励、

保障的体制机制，给予本校教师、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对外学习交流的机会，鼓励优秀人才特别是青年人继续深造、访学，到企事业单位进行实践锻炼，提升学科专业素养，加强社会服务意识培养，引导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人才成长机制。同时，在一流学科成效评价中应特别突出教师思想政治引领，坚持师德师风为第一标准，强调人事制度的改革创新，坚持教师评价以质为先、量质并举的原则，摒弃在评价中对论文、项目和经费做简单加法，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

#### （四）重视科教融合，促进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

学科是知识的专门分类；专业则是社会学范畴中的社会分工，由若干门课程构成；课程则是教育学意义上的学生的学习内容，它来源于学科知识，选择其“最有价值的知识”组成教师的教学内容。三者具有内在逻辑联系，是各高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的主要载体。科教融合强调科研与教学的相互配合，突出学科与专业的一体化建设，以一流的科研支撑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符合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一体化的本质规律，是世界科教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sup>[21]</sup>

一流的学科需要一流的课程，一流的课程同样需要一流的学科支撑，要自觉将学科建设的创新成果转化为课程，将学科前沿知识、跨学科建设成果、学科建设最新成果等及时融入课程中<sup>[22]</sup>，加强科教融合，将科研成果融入课堂和教材，丰富和更新教学内容，使学生掌握研究前沿；把科学研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让学生成为教师科研工作的合作伙伴，将研究项目作为第二课堂，在研究中促进学生自觉学习专业知识，掌握研究方法，实现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提高人才专业素养；通过学科建设改革传统的专业教育，摒弃过时的、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专业培养，推出“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加强实用型课程建设，提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课程，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实践能力，关注社会所需人才的必备素质。

### **（五）重视学科文化，打造开放包容学科环境**

作为大学基本组织单元的学科，离不开学科文化这个成长环境，而学科文化稳定性的特征决定了积淀深厚、优秀的学科文化是大学保持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最基本、最持久的优势。<sup>[23]</sup>地方高校要重视学科文化建设。第一，要增强师生的学科自信，强化学科群体意识，加强学科研究范式、学科价值和学术规范的教育，引导师生加强学术研究，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增强对所属学科的认同感、责任感、归属感。第二，要消除对某些学科的偏见，给予各学科平等对话的机会，打破学科之间的制度藩篱，加强学科间交叉融合、取长补短，形成鼓励创新、开放包容的学科氛围。第三，在制度文化层面，要完善职称评审制度、科研激励机制、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等，保障相关群体的切身利益，凝聚力量共同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第四，在组织管理层面，行政部门应明确为建设一流学科服务的理念，创新组织管理机制，促进各部门加强沟通合作，简化不必要的审批程序，积极与其他高校进行交流，定期进行相关管理人员培训和交流学习、实地考察，借鉴先进管理经验，提升人员专业素养，为本校一流学科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 **（六）加强国际交流，提高国际合作水平**

高等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而拥有较高的学术声誉、学科发展水平较高、资金雄厚的大学总是更容易获得国际交流的机会和优质国际生源。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高校实现内涵式发展、提高学术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着力打造“更全方位、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深化与世界各国的教育国际交流。大部分地方高校的学科建设方案中也提出要立足区位优势，以国家战略为背景，加深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地方高校应树立国际化发展理念，创造性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

鉴国外高校先进的学科管理经验；立足区域发展和沿线国家发展需要，培养紧缺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加强实质性的国际科研合作；提高留学生培养质量，加强留学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打造留学品牌；寻求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联合培养与合作，出台相应激励政策鼓励教师、学生、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出国交流、访学，增加在读学生国际交流经验，提高师资国际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有一流大学群体的有力支撑，一流大学群体的水平和质量决定了高等教育体系的水平和质量。<sup>[24]</sup>地方政府要紧抓国家“双一流”建设的难得机遇，完善建设要素和评价标准，科学引导地方高校和学科努力争创一流水平，落实新时代高等教育高质量全面发展的新要求。在新一轮学科建设过程中，充分体现“双一流”建设内涵式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促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性高质量发展。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eB/oL]. (2015-10-24) [2022-04-15]. [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http://www.moe.gov.cn/jyB_xxgk/moe_1777/moe_1778/201511/t20151105_217823.html).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扎根中国大地，办出中国特色，争创世界一流——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eB/oL]. (2022-02-14) [2022-02-15].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2/t20220214\\_599079.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s5987/202202/t20220214_599079.html).
- [3] 张德祥. 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关系审视[J]. 教育研究, 2016, 37(8): 33—39, 46.
- [4] 陈洋. 地方高校一流学科建设与优化策略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21: 10—25.
- [5] 贺祖斌.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地方高校的内涵式发展[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9): 14—19.
- [6] 刘小强, 钟雪倩. 从科研的社会影响评价到服务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发达国家地区科研评价改革趋势对我国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0, 41(5): 72—79.
- [7] (美) 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 等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12—13.
- [8] 袁广林. 学术逻辑与社会逻辑——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价值取向探析[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7(9): 1—7.



- [9][19]武建鑫. 学科生态系统: 从理论到方法的可能——兼论世界一流学科的成长机理[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 (2): 16—22.
- [10][24]习近平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方向为服务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eB/oL]. (2021-04-20) [2022-02-08]. [http://china.cnr.cn/news/20210420/t20210420\\_525466016.shtml](http://china.cnr.cn/news/20210420/t20210420_525466016.shtml).
- [11]任增元, 孙莉, 崔鸣哲. 克拉克·克尔《大学的功用》经典思想研读[J]. 现代大学教育, 2019 (4): 38—44, 113.
-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9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eB/oL]. (2020-09-18) [2022-02-08]. [http://www.moe.gov.cn/s78/a16/a16\\_tJdc/202009/w020200918378029706686.pdf](http://www.moe.gov.cn/s78/a16/a16_tJdc/202009/w020200918378029706686.pdf).
- [13]李泉鹰, 齐小鹏. 生成整体论视域中的一流学科建设[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9 (12): 25—29.
- [14]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eB/oL]. (2017-09-21) [2021-03-14].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43/201709/t20170921_314942.html).
- [15]李斌琴. “双一流”建设中地方高校管理要实现“四个转变”——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J]. 大学教育科学, 2018 (3): 71—78.
- [16]李庆成, 刘云. “一带一路”倡议下特色地方高校国际化理念及路径探究[J]. 重庆高教研究, 2016, 4 (5): 26—31.
- [17]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印发《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 (2022-01-24) [2022-02-10]. [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1/t20220119\\_3783505.html](http://jkw.mof.gov.cn/zhengcefabu/202201/t20220119_3783505.html).
- [18]潘懋元, 贺祖斌.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大学治理——访著名教育家潘懋元先生[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7 (5): 120—128.
- [20]刘献君. 学科交叉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途径[J]. 高校教育管理, 2020, 14 (1): 1—7.
- [21]刘继安, 盛晓光. 科教融合的动力机制、治理困境与突破路径——基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案例的分析[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 (11): 26—30.
- [22]韩春梅, 张玉琢.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学科的演进逻辑与建设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0 (10): 29—37.
- [23]陆根书, 胡文静. 一流学科建设应重视培育学科文化[J]. 江苏高教, 2017 (3): 5—9.

本文原刊载于《大学与学科》2022年6月第三卷第二期, 第90—103页。



##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重申学科本质及其演化规律

陈兴德<sup>1</sup>, 张斌<sup>2</sup>

(1.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深入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为此, 一是要更加明确地将学科视作以知识为“原点”、组织为“载体”、制度为“骨架”、文化为“灵魂”的社会建制, 更加全面地把握学科本质及其属性, 更加完整地理解“学科建设”的基本内涵; 二是要更加系统地总结学科演变的历史, 积极从学科“分化”“结构化”“组织化”“制度化”“国际化”“学科中心转移”等若干特征中准确把握学科演化的逻辑与趋势。在此基础上, 通过“坚守大学学科知识创新使命”“完善大学学科基本职能”“优化大学学科组织、制度、文化建设”“加快培育世界学科中心”“促进学科高水平国际化”等途径实现新一轮“双一流”建设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学科; 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 高等教育; 学科演变

自首轮“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 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在若干指标上取得明显进步, 部分学科已经进入到世界一流学科方阵, 实现了我国高等教育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但必须指出, 我国大学学科建设仍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譬如, 我们对于学科经费过度倚重, 对学科短期产出过度追捧, 对学科外在指标过度强调, 对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经验简单移植, 现代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进展缓慢等。这表明, 我们对于大学“学科”的本质认识不够准确, 对于学科建设内涵认识不够全面, 对于大学学科生长的逻辑及其演化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为了迎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需要进一步深化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 一、“学科”的本质与“学科建设”的基本内涵

对于什么是“学科”，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代表性的表述包括“知识的分类”“大学的组织形式”“教学的科目”等。但是，上述定义多在不同层面、不同语境下使用，这导致学科的内涵被割裂，学科的外延被窄化。事实上，有关学科“知识的分类”“大学组织形式”“教学的科目”的三重意涵具有“三位一体”的特征，它辩证地反映了学科的知识本源、组织形态和实践方式。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学科的本质：学科是以知识为“原点”、制度为“骨架”、组织为“载体”、文化为“灵魂”的社会建制。为更好地阐释什么是“学科”，我们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概括学科属性。

### （一）学科以知识为“元”，知识创新是学科的根本使命

在中国汉语里，“元”有“开始”“首要”“至大”之意。学科以知识为“元”，意在凸显学科/学科建设以“知识”为原点、为核心、为归宿。一提到“学科”，人们首先联想到大量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形成的一门门系统化、专门化知识。因此，学科首先被定义为“知识的分类”。人类为什么要对知识加以分类？按普朗克（Max Planck）的观点，“科学是的统一的整体。将科学划分成若干不同的领域，这与其说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然而，知识分类更根本的原因是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所导致的知识积累的增加。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人类认识水平经历了“神学阶段”（或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抽象阶段）、“科学阶段”（或实证阶段），这是人类认识的“幼年时期”“少年时期”“成年时期”。人类智力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类知识不断增殖而不断分化、不断专门化的过程。知识分类促成了“学科”的出现，“学科”产生后加快了知识的积累和深化。学科以知识为“元”，就是要突出学科的“知识品性”，强调“知识创新”不仅是“学科”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自然生长之基。

## （二）学科呈现为“知识”与“组织”两种形态的统一

学科除了具有“知识”的一元性特征，更是“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两态的统一。“知识形态”的学科对应着一门门学科知识系统，包含了相应学科的概念、术语、方法、理论。

“组织形态”的学科广泛分布于大学与社会，尤以大学学科组织最具代表性。在大学内部，学科组织是学科的代名词，是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主要载体。如果说学科知识是学科的知识现象学之维，那么，学科组织是学科的知识社会学之维，二者以知识为基点，彼此交融，不可分割。学科组织至少具有三个功能，一是体现知识生产的社会分工。根据所属领域的差异，大学“知识工厂”被划分成不同的“生产车间”。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说得很形象，“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这种一门门的知识被称作‘学科’，而组织正是围绕这些学科确立起来的”。二是塑造学科内部的专业认同。学术分工导致了学科畛域，从而形成风格迥异的学科范式和学科文化，但却是缔造同一学科内部身份认同的基础。学科因此成为“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三是提供学术研究的组织性保障。学科组织是知识、人才、成果的汇聚，是组织、制度、文化的统一，它通过资源分配和体制化运作，对整个知识生产过程起支撑作用。

## （三）知识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是学科的核心职能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功用逐渐拓展，形成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基本职能。事实上，大学作为一系列“学科”的联合体，其职能源自不同学科职能的叠加与综合。学科才是实际意义上大学职能的承担者、执行者。学科职能表征为学科组织依托其专业特长，不断地创新、传承、应用知识的过程。学科职能受制于学科发展方向、水平高低、

能力强弱后者决定了大学职能的方向、广度和领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学科竞争力成为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一流学科成就一流大学。

学科是具有广泛社会属性的生命体，为社会服务是学科发展的外在动力，也是社会发展对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大学日益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学科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日益紧密。那些跻身世界一流的学科大多因为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当中，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在与社会各个子系统建立更为紧密的发展联系过程中而发展壮大。一旦走向了自我封闭，裹足不前，即使一度风光无限也会就此沉沦。以往，一提到学科建设，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科学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对于人才培养有所忽略。事实上，学科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集中地通过“学科”与“专业”的关联反映出来。“专业”代表了由一系列课程所组成的实践体系，而课程则是对于学科知识系统的筛选与结构化。专业是学科展开知识传承、培养人才的现实支撑；学科则是专业发展的“土壤”，为专业之树提供知识养分。学科—专业—课程三者起于知识的创新与积累，通过专业的桥梁作用，终于专门化人才培养，有效地实现了从知识创新向知识应用的转化。

#### **（四）学术人、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是学科四个核心要素**

学科核心要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学术人”。这是学科最基础、最活跃的要素，其外延既包含学科个体，也涵盖学科群体，他们是经受过特定学科规训的专业人员，是学科最可宝贵的资源。当代科学的一个突出变化是集团化、外部资金支持的项目制、复杂性课题研究日渐成为主流。学术人逐渐由松散的个体组织成为强调合理结构、优势互补、配合默契、充满凝聚力和战斗力的研究团队。这种以团队方式的集体分工合作，自二战以来已经成为一种最为普遍和常态的科研组织形式与活动形式。第二、第三个是“学科组织”和“学科制度”。学科制度的

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确定性”的追求。通过学科制度，人类知识体系变得条理有序，从而加速了知识的积累；通过学科制度，科学研究由个体闲逸的好奇逐步走向专业化、集约化，提高了学科服务能力。学科制度上述功能的实现，必须通过学科组织来实现。学科组织为学科制度提供组织保障，是学科建设的实践载体。离开了学科组织谈学科制度建设，学科制度没有了具体落脚点；反过来说，舍弃学科制度谈学科组织建设，学科组织就缺少了实现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流学科建设就是基于一流学科制度的学科组织建设。在这里，“制度”与“组织”“学科制度”与“学科组织”融合为一，相对的区分只是为了突出各自侧重点。第四个是“学科文化”。学科文化既包括特定的学科知识，也包括学科规训制度，还包括学科共同体、学术生活样态以及学科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从形式上看，学科文化往往与学科组织、学科制度结合在一起，反映学科组织、学科制度深层次的文化价值、文化理念。由于学科文化具有“柔性”“潜在”“弥散”“渐进”等特征，它往往为人所忽略，被视作“非正式制度”“隐性制度”“内在制度”。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关注学者、学生、学术成果、学术声誉等学科外在的要素，而恰恰将学科的内核“学科文化”放在次要的位置。事实上，学科文化既是学科迈向高级发展阶段之“因”，也是学科组织/制度趋于成熟之“果”。总之，所谓“学科建设”就是学术人以知识创新为宗旨，不断完善学科制度、优化学科组织、培育学科文化的实践活动。在上述活动中，可以将学术人视作学科“生产力”，将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视作学科“生产关系”。通过不断改进学科生产关系，可以进一步释放学科生产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科知识生产。对于学科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学科建设的内涵，而且厘清了学科建设的“因果”“表里”“主次”“轻重”“先后”关系，凸显了学科建设的重点和抓手。

## 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握“学科”演化逻辑与“学科建设”基本趋势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学科”及“学科建设”内涵，有必要对学科演化历史作整体性把握。只有熟悉不同时代学科发展的起承转合，把握学科的历史性特征，才有可能对学科作为“社会建制”的演化逻辑洞若观火。同时，通过深入分析作为“生命体”的学科在“遗传”“环境”影响下的“进化”过程，才有可能了解学科建设的规律，从而进一步掌握学科发展趋势。

### （一）学科演变的历史是“学科分化”与“学科结构化”的历史

自欧几里得使几何学从哲学中分离（公元前3世纪），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所引发的科学革命使物理学与哲学分离（17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使生物学从哲学和神学中分离（19世纪中叶），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哲学中的逻辑学逐渐地形成计算机科学（20世纪末），在两千多年里，学科的分化过程持续进行。从当代一些著名的学科分类系统如联合国“国际科学与技术分类标准”（Clas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欧盟“欧洲研究一般分类方案”（Common European Research Classification Scheme）、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学科专业分类体系”（the Joint Academic Coding System, JACS）、美国学科专业分类系统（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 CIP）等来看，这些系统大致按照“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科目”等四个层级进行学科分类，无论哪一种分类中都包容了为数众多的“科目”。繁复的科目设置反映出学科系统由简单、笼统、混沌日趋走向复杂、精细、清晰，见证了人类认识的积累与进步。知识分类包容了大学学科分类，但大学学科分类更加反映学科的制度化和人才培养导向。尽管印象中中世纪大学一般设立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个学科（faculty），但在一开始

没有哪一所大学有能力囊括这四个学科。博洛尼亚大学、萨莱诺大学均发端于以法学和医学为中心的单科性大学，即使是后来被认为学科门类齐全的巴黎大学，一开始也仅开设了神学等学科，13世纪初才形成神学、法学等四个科类。但是，正如“Universes”对应着“总学”（*studium generale*），“university”的字根“universe”包含“无所不包”和“普遍主义”意蕴一样，大学扩张学术疆界的雄心可谓与生俱来。一部大学发展史就是一幅大学从“单科”向“多科”发展的生动画卷，在此过程中，大学由传统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个学科衍化为文、理、工、经、管、法、教、农、医等十余个学科大类、上千个“专业”（“教学计划”）。尽管人们形容从近代到当代学科经历了综合—分化—综合的演进，但是学科的分化是知识演进的主流，综合是分化基础上的整合，今天人们普遍感到学科综合化的挑战性恰恰源于学科分化趋势的不可逆转。

学科分化的历史同时是“学科结构化”的历史，后者代表学科组合与联系方式。不同类型的学科从来不是平行的排列，而是形成一个权力的矩阵，这集中体现了学科内部的等级制度。学科等级制度不仅区分了“学科”与“非学科”，回答了在某一时代“什么学科更有价值”，同时揭示了学科发展过程中内部“权势转移”的过程。从中世纪以来，大学的中心学科相继经历了神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递嬗。中心学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强势学科，它主导了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范式，反映学术研究的热点和趋势。此外，学科内部“中心”与“边缘”“高级学科”与“低级学科”的变化反映了不同学科社会地位的差异，是一定时期学者、政府、大学领导者、求学者等不同社会群体按照各自的价值逻辑进行建构、运作的结果。各个群体按照不同的价值取向建构不同的等级标准，学者群体建构起专门化、规范化、理论化标准评价学科的学术地位，政府、大学领导者、求学者则按照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制造学科在声望、资源与权力方面的地位差异。与此同时，学科等级化



导致大学成为不同学科相互角力的场所。从19世纪开始，“大学就成了文科（人文科学）和理科（自然科学）之间持续紧张的场所；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现在被界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方式”。这种如斯诺（C. P. Snow）所说大学内部“两种文化”的冲突既反映了学科文化的对立，也成为今天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亟待破解的“瓶颈”。

## （二）学科演变的历史是“学科制度化”和“学科组织化”的历史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知识系统初步分化，学者以闲逸好奇开展科学研究，虽然出现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亚历山大图书馆等早期高等教育机构，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体制化时代尚未到来，学科尚处于萌芽阶段。到中世纪时期，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等不仅有了常备的教师、常设的机构（大学和学院）、对高深学问的研究、有组织的考试、授予学生毕业证书等。同时，大学以章程形式确立了其法人身份，大学所具有的“行会”资格及大学师生所享有的司法特权、免除赋税和兵役、罢课和迁徙、教师参政、审定教师资格等一系列特权不仅缔造西方“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传统，同时也开创了早期学科制度。当17、18世纪英格兰大学对工业革命和社会需求不闻不问之时，科学家以自发的方式组建“无形学院”不定期地举行科学讨论会，分享各自研究成果。在英国皇家学会（1660年）的推动下，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从自然哲学中分化出来。此后，法兰西科学院（1666年）的建立不仅使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开始受到政府的管理指导，同时更开启了科学体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的历史，这也是近代学科制度化的关键之举。而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不仅奠定了整个现代大学的思想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基础，而且也成为现代大学学科制度化的里程碑。此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格拉斯哥大学所开展的“课室”（Classroom，1762年）改革则标志着大学人才培养制度的

突破。从斯密时代起，课室逐渐成为新型教育场所，课堂中的学科训练、考试促进现代学科“规训”方式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德国大学进一步地发明了“习明纳”(Seminar)，后者被广泛地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研究所(Institute)、医学的临床试验(Clinic)和人文社会科学研讨班(Seminar)中。19世纪下半叶，习明纳由德国传入美、英、法等国家，逐渐成为西方现代大学普遍采用的教学方法和模式。总体而言，19世纪德国大学首创的研究所、实验室、习明纳、讲座制、编外讲师制、大量的实验室技术、专业学术刊物等不仅帮助德国摘取欧洲的工业桂冠，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成熟。自中世纪以来，“学部”“学院”“讲座”“学系”“跨学科学术组织”代表了不同时期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基本形态。巴黎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最早是由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行会组织，其内部包括按民族、来源不同结成的学生组织“同乡会”(Nation)和按学科差异组成的教师组织“教授会”(Faculty)。教授会组织具体的教学活动，是“教授一门学科(如文学、法学、医学或神学)的教师团体”。到15世纪，由教授会演变而来的“学部”成为中世纪大学最基本的学科组织形式，这是大学学科组织发展的第一阶段。此后，在巴黎、牛津与剑桥，“学院”逐渐兴起。学院(College或Hall)原本是为贫穷学生提供免费住宿之所，后逐渐引入教学、管理职能。尤其是牛津、剑桥的“寄宿学院”制度进一步催生了“讲座制”和“导师制”。“讲座制”和“导师制”不仅奠定了牛桥富有特色的教育传统，同时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大学学科组织的中心从学部(Faculty)逐渐转移到学院(College)，此为大学学科组织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学科组织发展第三阶段，德国大学“讲座制”趋于成熟。这一制度可视为对牛津莫德林学院“讲座制”、苏格兰大学“分科教授”的继承与创新。19世纪时，柏林大学率先在学部下设立研究所或实验室，讲座教授作为相关负责人直接领导研究所、实验室的学术工作。总体上，讲座制、研究所、实验室

和习明纳等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大学学科组织的基本模式。该系统以“大学—学部—研究所或讲座”为主要结构，研究所/实验室作为组织载体，讲座教授扮演学科“灵魂”。上述组织形式确保了洪堡所主张的大学应在最深入、最广泛的意义上培植科学，并使之服务于全民族的精神和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学科组织的第四个阶段是美国大学“学系”制度的建立。学系规避了“讲座制”下高级教授滥用权威而对学科造成的伤害，同时，它还顺应了“知识民主化”潮流，为新兴学科的成长预留了空间。此外，它还有利于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促进教师间的相互协作。“学系制”与“选修制”相互促进大大拓宽了学生的专业口径，优化了学生的知识结构。事实上，不同时期所涌现出的大学学科组织并不完全取代原有的形式，在不同社会体制和学术传统影响下，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学科组织自上而下基本采取“三级”学科组织模式如德国的“大学（学院）—学部—讲座、研究所”、法国的“大学（学院）—学部—讲座”、英国的“大学（学院）—学部—系”、美国的“大学（学院）—学院—系”、日本的“大学（学院）—学部—讲座”模式等。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学科分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大学学科组织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其中尤以大学“跨学科组织”的兴起最为常见，这是大学学科组织演化的新阶段。新设立的学科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知识生产专门化与知识应用综合化的张力，从而为学系、讲座、研究所等传统学科组织在大学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制度空间。

**（三）学科演变的历史往往是“学科中心”转移的历史不同国家间学科的发展不仅有先后之分，更有强弱之别。**

一定时期，学科发展水平的差距会形成该时期世界范围内学科的“中心-边缘”结构。所谓“一流学科”就是那些执当代学术“牛耳”，左右着同时代学科发展走向的学科中心。自近代以来，意大利（1540—1620年）、英国（1660—1750年）、法国（1760—1840年）、德国（1840—1910

年)、美国(1920至今)相继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科学中心”源自一系列“学科中心”的汇聚,因此,“科学中心”转移往往是“学科中心”的递嬗。学科演变的历史即指不同学科中心在某些国家相继崛起,又在不同国家之间转移的历史。如15-16世纪时,意大利在天文学、解剖学、力学、数学、博物学等学科领域先声夺人;16-17世纪,英国成为近代力学、化学、生理学等学科中心;18-19世纪时,法国自然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科学建立稳固联系,法国学者在热力学、化学、天体力学等领域引领世界潮流;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有机化学、量子力学等学科跻身世界前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在广泛的学科领域处于世界前沿,确立了其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地位。参考QS世界大学学科和专业排行榜、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等评价工具,美国大学在若干学科领域优势明显,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各国对于美国在诸多领域学科中心地位的认可。

#### (四) 学科演变的历史就是学科与外部世界紧密互动的历史

人们将柏拉图的学园形容为“漫游各国的学者的智慧乌托邦”,将具有鲜明宗教色彩远离世俗生活的中世纪大学称作“象牙塔”,把近代大学看作“由知识分子垄断的工业城镇”,把现代大学形容为“充满变化无穷的城市”。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动力站”、信息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发电机”。大学在经济社会中地位的获得“取决于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取决于这种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结构和特点,取决于知识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

大学能够从边缘走向经济社会的“中心”、实现民族复兴的“重器”,其关键在于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首先,学科建设为缔造民族国家发挥作用。在近代德国形成过程中,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率先以德语取代拉丁语进行授课,又大力推动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研究。两所大

学不仅缔造了 19 世纪德国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而且对近代德国走向统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8 世纪以后陆续出现并在 1850—1945 年间各自实现了学科化、专业化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新兴学科，正是在 16 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人口增殖、海外扩张背景下产生，同时又进一步塑造了西方诸国。其次，学科建设直接为民族复兴作贡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立志将柏林大学建设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学术机构的顶峰”，他延揽了当时“在各自的专业上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可以说，学科建设不仅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也开启了德国的强国之路。再次，大学服务社会凸显了学科建设的市场导向。以美国赠地学院学科建设为例，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将社会需求作为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在此过程中，学校不断强化大学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意识。赠地学院一共有 105 所，这些学校有不少后来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当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这些在早期阶段因其广泛开设农业、工艺等新的学科专业而一度被人讥笑为“放牛娃学院”（Cowboy College）不仅对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也成为世界应用型高等教育发展的典范。

### （五）学科演变的历史就是学科从国际化到民族化，再到全球化的历史

中世纪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国际性机构，这是一个在教会主导下、以拉丁语为统一教学语言，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秉持统一的学术标准，开设基本相同的课程，相互承认学位的教育大市场。到了中世纪后期，在宗教分裂与政治争斗之下，大学被不同国家和不同教派划定自身势力范围，除了思想控制的需要，大学和民族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阻止而不是鼓励学生的流动，以此阻止资金流向国外以损害本地商人和手艺人的利

益。此外，许多欧洲国家或规定某些职位提供给特定大学毕业生，或以剥夺公共职务来强化进入国外大学的禁令，大学日益成为服务贵族和世俗王权的工具。是时，“世界性”大学日渐退化为范围有限的“国家”大学，这导致该时期大学学术水平与学术声望跌入谷底。进入近代以后，科学突破性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加深，“科学无国界”观念推动着大学突破国家壁垒再次走向国际化。闵希豪生（G. Adolf von Munchhausen）明确地主张，大学必须通过吸收大批显要人物和外国学生，才能给国家带来财富并支付大学的开支。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创办柏林大学过程中，进一步坚持了大学的国际性导向。在教师聘任过程中，柏林大学放眼全欧洲，它所聘任的教授都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学者。有文献称19世纪英国约有9000人左右留学德国。同样，德国大学也成为美国青年心目中的“麦加”，据估计仅柏林大学一校前后接纳的美国留学生就超过万人。大学的成功、学科的崛起是师生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固然不能抹杀德国师生对于德国大学崛起的贡献，但国际学生所付出的努力同样不应被忽视。

20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大学的衰落与美国大学的崛起进一步印证了国际化对于大学的影响。1933年以后，由于纳粹政权发动“文化清洗运动”，大批德国科学家和大学教授背井离乡逃亡到美国、英国和北欧。受此影响，德国逐渐失去了它作为“世界化学研究中心”“世界物理研究中心”“世界数学研究中心”的地位，最后，它整体上作为“世界科学研究中心”的位置也被美国取代了。在犹太难民集中到达的1933—1941年间，来自德国、奥地利的难民合计104098人，其中的“知识难民”约7622人，他们中包含1090名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文化流亡者。也正是他们，成了美国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今天，世界上至少有250万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从事海外学习、研究工作。美国国际教育学会统计，即使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年度，美国境内仍有国际学生125万人。这些国际学生每年带来近400亿美元的直接收益。不仅如此，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者大约有40%永远留在了美国。因此，学科国际化为美国大学和国家的繁荣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概括了自中世纪以来学科演变的过程。需要强调，这种对于学科演变历史的梳理绝不是为了回到历史，因为此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勾勒了当前学科建设的理论图景，它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大学学科建设的趋势、特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当下的学科建设呈现出知识生产越发细密，学科分化不断加剧；学科结构不断调整，技术科学日益显要；学科制度逐步成熟，学科壁垒日益明晰；学科组织渐趋多样，机构形态不拘一格；学科中心屡经更替，学派作用日益彰显；学科、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功利导向不断加深；学科交流日显重要，国际化趋势不可逆转等倾向。把握学科发展特征与趋势不仅深化了我们对学科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为我们谋划新时期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新时代学科建设提供了某种值得借鉴的方向。

### **三、基于学科本质与演化逻辑的新时代中国大学学科建设路径**

“新时代”对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它同样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新阶段。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开启之际，学科建设如何聚焦新时代、服务新时代、贡献新时代？要回答上述问题，核心在于深化学科本质认识，准确把握学科建设内涵，遵循学科演化逻辑，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学科建设新模式、新路径。

#### **（一）根本动力发力：促进大学学科知识创新**

学科的知识禀性决定了知识创新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内源性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只有持续研究解决本学科有关的实践或理论难题，不断创造新知，推动人类认识进步，才能求

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以“知识创新”为核心任务的大学转型、升级任务更加迫切。这是因为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21年4月，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这样战略目标靠的是什么？主要是靠创新，核心是科技、知识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是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教育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双一流”高校在科技创新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为此，要努力将我国“双一流”高校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方向，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 （二）基本职能深化：实现大学学科产、学、研深度融合

新时代的大学学科建设，既要尊重知识创新的内在逻辑，更要遵循社会需求的外在逻辑。学科建设要力求在大学—政府—社会良性互动中提高自身履职能力，让大学真正心怀“国之大事”，发挥“国之重器”功能。根据中央对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的一系列部署，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应力求拓展和深化大学学科职能。如在科学研究方面，各高校应进一步深化基础研究，同时，要进一步聚焦量子信息、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领域”和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要力求在上述领域发挥关键性作用。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高校要为我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智力支撑；为国家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关键领域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作出独特贡献；在人才培养方面，各高校要以超常规方式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国际顶尖人才”。“双一流”建设不仅是对我国“重点大学”“重点学科”等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继承与超越，更意味着我国“双一流”大学的“提质增效”“赋权赋能”，它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一招。

### （三）治理能力提升：实现大学学科建设走向善治

“双一流”背景下，大学学科建设不仅仅着眼于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质量的提高，也不仅仅关注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面提升中国大学的名次，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转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体系，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与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治理结构，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优化与创新。为此，“双一流”建设引入了“治理”理论和工具，这预示着“双一流”建设内含着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诉求。所谓“学科治理体系”指的是围绕学科发展战略，通过科学合理的学科制度建设，优化学科组织，创新学科文化，形成较为完备的学科治理结构。所谓“学科治理能力”是指通过一定的学科制度设计、组织变革、文化创新等手段促进学科发展。学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着眼点是学科运行的体制、机制改革，其判断依据是学科组织的“良序”“善治”“高能”。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国大学“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特定的内涵，它强调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借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先进经验基础上，以“高等教育强国”为战略目标，聚焦大学学科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职能，不断按照“世界一流”“中国特色”的价值追求，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实际相结合，制订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学科制度体系，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治理结构

与学科治理模式；通过不断优化学科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大学学科治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促进我国大学学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可持续发展。

#### （四）使命愿景升华：树立创建“世界学科中心”愿景

创新驱动发展已经上升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建设“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为此，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已经制订了明确的目标和发展战略，力求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和一流大学建设方面实现实质性突破。建设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求我国一大批学科要跻身“世界学科中心”的行列，这意味着这些学科不仅汇聚世界顶级学科专家，建设世界先进的学科设施，更为根本地是要在研究方向上引领相关学科的世界潮流，成为相关学科原创性思想、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策源地，更要努力成为学科发展范式的引领者，这才是我国“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初心”与“使命”！在建设世界学科中心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明确学科之“果”集中表现为一系列前沿工程与技术学科，但学科之“根”是基础学科建设，因此，“世界学科中心”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助推一批应用学科成为世界中心学科，也要着力促进一批基础学科成为世界中心学科。同时，建设“世界学科中心”既要积极推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走向世界学科中心，也要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走向世界。要努力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为讲述中国故事、揭示中国经验、诠释中国道路的重要载体，使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为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可借鉴的有益经验。

“近代以来，几乎每个学科进步的背后都有学派的身影，甚至一些学科本身就是由学派所开创”，因此，在建设“世界学科中心”的路径方面，要从世界学科变革的规律和前沿出发，积极摸索“现代大学学派”的形成过程与作用机制，在坚持“以我为主”同时，要充分利用全球科

技资源，突出开放、交叉、应用为导向，不断开拓新的学科领域，提出学科研究新范式，引育学科高峰人才，产出学科标志性成果，健全学科组织建设，培育优良学科文化。

### （五）交流合作提质：实现学科发展高水平国际化

大学国际化是知识、智力资源的国际交流与互动，它是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从古代到现代，大学经历了朴素的、自发的国际化到内涵更加丰富的、主动的国际化的转变。事实证明，只有在更加开放、更为深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才能保证大学水平的卓越。在“后疫情时代”，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我国大学国际化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只有不断实现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交流，不断吸收国际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学习借鉴世界著名大学办学治校育人的成功经验，以提升自己的效率和质量水平的开放系统，才能尽可能短的时间达到世界高等教育的最先进状态。另一方面，只有经由国际化才能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国际地位、扩大我国大学国际影响，发挥我国大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知识引领和人才支撑作用。当前，“逆全球化”“保守主义”思潮对大学国际化造成严重冲击，持续推进大学国际化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但是，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应当指出，在我国研究型大学愿景和使命中，鲜有世界一流大学的气质、内涵和勇气，尚少见到培养全球公民的提法，更少见到培养世界领袖的提法。这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极不相称。我们的一流大学要更多地思考如何把国际化融入大学教学、科研和服务的各项工作中，不仅把国际化作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而且更要把国际化看作大学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更加重视大学国际化精神、制度和文化的建设。

本文通过大跨度、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对于学科本质及其演化

逻辑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和概括，这对于丰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同时，对于深入推进“双一流”实践具有一起的启发意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学科与科技、社会的共振效应愈发明显，“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引导着大学学科组织、学科制度、学科文化变革走向深入。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面临新的环境与挑战，学科发展引领高等教育体系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现代化进入关键阶段，以“双一流”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方兴未艾，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关键机遇，如何准确把握世界现代学科发展趋势，如何有效发挥我国大学学科建设制度、文化、政策优势，通过积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创新性的学科发展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学学科发展模式。这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同时是我们向世界呈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应有之义。

本文原刊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第148页—158页。

# 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

孙其信

在党和人民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节点，面对“两个大局”的深度交织融合，党中央、国务院擘画和部署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战略图景和行动路径，“双一流”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目标、新任务、新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应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生力军作用，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为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注入强大活力。

## 立足“两个大局”——

###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时代意蕴

“两个大局”是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深刻洞察国情世情、主动应对风险挑战、着力破解复杂局面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学习领会“两个大局”重要论述，深刻理解世界大发展大变化大调整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和挑战，是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重要时代背景。

乘胜而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全面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这些无不彰显了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为描绘中华民族未来图景奠定了坚实基础、增强了发展信心。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正处在如此宏大的历史进程和历史目标下，“双一流”建设高校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格局震荡交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危，更是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

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飙升至近十年来的最高水平。我国作为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保障粮食供给事关重大。同时，为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中国将加快突破种业等农业核心技术。因此，在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战略谋划上，唯有精准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在大局中认清形势、在变局中寻求突破。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我国正处在重大发展关键期，只有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厚植发展优势、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发展活力、扩大发展成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一年，也是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开局之年，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既要“补短板”，也要“锻长板”，要充分发挥“双一流”建设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作用，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和水平。

## **心怀“国之大事”——**

### **高质量、高水平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初心使命**

当前，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涉农高校只有心怀“国之大事”、服务国家急需，发挥在农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中的支撑作用，加强农业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才能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勇担服务国家重大急需的中流砥柱。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作善成，更加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同心同向，确保党中央的要求落地见效。回应党中央关切，“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坚持以服务重大决策部署和满足人民美好期待为重要使命，发挥“顶天”的引领作用，履行“立地”的角色担

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党中央把种业创新、种源自主可控作为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命题，因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涉农高校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

做践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正在兴起，科技创新的投入强度、探索深度、发展速度和成果精度显著提升。科技创新已成为深刻影响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目标得以实现的核心因素。从“科技自立自强”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潮流、立足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涉农高校要坚持“四个面向”，审时度势、抢抓机遇，为推动中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贡献智慧和力量。

扛起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使命。人才是强国之根、兴邦之计、富民之基、教育之本，是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也对高校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双一流”建设高校要在机遇与挑战的双重考验中寻求人才发展新思路，担当起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加强一流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战略科技力量，为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撑。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实现创新引领。“三农”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双一流”建设高校特别是涉农高校要发挥在产业、人才振兴方面的优势，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撑，为“三农”人才队伍锻造精兵强将，在农村广阔舞台上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 矢志“追求一流”——

### 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的铿锵行动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作为“双一流”建设高校，中国农业大学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高质量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心怀“国之大者”，以9个一流建设学科带动学校整体高质量发展，为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9个一流建设学科具有支撑创新发展的平台基础，在分子设计育种、兽医公共卫生、营养与健康、绿色发展、智慧农业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关键技术。在“9+1+X”学科建设思路下，一流学科将带动相关支撑学科共同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农业基础研究布局，深化种业、耕地、农机设备等科技支撑，推进分子设计育种前沿科学中心等重点平台建设，紧跟趋势、主动布局，拿出具有“国之大者”重大意义的硬核技术，产出一批高水平重大成果，真正成为推动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

自主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中，坚持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立足9个一流建设学科优势，形成“补短板、锻长板”发展思路，打造“主干学科+支撑学科”建设体系，以一流学科建设推进高质量知农爱农新型人才自主培养。特别是要承担起基础学科人才培养重任，进一步引领全国新农科建设，筑牢“强基计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坚持“五育”并举，完善教育评价体系。

坚定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全面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强化9个一流建设学科定向精准引进人才，提升人才引进质量及其与学科的精准匹配水平。启动战略科学家及相关人才培养支持行动，加快推进“315工程”升级版，深入实施“2115工程”升级版，坚决破除“五唯”顽疾，完善人才评价体系，推动学校人才队伍呈现活



力迸发的良好态势。

紧扣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9个一流建设学科的师生力量，构建各具特色的社会服务工作体系和平台基地，完善由地方产业研究院、地方乡村振兴研究院、科技小院、教授工作站、校外实验站、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组成的“三院两站一体”新型社会服务网络体系，充分发挥“全国乡村振兴高校联盟”的作用，切实带动学校整体持续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以新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创新体系。积极打造世界农业学科顶尖院校合作交流平台，发起创建世界顶尖涉农大学联盟。与世界一流涉农大学达成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办学项目取得重大进展。持续提升学校在世界一流学科排行榜上的显示度和在全球农业教育科技领域的影响力、话语权，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中国方案，积极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22年6月27日第五版高教周刊栏目。

## 高等教育研究的重新定位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9007)

**摘要:** 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高等教育研究可以生产知识也可以建构意义。无论致力于知识生产还是意义建构, 高等教育研究的首要作用都在于对高等教育现象作出独到的解释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或公众分享。由于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为性”, 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对于高等教育实践的改进具有不确定性。实践中那些切实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观念或政策未必具有智识意义上的学术价值, 而那些学术意义上的经典文本也未必都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基于此,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不能忽视但也不宜高估, 高等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深刻认识高等教育现象, 并建构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和意义世界。

**关键词:** 高等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实践; 高等教育理论; 知识体系

高等教育研究到底为谁而研究? 为何而研究? 一种观点认为是为同行而研究, 即通过论文发表获得同行的承认,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为政策制定者或实践者而研究, 即通过政策研究或对策研究获得政策制定者或实践者的承认。两种研究取向各有合理性, 但也因各自定位的主观性而均有局限。那些以获得同行承认为取向的研究容易脱离实践, 成为同行之间的文字游戏; 那些以实用或功能性为取向的研究则容易脱离知识或学术的逻辑, 成为政策或对策的注脚。当前, 一方面在学科建设逻辑下, 高等教育研究有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 另一方面在政策驱动改革逻辑下, 高等教育研究又有追逐热点、诠释政策的倾向。两种倾向相对独立又相互牵连, 使高等教育研究陷入一种愈追求实用愈不实用、愈不实用愈追求实用的吊诡境况。

高等教育研究要成为一门科学或学术性的学科, 需要调整研究的视

野和价值取向，重新定位。高等教育研究不能不考虑需要服务的对象，但也不能忽视研究本身的学术价值。虽然社会需求对于科学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科学研究毕竟不是服务贸易或大宗商品，既不能让供给决定需求，也不能让需求决定供给。“科学不仅仅是深奥的专业化研究，有形成果也并非公众应从科学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它也不应该是公众在念及科学时唯一应想到的内容。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它最根本的贡献。”<sup>[1]</sup>高等教育研究需要直面高等教育问题的多歧性，也需要坚持或重申“知识本身即为目的”<sup>[2]</sup>。无论作为一门科学还是学科，高等教育研究都不能专门为某些人、某些部门或特定的利益群体服务。高等教育研究的目的或宗旨应该是对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现象或问题作出独到的解释或理解，并与所有愿意了解或思考这些高等教育现象或问题的人分享。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的知识，学术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整体结构将实现最终目标；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规范或精神特质就是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sup>[3]</sup>高等教育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如果要称为科学研究的话，就绝不能只是为同行所分享，并只被同行所承认，也不能只是为特定利益相关者或当权者所采纳，而是要能够作为公共知识在全社会自由流通和分享。高等教育研究不仅要深刻揭示高等教育现象的本质，有助于增益全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现象或问题的独特性理解，而且还要具备为其他学科知识生产提供助益的潜力。

### **一、高等教育问题的多歧性**

作为学术组织，大学是“人造物”，以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系统也是一种人为的社会系统。与大自然的生态系统相比，人为的社会系统更加特殊，其运行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无论它如何复杂，都遵循客观的生物法则，一旦发现了其中的规律，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就具有高度的可理解性和可预测性，可以化复杂为

简单。相比之下，“人类是一种能用策略取胜和能进行自我论证的动物，并且人类还能够通过组织和各种强制性手段来达到目的。人的这些特性破坏了在自然世界中广泛存在的结构和功能的统一”<sup>[4]</sup>。与其他生物主要以本能在自然界谋求生存相比，人类的优势在于自由意志和智能。自由意志和智能帮助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但在系统建构的层面上，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意志和智能也经常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和愚蠢。“生物是没有智力的，但是生物系统却都是有智力的；人是有智力的，但是人类社会却是没有智力的。”<sup>[5]</sup>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大学汇聚了人类最聪明的头脑，算得上是理性的或最理性的组织，但事实上，大学组织有理性又并不理性，高等教育系统是理性的系统却又未必是“聪明”的系统。“由于人类的注意力只能聚焦在很小的范围，因此唯有建立系统才能成功提升效率。……社会系统和其他系统借着确定相对有限的行动可能性，化约了原则上无穷复杂的环境，以此让‘提升效率’得以可能。……系统本身也会再次建立起一个复杂的结构。”<sup>[6]</sup>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人类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同样有着其他社会组织、制度与系统的各种不足和缺陷。大学人作为社会人，也同样有着社会上普通人所具有的各种缺点或弱点。高等教育系统中也会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等级和特权，也会有机会主义者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从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结构的漏洞和缝隙中为自己拿好处，普通人也会通过各种方法来逃避对自己不利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结构，那些主流研究范式的反抗者也会破坏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结构的有效性，甚至摧毁这些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结构。不同学科的学者也经常会运用意识形态来论证自己所认可的行为的合理性或不被自己认可的行为的不合理性。<sup>[7]</sup>

长期以来，有一种误解认为，大学之所以基业长青，主要是因为大学的制度如何优良、理念如何先进，大学人的品德如何高尚且善于治理，抑或大学能够从中世纪一直存在到现在就证明了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安排

是好的，大学人也是善于经营”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以当下大学发展的结果上溯可能的原因在逻辑上并不充分。如果这种“历史证明”在逻辑上能够成立，大学可能就不再需要周而复始的改革和持续的创新，也无法理解长期以来关于大学危机与崩溃的学说何以层出不穷。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没有哪种组织和制度安排是超稳定的，更没有哪种组织可以永远基业长青，而是始终存在被颠覆或废除的可能。历史上，大学不是没有被废除过，而且至今仍有被废除和替代的危险。因此，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大学能够从中世纪一直存留到现在，与大学的理念、制度安排以及大学人的品质之间可能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更可能是大学理念、制度和人之外的其他原因决定的。因此，更准确地说，尽管大学理念、制度和大学人与其他理念、制度、行动者一样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经过不断地调适和反复修正，并得益于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机缘巧合”，大学仍然从中世纪一直存在到了今天，并蓬勃发展。与简单的结构-功能主义或神圣化解释相比，后一种解释或许更符合历史事实。现代以降，以大学为主体的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确实主要不是得益于大学的理念如何先进、制度如何优良，大学人的品德如何高尚或高等教育系统如何稳健，而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更主要是得益于外在的社会需要，尤其是民族国家的支持，在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不排除有运气的成分存在。“幸运也是关键的，因为历史总是会按照偶然方式前行”<sup>[8]</sup>。

实践中作为一种组织，大学的职能是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也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但现代以降，在专业主义和优绩主义的驱动下，大学已经不只是一种社会组织，而是成为一种知识分类和人才筛选的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大学的存在主要是为现代社会的有序运转提供支架或支撑。与组织层面的具体职能对于效率的追求不同，大学在制度层面上的功能主要是为了满足合法性的需要，即基于大学和政府之间默认的机会

协议和社会契约，确保个体通过大学接受完高等教育之后，可以凭借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和社会融为一体或连接在一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大学开设有相关的专业和课程，通过相关专业和课程的学习可以提高个体的知识水平或专业能力，以便为从事某项知识型工作作好准备；但实质上，个人之所以选择进入大学，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学历、学位证书。具体的知识、技能在大学之外也可以学习和获得，且很容易遗忘或过时，而大学所授予学历、学位证书的象征性则是不朽的。“它就像是对社会归属的证明，对强制的政治秩序表忠心。”<sup>[9]</sup>在精英体制下，学历、学位证书可以赋予受教育者某种特殊的身份标识，甚至是精英的头衔和社会地位。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学历、学位证书要远比在学期间学习的具体知识技能更重要。当然，高等教育实践中知识技能的学习与学历、学位证书的获得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分裂的。要获得学历、学位证书，必须在专业知识技能方面达到相应的要求或符合某种标准；同样的，要想使学生在校期间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技能，也必须以授予相应的学历、学位证书为激励或承诺。与之相应，大学在组织层面上对于效率的追求与在制度层面上对于合法性的满足也是“两面一体”、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大学要不断强化学科、专业、课程建设，以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为中介，增加其作为专业性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大学又要适应现有精英体制对于高层次人才筛选，为现代社会对于卓越和优绩的竞争提供制度性保障。

本质上，作为学术和文化组织，大学是保守的。大学的制度安排很少迎合同时代人意识到的客观“要求”。<sup>[10]</sup>当前经济和教育的全球化强化了大学的可比性与竞争性，不同国家、地区的大学在各类排行榜的引导下积极参与对学术锦标的角逐。“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驱动了定义21世纪大学的热潮。”<sup>[11]</sup>为了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竞争中胜出，大学

主动迎合市场的需要，并根据市场的需要在制度层面作出调整。实践中迎合时代需求不一定是坏事，不迎合时代需求也未必一定是好事。但迎合与不迎合的态度反映了大学定位与办学宗旨的变迁。在不迎合的时代，大学的发展相对独立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通过生产和传播高深知识与外部世界间接发生关联，此时大学作为学术和文化组织其边界是相对清晰的。简言之，大学是大学，社会是社会。而在迎合的时代，大学的发展融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大学发展或发展大学的主要目的。此时大学作为准市场组织或类似企业组织其边界的可渗透性显著增强，大学、政府、企业之间构成三重螺旋关系。<sup>[12]</sup>在不迎合的时代，强迫大学迎合时代的客观要求会误导大学的发展，同样在需要迎合的时代，如果拒绝时代的需要，也不利于大学的发展。对于大学而言，不迎合不意味着故步自封，迎合也不意味着放弃自我。无论迎合还是不迎合，大学发展与时代之间都要保持一定的或适度的张力，即在抵抗中发展，在发展中革新，否则大学的组织边界将会瓦解，大学将会失去底线。<sup>[13]</sup>关于“迎合还是不迎合”，现在真正的挑战是，在高等教育趋于高度普及化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我们如何加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学历、学位的贬值都不可避免。基于此，即便从机会的角度讲，可以保证每一个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都有机会上大学，但从政策的实际效果看，让每个人都上大学又未必是最好的选择。<sup>[14]</sup>

理论上，大学的理想是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但现实中大学经常不是在追求真理，也不是在实现人的卓越，甚至是在从事与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相反的工作。对于这种情况，一种哲学式的反应就是将其斥为“伪大学”或“伪教育”，并试图通过真伪之辩来为“真大学”和“真教育”正名，最终意在说明那些没有致力于追求真理和实现人的卓越的大学是有问题的，是不正常的，并且这种不正常的状况是可以通过教育改革来加以改变的。但事实绝非如此简单。当事实与理论或现实与理想不一

致时，并非一定是实践出了问题，也不是一定可以通过改变事实、现实来证明理论或理想的正确，有时也需要反思理论的假设。那些被研究者以经典大学理念为参照，被认为是“伪大学”的大学，被认为是“伪教育”的教育，也有可能是大学和教育在现实环境或真实世界中的正常状态。相反，那些研究者理论陈述或逻辑演绎中的“真大学”和“真教育”却很可能是一种“异常”或“超常”。当然，所谓“正常的”并不意味着好的”或“完美的”，相反，“异常”或“超常”有时才是值得我们持续追求的。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无论我们对于应然赋予多么重大的价值，也无论我们多么地渴望完美，一所没有致力于追求真理的大学仍然还是一所大学，那种没有致力于实现人的卓越的高等教育也仍然还是真实发生的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应关注或重申大学的理想和真教育的实现，但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两种研究各有价值，合在一起会更有价值。大学的理想或理念并非不重要，而是至关重要，但高等教育研究之所以为科学研究，必须从现实的问题出发，而不能完全植根于理论假设或寄希望于学者个人的情怀。现实社会中，无论大学还是高等教育，更多的都是一种制度性存在，大学的办学水平或高等教育质量的高低也并非判定一所机构是不是大学和一种教育活动是不是高等教育的关键性因素。大学之所以为大学，高等教育之所以为高等教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方的认可或制度性的规定，而非是否符合某种大学理念或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如索维尔在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性分析中所言：“无论有多么失望，一个坏警官终究也还是一个警官那样，一位肤浅、糊涂或者不诚实的知识分子，终究还是这种职业中的成员，并且也还很有可能会被当成该职业中的典范。一旦我们明确了这一点：当我们说到知识分子时，我们所谈论的是对一种职业种类的描述，而不是对此职业中的人们所给予的尊称或所赋予的一种定性的标签，对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这样一种职业性的界定后，我们就可以审视这种职业的特征，了解这种职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激励及



限制因素，以便看清楚知识分子的那些职业特征是如何与他们的某种行为方式相互关联的。而我们想要最终探究清楚的最重大问题则是：知识阶层的行为，如何影响着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sup>[15]</sup>高等教育研究所面临的境况也大致如此。无论我们对于大学这类组织怀有如何崇高的敬意，也无论我们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伟大如何赞美，我们都不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标签化、特殊化或神圣化，而应从实际出发，探究大学和高等教育系统在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到底是如何运作并影响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的，尽力去理解大学的组织行为模式和高等教育系统的运行规则，并想办法弄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和大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之间存在高相关性或因果性关系，即我们时代的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究竟如何受到社会情境的激励并对社会大系统作出何种反馈及如何反馈的。

## 二、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价值分歧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研究的价值问题最容易引起纠纷或紧张。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或同一学科的不同研究取向有不同的价值诉求，但每一个学科的研究者、每一种研究范式的奉行者通常都容易高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价值，而低估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主题或方法不同的研究的价值。比如，以可转化性为标准，工科的通常会轻视理科的，理科的会轻视文科的，而在文科内部，社会科学通常会轻视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内部依然还有鄙视链。事实上，参照不同的标准，学术研究的价值永远是相对的，绝不存在一种价值绝对地高于另一种价值。无论是神学还是哲学，都曾在大学和人类的历史上闪耀过学术的光辉，而在今天的大学里，则是科学“一统天下”。由此可见，何种价值优先或占主导地位主要或完全是社会选择和时代精神决定的，而非先天注定的。“如果任意两种东西有丝毫价值，那么一种东西不可能绝对性地比另一种东西更有价值。一枚钻石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一枚硬币，但是足够多的硬币，其价值将远远超过任何钻石。”<sup>[16]</sup>就高等教育研究而言，近年来有

些实证研究者以循证为先入之见，轻视思辨研究，而思辨研究者则习惯于以“无用之用”为说辞，强行自我辩护，并试图立于思想和价值的高地驳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相互的轻视或鄙视会损害高等教育研究的合法性，撕裂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性，也会妨碍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社会承认。高等教育问题如此复杂，“歧路之中又有歧焉”，不可能完全交给那些实证研究者，也不可能完全依靠传统的思辨。事实上，只要我们坚持以理性看待科学，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亦不乏相通之处。即便最终谁都无法提供决定性的实验或证据，人们还是可以理性地讨论与比较。<sup>[17]</sup>就像基于社会契约的社会分工一样，学术的繁荣也需要基于学术契约的学术分工。只有基于合理的学术分工，才能提高知识生产的质量。高等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理论假设，而思辨研究则可以提出新的理论模型作为实证研究的指引。理想境况下，实证研究应致力于有理论的实证研究，思辨研究也应是基于证据的思辨，而不能是纯粹的形而上学。无论是哪个学科，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学术价值都是相对的、互补的，不同的研究范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支撑，构成一个整体，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最大的价值。但当前的现实情况是，愈是成熟的学科，其内部不同的研究范式、方法或分支之间愈发团结，愈是不成熟的学科，其内部不同的研究范式、方法或分支之间的分歧愈大、愈不团结。高等教育研究正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同的研究范式、方法之间相互蔑视和分离的力量远大于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力量。当下那些成熟的学科正在抛弃简单化思维，并以复杂性思维重新审视本学科历史上曾以量化方法得出的某些确定性结论；反倒是那些不成熟的学科以科学化为目标，强行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抑或尝试通过某种量化的方法以便得出某种确定性的结论。高等教育研究作为尚不成熟的学科，需要避免方法上的科学主义以及化复杂为简单的量化思维和理科思维。理科思维基于系统论和控制论倾向认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理论，

加上好的实践，我们就能把社会系统设计好。只要把设计执行到位、贯彻到位，结果应该和事先的设计差不多。这种工程师看社会的方法是有害的：社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的方向基本上都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sup>[18]</sup>。高等教育系统中不存在类似自然界的那种规律或法则，高等教育研究者需要正视高等教育系统的复杂性以及相关研究结论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重复性。“教育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现象，要在互动论、或然性、挑战与回应等方面下功夫。不要搞什么决定论、必然性、因果律。人类社会没有这些东西，跟这些东西相当的，是互动论、或然性、挑战与回应。”<sup>[19]</sup>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或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更多的是一种挑战与应答机制，需要的是一种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抑或“唤起想象的能力”<sup>[20]</sup>，而不是对于普遍法则或规律的一味遵循。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流变或流动的，其背后缺乏甚至没有清晰的因果链或必然性，而更多的是可能性和或然性。换言之，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通常没有什么事是注定的抑或“总是”发生，很多的事只是“有时候”发生抑或“应该”发生。最终，“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个体和社会的创造性。

一般来说，学术研究的客观性与可信性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者的学术道德，另一个是研究方法。研究者的学术道德亦称为智识美德，即从事学术研究者要尽可能做到价值中立，学术研究的结论不要受与学术无关的因素的影响。但事实上，在道德层面学术研究者 and 普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仅凭道德的约束没有人可以做到不偏不倚或价值中立，尤其是那些本身就深受价值影响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因此，实践中真正保障学术研究客观与可信的主要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只有基于一种可检验或可重复的方法，学术研究的结论才能在同行之间达成理性的共识，并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科学的方法能够达到客观，但是科学家却不能够做到完全客观，也不需要做到完全客观。就此而言，

数学家也不是客观的，但那并不意味着二次方程或勾股定理仅仅是一些意见和观点。事实上，发展和同意科学方法的整个意义都在于去寻求可靠的信息，而不依赖于特定科学家个人的主观信念或偏好，也不依赖于对大多数科学家都做到客观的任何希望。如果科学家自身都能够做到客观，那就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去努力设计出一致同意的客观的科学方法了。”<sup>[21]</sup>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受研究对象的性质的约束，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自然科学以实验为主，可以重复检验，人文社会科学的实验却很难进行；即使勉强实验，其科学性也无法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人文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受问题的多歧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及研究方法自身的局限性约束，很难生产出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线性的可积累的知识或实现“累积性进展”。<sup>[22]</sup>学术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强行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范式上自然科学化或理科化会适得其反。如爱泼斯坦所言：“尽管科学能够线性地不断向前发展，但法律却做不到线性发展。在法律这里，同样的洞见与错误总是一再地发生。”<sup>[23]</sup>不只是法律“做不到线性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做不到，也不需要做到或不可能做到。究其根本，“一旦我们了解了某个社会规律，该规律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就改变了”<sup>[24]</sup>。对于自然界的运行，人类需要的是积累知识，掌握客观规律，因为自然规律一旦被发现，就不会或很少会再改变；而对于社会的运行和变迁，人类需要的则是去创造历史。因此，在物理学定律的意义上，任何社会科学中的规律都“不是一条真正的规律”，因为“它是可以避免的”而不是注定的。<sup>[25]</sup>人类可以为社会立法，但无法发明或发现社会定律。“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不是通过一种固定的结构就能彻底解决的。社会系统的基本问题总是只能暂时地以某种形式相对成功地处理掉。这些问题在适当的情况下也可以用别的形式和结构来解决（但也依然只是暂时解决）。”<sup>[26]</sup>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的基本问题也同样只能暂时地以某种形式相对成

功地处理掉，而不是彻底地解决。高等教育研究者可以生产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甚至提出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规律，但无法单独创造高等教育的繁荣。

回溯历史，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经历了最早的神学范式，后来的形而上学范式，再到当下的科学范式。从历时性来看，不同的认知范式前后相继，后一种较之前一种更合乎认知理性。但事实上，不同认知范式都有其适用范围，一旦超过了适用范围，该范式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当前科学范式居于主导，科学思维支配着学术界，自然科学关于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揭示被作为科学的圭臬也塑造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客观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没有或很少有基于决定性证据的规律或法则，而更多的是挑战与应对；但在科学主义的压力下，测量和概率统计被发明出来并被引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来驯服历史的和人生的“偶然”。“为使意见具有客观性的外表，我们用计算取代了判断。”<sup>[27]</sup>结果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统计的相关性替代了因果分析，基于统计原理的因果推断被当成了因果律，统计分布或统计规律被误以为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研究中通过收集更多更全面的数据，我们或许可以“统计”出更多的规律或相关性。但无论收集多么丰富的数据，也无论统计的技术、方法有多先进，那些统计的规律或相关性都不足以转化为牛顿定律似的社会定律。即便是被反复证实的关于计算机算力的“摩尔定律”，实际上也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定律，而更像是一种可观察的发展模式。<sup>[28]</sup>统计的规律只是表明某件事会重复发生或发生的概率分布，而定律则不仅意味着事件重复发生或发生的概率分布，而且意味着事件发生背后有某种确定性的因果律在起作用。统计范畴中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的只是抽象的数字，而不是现实中的人或事；统计规律所记录的只是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变，而不是同样范畴内相同时间里同一个体或组织的真实改变。<sup>[29]</sup>换言之，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规律或法则通常具

有强制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率统计为基础的统计规律则主要是描述事件的“有规律”的发生，其本身不具有基于因果律的强制性。根据古德哈特定律，“一旦受到控制目的的压力，任何观察到的统计规律就会立刻崩溃”<sup>[30]</sup>。对于总体或大样本而言，有些统计规律有时或许是可以重复的；但对于个体而言，任何统计规律都不具有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人的自由意志和策略性行为所导致的反馈效应甚至可以使统计规律失效。简言之，社会定律可以统计学的方式揭示自己，但它本身却不是社会定律。<sup>[31]</sup>

除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分野之外，科学本身也不只存在一种，而是存在多种。不同的科研领域有不同的思考问题的特殊方式，“生物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以视觉形象把握对象的思考能力很强，与此相反，理论物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用语言符号作为把握客观对象的思考能力很强”<sup>[32]</sup>。在认知世界和认知人类社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主导人们对于所有事物的认知。诸科学分支或学科之间有相通之处，但不同的研究对象或宏观或微观，或自然或人为，或有机或无机，或可量化或不可量化，或价值中立或价值负载，或利益无涉或利害攸关都会直接影响研究的方法和结论。自然科学中天文学和物理学不同于生理学和医学，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社会学也不同于教育学和文学。吊诡的是，现在那些曾经笃信决定论的自然科学部门已接受了非决定论和测不准原理，反倒是那些原本就不存在决定论的人文社会科学却执迷于科学主义，强烈抑制偶然性、非决定论和不确定性，力图通过方法和技术的改进来发现决定性的定律或因果关系，以证明自身属于科学的一部分。

客观而言，由于问题的多歧性，高等教育研究虽然属于科学研究，但主要是人文和社会的科学，并非自然的科学。在著名的《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迪尔凯姆很好地区分了两个领域：科学领域与教育学领域。“前者，只是单纯地涉及或描述当前或过去的事物，或寻找其原因，或确

定其结果。”“人们称为教育学的理论，则完全是另一种思辨。实际上，这些理论并无同一目的，也不采用同一方法。其目标并不是描述或解释某一事物的现在或过去，而是确定它应当如何。这些理论并不指向现在，也不是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它们不打算忠实地解释特定的现实，而是发布行为的规训。它们不向我们说，这就是存在的，为什么是这样，而是说应当这样做。”<sup>[33]</sup>与自然科学诸学科相比，高等教育研究可能是非科学的，但并不是不科学的。与自然科学对于确定性和精确性的追寻不同，高等教育研究中没有固定的或唯一的“答案”。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高等教育问题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持续探究，而只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不可能完全遵循实证主义的方法将大学的组织行为和高等教育发展还原为各种各样的数字，然后凭借统计学来发现规律。高等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或子系统，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其组织建制和制度安排受学术传统、思想史和国家政策规训，系统运行强调连续性和稳健性，相关规章制度相对稳定。这种特性决定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知识生产的创新空间十分有限。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不是越新越好，高等教育理念、制度也不是越先进越好。那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繁荣也不是因为他们掌握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同样的，那些发展和欠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水平低也不是因为他们对于高等教育规律的无知或不了解。如果真是因为“无知”造成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低和不均衡，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相对简单。“如果无知困扰我们，给统治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教育和信息就能使我们走出困境。”<sup>[34]</sup>问题的复杂在于，高等教育中的重大决策和制度安排最终是由政治决定的，而非由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或关于高等教育的共识决定的。实践中那些看似错误的决策也可能“并非是由于错误或无知，而是有目的的”。<sup>[35]</sup>与自然科学相比，高等教育研究更多的不是在生产新知识或更精确的知识而是对已有的文化传统或制度安排进行创造性阐释或转化，有时甚至不过是对于大学常识的重温或重

申。基于此，“过于注重创造力。这是误导，……我们应该专注于想象力。真正的关键是能够想象一个新世界。一旦我想象出一些新事物，然后回答如何实现目标，那么才牵涉创造力的步骤。因此，如果我可以创造性地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我如果无法想象出新的事物，那么我将陷于当前的局面”<sup>[36]</sup>。当前基于科学主义观念，实证方法被认为是普适性的、有效的知识生产工具。“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证的’科学，亦即受过自然科学方法训练的思想，是行动者唯一能贴近现实的理性之路。”<sup>[37]</sup>但事实上，由于问题性质的不同，实证的方法和技巧既能够被用来生产知识，也能够促进非知识的内容甚至是反知识的内容的生产。对于高等教育实践来说，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有时比新的或精确的知识更重要。无论如何新颖或精确，一旦脱离了具体情境，那些基于实证的知识大多是片面的、非常容易过时的，而基于思辨的想象力则永远生机勃勃。从学科建设出发，高等教育研究需要基于实证生产专门化的知识，并建构理论体系，但也不能回避基于想象力的对于意义世界的建构。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不是不需要对外部世界负责，更不是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是要在尽力通过知识生产向外部世界解释高等教育现象或问题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如何运行的同时，去想象和建构高等教育中独特的意义世界。无论如何，大学不是知识工厂，专利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大学的本质是教育机构，是让人成为人的制度性场所。高等教育研究要关注那些形而下的有用的专业化的知识生产，也要关注那些形而上的无用的非专业化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严格意义上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很难生产出纯粹客观的实用的知识，那些看似客观实用的、基于实证研究的确定性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是一种社会建构，同样难以逃脱文化传统、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 三、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的关系

长期以来，受科学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对于细小的学术问



题的精准掌握很容易激起研究者以学术研究改造社会实践的热情。但学术研究中的精英主义情结极易导致理性的自负，乃至“怀才不遇”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病。“理性容易被无条件地认为是最佳方式，而很少考虑到不同的情境中或许会有理性之外的其他方式。”<sup>[38]</sup>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学术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世界而非改造世界。事实上，不只是学术研究领域的理性思考无法直接改造世界，社会其他领域中同样也存在理性的失灵。人类社会的事务有些可以经由理性的计算得到解决，但有些则是人的有限理性无法胜任的，无法通过因果链确立一种决定论。“历史和社会根本上也包含着无因果性的事物，……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基于一种确定性的因果科学本体论，所以忽略了个体行动的创造性面向，也忽略了社会的创造性。”<sup>[39]</sup>二战以来，经过惨痛的社会实验，那种基于理性自负的计划经济的危害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在社会的其他领域，由于计划的恶劣后果不如计划经济的后果那样极端，理性失灵的后果经常为人们所忽视。<sup>[40]</sup>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教育和知识系统超级复杂，人的有限理性不足以对其进行精密的设计和严格的控制。在不可消除的偶然性和普遍存在的非意图的行动后果面前，任何想试着对大学、高等教育进行宏伟规划的意图都是值得怀疑的<sup>[41]</sup>，因为再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也会漏洞百出，甚至控制得越严格，效果就越差。但现实中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却被政府以规划之名行计划之实，在所谓的基于证据的政策驱动下，高等教育系统被人为反复地重新设计，并对其绩效进行严格的监测。

当前基于一种“被圣化的构想”<sup>[42]</sup>，研究者普遍相信凭借伟大的知识和洞识力以及崇高的德性就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变革使大学成为世界一流，乃至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其结果，在学术修辞的包装下，变革”本身也被现代派赋予了进步的含义。“就好像事物都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变革’就一定能够带来更好的改变。”<sup>[43]</sup>实践中在进步主义观念的激励下，每一次

教育变革似乎都取得了应有的成功，但高等教育本身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进，也难以改进。结果就是，为变革而变革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玩弄数字的业余人士成了行政官。事实与数字是改革进程的婢女。”<sup>[44]</sup>究其根本，人们在高等教育问题上存在着某种认知的误区或盲区——是我们缺乏关于高等教育复杂性的知识，而不是高等教育本身缺乏复杂性。改革中那些基于量化研究的政策举措看似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统计规律，实质上很可能遮蔽了高等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严格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程序和所运用的语言系统在资金结构、立法和行政指导方针、专业奖励制度方面以及在专业研究生院的课程中仍然是牢固的制度化存在，即便作为其理论支撑的认识论已不再充分。”<sup>[45]</sup>那些基于科层制逻辑的计划主义者倾向化复杂为简单，以工程思维和计划思维代替高等教育系统的自然演化。最终由政府发起的、由学术界“背书”的卓越工程或计划，被当作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标识；这些工程或计划既代表了高等教育改革中面临的严峻挑战，又象征着高等教育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兼具知识生产与意义建构的双重职能。知识生产的有效性需要接受同行评审和实践检验。那些在科学方法论指导下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能否称为知识需要接受同行专家和外部真实世界的检验。“在知识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观点是无可辩驳的。一些命题一旦暂时成为公理，就要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直到它们被取代或反驳。”<sup>[46]</sup>与知识生产相比，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意义建构尤其是理念或思想的建构极难评判。究其根本，理念或思想属于价值范畴，具有强烈的个人性和内部性。一种理念或思想是否先进或正确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也无法被实践完全证实或证伪，主要取决于个体参照何种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虽然从整体上和长时段来看，理念或思想的建构对于高等教育实践和制度安排具有很强的形塑力，但在

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理念或思想对于高等教育中重大事件的影响既很难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当前在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下，遵循学科制度化和专业化路径，高等教育研究偏重知识生产，企图在一定理论框架下，尝试通过循证的方法围绕细小的主题积累确定性的知识，并试图积小成大最终发现某种普遍性的规律或法则，以改进高等教育实践。相比之下，那些关于大学理念或高等教育哲学的思辨研究受到轻视或忽视。结果就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那些拥有实证或技术性知识的专家在各种委员会中逐渐取代拥有实践智慧的思想家或教育家而居于主导地位。从表面上看，实证的方法增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基于证据的研究结论也更接近于确定性的知识，可以令外行信服，但实质上，大量基于实证研究的碎片化的知识生产并没有显著增强高等教育研究的有效性或有用性，反倒因为理论思辨的减少使得高等教育研究丧失了学科想象力。

一般来说，高等教育研究有益于高等教育发展，这也是高等教育研究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合法性基础。但事实上，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也会产生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可能使高等教育或大学自身失去实践想象力。在高等教育研究没有形成独立的专业学术领域之前，所有的大学人都是潜在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弥散于大学的整个制度空间和组织场域，这些知识大多是基于实践的知识，以缄默的或隐性的状态存在。实践中那些伟大的大学校长就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而成为优秀的大学校长，而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大学校长而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专家。高等教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兴起之后，遵循学科制度化路径，以专业化为目标，寄希望通过学科专业建设为解决高等教育实践问题培养专家。但制度化路径忽视了高等教育活动的复杂性，简单地将学术能力与实践能力等同起来是危险的。虽然优秀的大学

校长多是卓越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但卓越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却未必能够成为优秀的大学校长或卓越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这和教育学可以培养出教师或教育学者但无法培养出教育家，政治学可以培养出公务员或政治学者但培养不出政治家，经济学也可以培养出企业管理者或经济学者但培养不出企业家是一样的道理。无论教育家、政治家还是企业家都只能经由相应的实践磨炼，如大浪淘沙一样从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而不是依靠学术训练或知识熏陶而成。正如涂尔干所言：“伟大的生理学家一般都是平庸的门诊医生。同样，即使社会学家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政治家。”<sup>[47]</sup>在学科制度化框架下，专业的学术研究者基于理性的自负容易滋生出一种危险的认知偏向，即认为学术研究与相应的实践之间存在某种线性关系，容易从学理上将实践中必然存在的某种偏差理解为行为者的不专业或不职业，并假定经由学术研究可以对这些偏差行为进行校正，并进而认为学术优异者或学历精英因为拥有了某些专业知识，更适合于担当领导者或决策者。这种假设忽视了一个关键性的事实，即学术研究是分专业或研究方向的，知识生产强调专门化，而实践活动则是整体性的，实践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总体性知识和实践智慧，而非仅仅是专业技艺。无论如何卓越的研究者能够拥有的专业知识也只限于其相对熟悉的研究领域，一旦超出了其研究领域的边界，他的知识水平或见识可能就和常人无异，甚至不如常人。正如索维尔所言：“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人士的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也仍然是无知、偏见和群体性思考。”<sup>[48]</sup>在专业的学术问题上选择相信权威可能是对的，但对于像高等教育发展这样复杂的实践问题，决策时需要的绝对不只是学术权威，更需要实践智慧。有些情况下，当“内行”与“外行”发生矛盾时，我们甚至更应相信“外行”。“就像战争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sup>[49]</sup>究其根本，专业的学术研究者很容易被“学科头脑”<sup>[50]</sup>所禁锢。专业化的高等教

育理论多倾向于强调个人或组织的“理性选择”或“理性行动”，但在高等教育实践中，行动者不可能像理性行动理论所建立的模型要求的那样行事，甚至离理性行动模式非常遥远。<sup>[51]</sup>

截至目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制度化进程，高等教育研究在培养出一大批熟悉高等教育的专业研究者并生产出大量关于高等教育的知识的同时，也固化了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束缚了高等教育实践和大学自身的想象力。“一种认知能力总是跟个人的理解水平有关。如果仅有知识，无论你积累了多少，都不会形成正确行动的判断力、智慧和想象力的。”<sup>[52]</sup>学科规训的存在使得高等教育研究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符号，使有些研究者误以为决策权力若集中在研究高等教育的学术精英手里对大学、高等教育的发展会更为有利。其实未必如此。从决策实践出发，那些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并不一定比并非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更懂得高等教育。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人可能只是在高等教育的某个具体方面比并非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了解得更深入，那些并非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人也可以从实践中以及其他学科中获取真知，加之不受学科边界的约束，反倒有可能比所谓的专家对高等教育本质的了解更全面，视野也更开阔。当然，无论专业的研究者还是非专业的研究者或实践者，都不可能单独拥有关于高等教育的总体性知识。这里指出专业研究者的局限，不是否定高等教育研究专业化的必要性及其价值，更不是贬低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或学科的重要性，而是意在澄清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客观的距离。我们绝不能以是否能够改变或改进实践作为衡量高等教育研究价值的唯一标准。实践中那些切实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观念或政策未必具有智识意义上的学术价值，而那些学术意义上的经典文本也未必都推动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真正决定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具体形态与必然性的，可不是理论家，而是行动者”。<sup>[53]</sup>无论个体的学术研究还是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学科建设，并不总

是遵循“问题——解决方案”这一循环模式，高等教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和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问题也不是解决方案。<sup>[54]</sup>作为专业领域，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主要在智识或认识层面，对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不能忽视，但也不宜高估。

## 参考文献

- [1] 范内瓦·布什, 拉什·D. 霍尔特. 科学: 无尽的前沿[M]. 崔传刚,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1: 31.
- [2] 约翰·亨利·纽曼. 大学的理想(节本)[M]. 徐辉, 顾建新, 何曙荣,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20.
- [3] R. K. 默顿. 科学社会学(上册)[M]. 鲁旭东, 林聚任,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365.
- [4][5][7][24] 赵鼎新. 什么是社会学[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16, 45, 16, 98.
- [6][17][20][26][37][39][41][51][53] 汉斯·约阿斯, 沃尔夫冈·克诺伯. 社会理论二十讲[M]. 郑作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234, 157, 368, 231, 30, 369, 113, 115—116, 463.
- [8][25][34][35] 德隆·阿西莫格鲁, 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 313, 273, 324, 48.
- [9][10] 克里斯托夫·夏尔勒, 雅克·韦尔热. 大学的历史——从12世纪到21世纪[M]. 成家桢,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63, 54.
- [11][36] 戴维·斯特利. 重新构想大学: 高等教育创新的十种设计[M]. 徐宗玲, 林丹明, 高见,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 11, 131.
- [12] 三螺旋创新模式: 亨利·埃茨科维兹文选[M]. 陈劲,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413.
- [13] 王建华. 作为方法的大学[J]. 高校教育管理, 2019, 13(2): 1—7.
- [14][46] 约翰·塞克斯顿. 据理必争: 教条主义时代中的大学[M]. 刘虹霞, 王慧慧, 周雅明,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193, 65.
- [15][16][21][23][29][38][40][42][43][48] 托马斯·索维尔. 知识分子与社会[M]. 张亚月, 梁兴国,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6, 3, 169, 185, 49—50, 342, 33—34, 94, 361, 25.
- [18] 赵鼎新. 社会科学需要破除理科思维[N]. 文汇报, 2011-07-04(2).
- [19] 涂又光. 教育哲学课堂实录[M]. 雷洪德, 整理.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0: 53.
- [22] 王伟廉. 教育学科研究中的“累积性进展”问题[J]. 现代大学教育, 2021, 37(6): 37—41.
- [27][31][44] 伊恩·哈金. 驯服偶然[M]. 刘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7, 156, 40.
- [28] 杰米·萨斯坎德. 算法的力量: 人类如何共同生存[M]. 李大白, 译.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 12.
- [30] 卡尔·伯格斯特龙, 杰文·韦斯特. 拆穿数据胡扯[M]. 胡小锐,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22: 337.

- [32] 麻生诚. 英才的形成与教育[M]. 王桂, 王振洲,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7: 96.
- [33] 加斯东·米亚拉雷. 新科学精神与教育科学: 关于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建立桥梁的尝试[M]. 王晓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6.
- [45] 罗伯特·J. 斯特兰特. 学校教育的戏剧性[M]. 胡晓岚,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3.
- [47] 涂尔干.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 汲喆, 付德根, 渠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64.
- [49]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 郑继伟, 张维平等, 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32.
- [50] 霍尔登·索普, 巴克·戈尔茨坦. 创新引擎——21 世纪的创业型大学[M]. 赵中建, 卓泽林, 李谦等, 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8: 23.
- [52][54] 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 我们的未来: 数字社会乌托邦[M]. 张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35, 63.

(本文责任编辑 曾甘霖)

作者王建华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第 56—65 页。

# 面向 2030 的高等教育新愿景

黄金鲁克 编译

近日，由全球大学创新网络（GUNI）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合作编写的世界高等教育报告——《面向 2030 的高等教育新愿景》在第三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发布。报告从八个方面描绘了全球高等教育现状与趋势，并对未来 10 年及以后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勾勒。

##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教育的影响

世界存在基础设施、科技和知识鸿沟，而新冠肺炎疫情让这种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不平等加剧。国际大学协会调查发现，疫情期间欧洲国家 85% 的大学采用了在线教学模式，而非洲国家却只有 29% 的高校使用在线教学。报告分析认为，这种不平等源自结构不平等，并提出当前高等教育向数字学习过渡，不仅需要科技，还应注重为使用者赋能，将人放在第一位。同时，政府、公共和私立合作伙伴应合力缩小数字鸿沟，加强网络连接和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高质量数字学习内容，并帮助教师掌握远程和混合教学模式。

报告还认为，健康危机与经济社会危机相伴，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比如录取、培养和就业等。为此，大学和高校应积极制定相应战略计划，努力为学生和高校提供经费支持，推动性别平等，并对受教育权这一概念进行升级和拓展。

## 从终身学习视角培养素养和技能

当前，全球挑战、科技创新、全球化和经济社会变革正在影响全球各项工作领域，特别是劳动力市场，要求人类采用新的知识和技能去应对。2021 年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显示，当前人类所获取的技能和未来 10 年工作的需求之间存在极大的不匹配。报告认为，我们需要推动劳动者终身学习、再培训与获取新技能，甚至做好对职业部门进行改革的准备。



为此，报告特别推荐两种新技能——横向技能（**Transversal Skills**）和技术技能（**Technical Skills**），并强调个人学习责任。其中，横向技能包括适应能力和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自我管理和与人相处能力。个人学习责任则指赋能学生，使其为自身学习以及职业发展负责。报告认为，应以学生为学习中心，聚焦问题而非答案，强调深度学习和跨学科学习，继续重视记忆的作用，并采用让学生参与相关过程的新的评估方法。报告还提出，应超越时空，推动全方位学习和终身学习，鼓励高等教育机构转变角色，缓解人才技能培养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等情况，主动融入当地生态系统和社会，为实现进步、增长、可持续发展和公平等人类共同目标而努力。

### **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

报告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应关注人文学科，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环境、他人及自己。而且，对于人文学科的理解不应是割裂的，而应在知识生态系统框架内，与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一起通过系统思维进行理解。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应在变化的世界中推动人文主义，并从三个方面培养未来公民。首先，学会融入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年发布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提出学习的“四大支柱”，即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但随着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这些支柱概念应进行扩展，如学会共处须超越人类互动范畴，关注环境人文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其次，学会与社区融为一体。高校及相关工作人员应主动服务于社会，借助人文学科将各相关方联系起来，创造网络，构建多样化、全球化社区，聚焦培养未来公民，并注意求同存异。最后，学会开发个人潜能。关注个人及情感的作用，特别是注重艺术、绘画、文学、音乐等在情感中的中心作用，帮助个人平衡生活并享受生活的过程。

## 推动研究与创新服务社会变革需要

新冠疫苗研发表明，知识研究和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因素，而此次疫情危机也揭示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意义。在社会、政府和产业协调框架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知识研究和创新过程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报告认为，研究和创新须与可持续发展和合作同步进行，与此同时，可持续不应被视为一种需求，而应作为一种增长的机遇，大学应在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

报告建议，高等教育机构首先要在科学与社会之间搭建一个稳固的桥梁，进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其次，适时将知识转化为创新，并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更具创业精神和跨学科性，以应对未来挑战。再其次，加强研究和创新分享与合作，并促进相关领域向世界开放。最后，更新学界评估标准。传统评估指标侧重于出版物数量、影响因子和全球排名，但决不可以此取代专家判断和定性评估，同时还应关注科研操守、创造力和对经济社会的贡献等。

## 构建更包容和可获取的大学

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高等教育范式正在发生变化，教育法甚至大学的培养模式也在被重塑。具体而言，在线教育如慕课等通过信息技术创新改变了传统高等教育模式，数字化则对培养模式提出了新挑战。欧洲大学协会曾提出“没有围墙的大学”，而今天日益常见的“虚拟校园”让“大学”这一概念更为模糊，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趋势。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只有置于学习和教育管理数字生态系统框架，才能发挥作用。欧盟于2020年推出《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其目标正是开发出一个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报告提出，数字技术应作为一种媒介，并由此引出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降低教育成本并惠及更多受益者；二是如何通过数字

技术推动高等教育更具灵活性并满足学生的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三是如何通过数字技术构建世界最佳学习模式。报告还表示，在线与面对面学习模式应相辅相成。尽管在线学习模式有明显优势，但面对面学习仍然有增值空间，因为学生能够从这种社会交往中受益。报告还显示，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主义已成为世界争论的焦点，但应找到契合点，将人和人的生命放在科技发展的中心。最后，报告建议将数字公民教育作为一种权利和优先事项。

### **通过重塑大学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报告表示，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框架内，可持续发展教育制定了一个更细致的教育框架，为教育的每一阶段明确了特征和使命。其中，高等教育为青年未来职业发展和成为合格公民搭建桥梁，因此对可持续发展有巨大的变革作用。国际大学协会研究发现，可持续发展对高等教育机构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求变革高等教育教学与研究功能；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联系当地社会与国际社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等教育要想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并整体变革高等教育机构。报告建议，一是确立联系或协同思想，包括与环境 and 各方人士联系、与不同领域知识联系以及与高等教育机构内外联系等；二是变革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例如使用批判性思维、勇于参与、自我约束并积极采取行动等。同时，不仅要从环境视角推动可持续发展教育，还要重视社会情感方面的教育。

### **为实现共同目标加强国际合作**

报告强调，全球挑战只能通过全球方案解决。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等，造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我们呼唤一种协调性、决定性和全球性的干预。对此，高等教育机构不能

视而不见，因为这些挑战既损害未来人类的利益，也对当代人造成影响。应对这些全球挑战，须注意高等教育机构的双重身份——它们既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又与更广阔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具有地区和国际双重影响，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机构与其他机构紧密合作。为此，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政策与实践极为重要。

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行动，相关国际化政策与实践可以成为内部变革的催化剂，但不能与所属机构割裂开来。譬如，它们可以成为教育变革实验室，但不能违背机构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具有独特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而尊重并维护其身份与独特性，是所有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程度须在竞争与合作、差异与融入以及独特性与同质性之间找到平衡，以更好地服务核心理念和使命。当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还应将机构灵活性、开放性与加强透明性的承诺及创新的魄力结合起来。

### **建立坚韧、创新和有社会责任感的机构**

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使高等教育机构治理成为核心议题之一。关于高等教育机构治理，学术界尚无统一定义，但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包括决策、选举、自治权、利益相关方、高等教育机构互动、开放性和经费等。西方学者鲍德里奇曾在 1971 年将大学治理模式归纳为官僚、学术组织、政治三种模式，学者布雷奇和科根则于 2007 年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已成为利益相关者组织。报告认为，世界已经进入网络知识社会，应该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模式更具开放性、合作性及灵活性。

报告表示，鉴于当前复杂形势，没必要采用一种标准化治理模式，但须认真学习成功治理模式的四个因素，包括尊重机构文化、确保学术团体参与相关决策过程、适当推动与其他大学的竞争与合作以及加大当

地社会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力度等。报告还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应提升相关人员专业背景，如新聘用专家应具有新兴学科背景等。同时，教学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界限日益模糊，应推动高等教育机构打破壁垒，吸引更多具有开放性、合作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复合型人才。此外，还应重视青年和女性人才，不断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和领导力建设。

作者系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二等秘书，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22年9月1日第九版环球周刊栏目。



## 破“五唯”立新规： 教育评价改革的本体追求与成本约束

刘振天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以升学、分数、文凭、论文和帽子为标志的“五唯”教育评价, 是近代社会大工业生产和理性主义的产物, 核心在于追求模式化、效率化和功利化, 其严重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与规律, 偏离了教育的根本价值与目的。破“五唯”立新规, 就是要恢复和回归教育的育人本性与本位。然而, 历史地考察“五唯”教育评价的产生与发展, 发现其有相对必然性与合理性, 因此, 在教育评价破旧立新过程中, 要立足现实, 处理好教育本体化追求与改革成本约束之间的矛盾, 使改革以最合理成本投入取得最佳收益。

**关键词:** “五唯”教育评价; 教育本质; 教育评价改革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 开篇即提到,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 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长期以来, 我国在教育评价上先后出现了一些不科学不正确的导向, 存在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五唯”现象, 既偏离了教育的目的和使命, 也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与规律。因此, 《总体方案》强调, 要坚决克服“五唯”顽瘴痼疾,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遵循教育规律, 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发展素质教育, 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 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总体方案》要集中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让教育评价回归本位，即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总体方案》提出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也都是紧紧围绕人和人的发展，为实现人的价值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然而，教育评价改革艰巨复杂，其中既有技术和方法问题，更涉及观念、体制机制以及利益问题。这意味着教育评价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我们既要抱定理想奋力推进改革，又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把应为与能为、目的与手段、过程与结果统一起来。总之，就是要处理好破旧立新过程中教育本体追求与改革成本约束之间的矛盾，使改革始终朝着正确的目标方向，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或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收益。

### 一、从教育评价的历史演进看“五唯”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教育评价实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sup>[1]</sup>之所以如此定义，取决于教育的性质。教育是有目的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而举凡有目的性的活动，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对活动结果是否实现预期、活动过程是否偏离预期作出衡量与比较，这时，评价便自然发生。越是接近或符合预期要求，就越是表明这种活动具有质量和收益。教育质量实际上“即教育目的或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sup>[2]</sup>，因此，所谓教育评价就是人们对教育活动是否实现了教育目标要求的一种价值判断，亦即关于教育质量及其效果的认定。

即如教育与人类社会同时出现，教育评价与教育实践也是相生相伴的。远古时代的教育评价简单且原始，尚未发展成为独立的形式。在文字产生之后，人类的教育活动进入可考时代。《论语》中有许多孔子及其弟子关于教育评价思想与实践的记载。孔子说“听其言、观其行，而后知其人”，是如何评价他人；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是如何自我评价；“听、观、省”是评价的主要方法。“夫子教人，各因其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可视为学生评教。

《学记》较详细地记述了西周时期的教育评价：“彼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师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谓之大成”。由此可见，教育视导评价在此时已趋于系统化。《学记》还详细阐述了好教师的评价标准。当然书中有夸大与美化的成分，不可全信。<sup>[3]</sup>两汉时期，西汉太学实行“一岁一辄课”，东汉时改为“二岁一试”制，比以往的评价更细致。西汉的察举（推荐）制，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尤其是隋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制一直持续到清末，前后1400余年，虽然这些属于遴选官员的制度，但对教育及其评价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可以说，科举考试制施行后的中国学校教育总体上是为科举而存在、围绕科举运转的，评价教育效果好不好，学生是否成人成才，主要看是否取得功名，学校教育由此成了科举制的附庸。不难看出，今天教育评价中的唯升学、唯分数、唯文凭，都有科举制的影子。

相比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中国古代以科举考试为中心的教育评价体系可谓最发达和最完备。西方国家在17、18世纪才从中国引进科举制并将之改造成文官考试制度，在此之前还谈不上有什么教育评价思想与实践。“可以说，当时的教育本身还处于混沌未开的状态，教学评价方式和教育目的具有内在一致性”<sup>[4]</sup>，教育目的代表了教育评价的方向，在对智者教和学生学的评价上，主要看是否教会或学到了他们心中期望的雄辩知识、政治观点以及演讲技能，并没有具体的评价方法。直到19世纪，西方学校才出现了考试制度，先是口试，后又有了笔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评价制度由此开启。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虽然教育评价制度的最初萌芽是我国古代的考试制度，但教育评价制度和理论的真正形成和发展是19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教育家努力的结果。所以，世界范围内教育评价的发展一般指西方教育评价的发展”<sup>[5]</sup>。本文的重点不在于回顾教育评价的历史，只是想通过对这一进程的简要描述，



概括出古代教育评价的主要特质，进而揭示“五唯”倾向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五唯”与科举制度有一定渊源，单从形式上看，唯升学、唯分数、唯文凭就可谓科举制的遗存；另一方面，“五唯”又非科举制的简单和自然延续，它们之间有着实质性差异。后者是古代小农经济条件下教育发展的产物，而前者则是近代以来机器大工业生产条件下教育发展的结果。面对近代社会的工业化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理性化要求，古代的教育评价制度与评价模式已经不再适用，社会需要新的教育评价理念、评价制度和评价模式，而这便为确立以“五唯”为代表的近现代教育评价理念与制度提供了可能。

为进一步说明上述结论，我们首先对古代教育评价的特质及依存条件作一概括。其一，评价对象的个体性，即评价面向个人而非集体。孔子从教数十载，先后招徒三千余人，他的教育方法是因材施教、因人而评。他能指出学生个体的特点与专长，如颜回志向远大且贤德，子路鲁莽但擅长军事，子贡聪明且有商业头脑，等等。其二，评价目的的功利性，学而优则仕，重视教育的功利作用而非知识本身的价值。因此，科举考试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和学生学习的动力。其三，评价内容的单一性，即主要是关注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的评价。古代教育评价（考试）虽也强调知识与能力，但知识主要是四书五经中的伦理道德学问，能力主要指对仁义礼智信的理解力和行动力。其四，评价方式的主观性，即评价主要依赖听、观、省、阅等个人的感受与体验。即便八股考试的客观性实际上也仅体现在程式规定上，而无论应答还是评阅都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五，评价结果的甄别、选拔和促进发展作用。古代教育常将人分为君子与小人、上智与下愚，鲜明地反映了教育评价的甄别和选拔作用。同时，古代教育观又认为人人可为尧舜，只要努力都能进步，教育评价能促进人思想和行为的转化，“化性起伪”，成作君子。

总体而言，古代教育评价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的一面，如强调对人

的道德进行评价，重视传道；重视个体性、针对性和过程性评价；重视面对面和人对人的情境性与主观性评价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育的育人本质，对当下的教育评价改革有借鉴价值。但是，古代教育评价也存在保守和落后的一面，那就是功利导向，评价内容狭隘，个别化评价效率低且成本高，主观评价不科学、随意性大、公平性差等。如前所述，古代教育评价的特质和表现是与小农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一方面，当时社会教育规模极小且十分落后。据统计，在长达1400年的科举历史上，总共有700余人中状元，11万余人中进士，平均每两年才产生一名状元，每年产生进士不足百人。<sup>[6]</sup>此外，社会上能读书识字者凤毛麟角，95%以上的人口都是文盲；在校人数也极少，因而采用个别化教学，一位先生只教少数几个学生，容易进行直接评价和个体性评价。另一方面，学校的目标任务单一，只有传道授业性的教学，没有严格的学习年限等制度规定。

然而当历史车轮驶入近代之后，人类社会仿佛顷刻间降落到一个全新的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迅猛发展，经济与社会快速变革，教育由此也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一是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先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普及初等教育，而后是逐渐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教育层次向中学后延伸，其他国家和地区随之跟进，当今世界已整体上进入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全面普及化时代。二是教育结构日趋复杂，建立了多层次、多类型与多形式且上下贯通、左右衔接的完整教育体系，教育功能和学校职能得以空前拓展。教育不仅服务政治目的，还要服务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需求，传道授业因而不再是学校和教师的唯一任务，研究、服务和交流合作也成为重要目标和职能，占用了从业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三是教育内容复杂多样，不仅有伦理道德知识体系，更有科学技术知识体系并取得主体和主导地位。四是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教育从农耕时代的社会边缘日益走向近现代社会的中心，

教育与社会变革同频共振，发展变化进程不断加快。五是教育逐渐从以往的私人或教会活动转变成为公共事业，国家、社会和家庭为教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各利益相关主体愈加关注教育的效率和效益。以上所有变革都对教育评价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教育评价显然已无法适应和促进新的时期教育的发展与变革，它从整体上失去了合法性根基，迫切需要探索并建立新的教育评价制度与模式。可以说，“五唯”教育评价恰好具备近代以来教育评价所要求的特质，从而展现出特有的优势。一是数量化和标准化。分数、文凭、论文、帽子等均是可测量的评价要素，既可以将不同对象、不同方面（差异性）有机统一起来，变成可比较的共通的标准，又能够把相同对象或相同方面（一致性）有效地区别开来。例如，不同学科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及其成果的内在性质不同，不能直接进行比较，但人们却可以根据各自性质的外在形态（数量形态），将内在性质差异转化为可以比较的外在数量差异，如课程门数、教学时数、学生评教分数、论著篇（部）数、刊物的影响因子或级别等，于是便分出不同等次。这就是“五唯”评价标准化的合理性及优势所在。二是外显性。以分数、文凭、论文、帽子等为代表的评价标准，可以视作个体或组织所拥有知识、能力、地位、功用、价值的外在表现，或者竞争实力与影响力的外在表达，它使被评价对象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内在素质与禀赋变成可视的外部实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工业的全部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本心理学”<sup>[7]</sup>。三是高效和公平性。“五唯”评价的数量化和外显性必然使评价效率大幅提升，因为它以分数、论文、文凭等指标将复杂多样的评价对象及其活动统一简化为数量形式，便于比较与鉴别，大大缩短了评价周期、简化了评价程序，在某种意义上也凸显了数量面前人人平等。与此同时，人们可以通过直观且外显的标准来判断评价对象的水平与价值，从而一定程度规避了传统评价过程

中评价者的动机、观念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使评价既易于操作又显得客观公正。

由上可知，“五唯”评价的数量化、外显性、高效率和公平性，最大限度地适应了普及化时代教育大规模发展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在教育质量、效益与公平上的诉求，适应了快节奏社会条件下教育高度竞争的需要，无疑有其进步性与必然性。

## 二、“五唯”教育评价的理性化遵循及其对教育本体逻辑的背离

“五唯”教育评价这一新形态、新范式的出现，适应了近代以来机器大工业生产、教育大规模普及与全民教育、高度竞争条件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出的对教育和人才进行有序管理与高效客观评价的需求，因此，“五唯”教育评价逐渐确立和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与此同时，近代以来哲学、自然科学、工程及管理学、计算机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也给以“五唯”评价为代表的现代教育评价系统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保障。然而在以质量、个性与创新为核心价值的新世纪、新时代，以“五唯”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评价范式所固有的局限性与不足日益突出，其与教育评价的本来目的和本体价值渐行渐远，严重阻碍了教育评价的改革发展，成了被破除的对象。

### 1. “五唯”教育评价的科学理性遵循

“五唯”不单是指狭义上的考试分数、学历文凭、论文数量与影响因子等具体评价标准，还泛指以考试、分值为代表的数量化、效率化、理性化和秩序化的现代教育评价理念与评价模式，它不仅有顺应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现实依据，更有密切联系现代科技发展的学理遵循。数量化和数学化是人类思维水平以及对世界规律性认识程度的集中表现，是学科科学化和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教育评价科学化的目标追求。自从有了人开始，人类便将外部世界和自身作为自我主体的对象加以审视、认识和探究。这种认识和探究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工具论的转

向，从直观感性表象到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的转向。每一次转变都将人类的认识推向更加深刻、更高水平的阶段。随着对数量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进而发展出宏大且深刻的数学体系，这无疑是人类认识与思维发展步入高级形态的标志。

从古至今，一与多的关系是哲学家们重点探讨的难题之一。老子敏锐地认识到，多的背后隐藏着一，一恒常不易并且决定和支配着多，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古希腊哲学家也尝试把世界归结为一，只不过这个一有的认为是火，有的认为是水，有的认为是气，有的认为是原子，总之是将世界归结为一种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看作世界的本体。他们认为，一切杂多归根到底都可以归结为数，宇宙里的任何事物均是数的比例关系、对立关系和类比关系，如有与无、多与少、有限与无限、冲突与和谐等。<sup>[8]</sup>相较于水、火、气、原子等本体论观点，以数为本原显然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因为数已经抛却了水、火、气、原子等实体形态，把世界归结为数量关系，这直接影响了其后西方本体论哲学尤其是科学观的形成。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诞生于西方，盖缘于古希腊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在它看来，纷繁复杂和充满变化的直观世界是虚幻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是真实可靠的；此外，万千世界其实只受少数几条普遍规律的支配，而这些规律又以数学定理的形式简约而完美地呈现。算数和几何学是其范例，它能够从一条或几条一般公理出发推导出完整而自洽的宏大理论体系，所以数学多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乃至真理。古希腊学校和中世纪大学把文法、修辞、逻辑学、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作为“自由学科”，皆认为它们代表了人类的理性和世界的秩序。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sup>[9]</sup>。列宁也认为，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是一种永不停止的潮流。<sup>[10]</sup>最早开始数学化的是天文学和物理学，之后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博物学等

等，这些学科而今都发展成了经典、精密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19世纪以来，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也相继开启了科学化运动，借鉴数学的思想、逻辑与方法发起了实证主义量化研究，形成了计量经济学、计量史学、计量社会学等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

教育学同样如此。赫尔巴特是最早提出并探索教育学科学化的代表性人物，他试图改变当时教育学科的落后局面，希望把教育学发展成为能与其他学科平起平坐、受人尊敬的学问。他依据实验心理学关心儿童兴趣发展和统觉发展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原则并将教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重构了教育学的知识和方法论体系。20世纪初至40年代，教育领域发生了实证主义和实验主义运动，教育学科学化的重点表现在教育测量和评价上，主要是开发评价工具来测量和甄别儿童智力及能力性向，以此为教育筛选提供依据。由于智力测验和成绩测量可能被种族与性别歧视所利用，招致社会强烈反对，逐渐走入低潮。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教育测量和评价的对象、范围与应用不断扩充，测量与评价结果不再局限于说明学生的智力与性向，而是将其与改进教学过程联系在一起，以此修正教育目标、开发适应性课程、革新教学方法，从而渐渐形成了对教育活动全过程的评价。进入20世纪80年代，借助数学、计算机信息技术以及模拟仿真技术，数据挖掘在教育评价中被广泛使用，量化评价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办学、管理、教育教学、资源配置、交流合作等方面，教育评价迎来了全面、全程、全员化的新时代。

既然数学化发展或者确定数量关系是教育评价科学化的表现形式与目标追求，即一定程度说明具有明显量化特性的“五唯”教育评价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它对衡量教育教学质量及办学成效有正向价值和作用。一方面，任何事物都有质与量的双重属性，二者相互规定、制约并互为条件，事物的质可以通过量来体现。所谓量，是指同类事物的外部属性，如大小、轻重、高低、快慢、冷热等构成了事物的数量、规模等外在形

态。观察并测度这些外在数量与形态，可以判断事物所处的阶段、性质、功能以及变化走向。拥有某事物的信息越多越丰富，人们就越能够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该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状况。当代各国对教育的评价、研究和决策都十分重视信息、事实和数据，建立了各种类型数据库，不仅全面收集静态、结构化的硬数据，还千方百计地挖掘动态、非结构化的软数据，进而整合生成新数据。硬数据常见于统计报表或公报，多指涉及教育事业发展的入、财、物等方面的信息，这些数据是客观存在的，顺应事业发展和统计的需要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软数据多指人们对教育活动持有的意见、态度、价值以及行为选择等所表现出来的倾向性信息，如通过调查问卷、质性访谈、专家咨询等各种方法从招生就业、教育管理、教学活动、校园生活等具体行为中挖掘并生成的数据，这些数据的主观性和行为性非常突出。对有些教育事项的评价，如学校行政人员的品行、管理水平、人格特色、声誉影响等，主观性很强，不易把握，现在多通过设计问卷进行量化考核，实现了主观评价的客观化，合理性得到较大提高。结构化数据与非结构化数据共同构成大数据，在教育中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据统计，当代国际教育学界的研究成果中约80%是以量化和实证形式发表的，采用传统经验研究等其他方法的成果仅占20%。<sup>[11]</sup>量化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也促进了教育评价、教育决策与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

## 2. “五唯”教育评价的实践理性遵循

以数量化或数学化为特质的“五唯”教育评价，不仅反映了人们对教育评价科学化的追求，还意味着人们对教育评价的运用不断工程化、技术化和效率化，即不仅要使教育评价合规律，而且更应使教育评价合目的，从而实现以评价促进教育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价值诉求。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12]</sup>大工业生

产之所以能创造出如此高的生产力，归根结底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也在于顺应科技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生产组织。可见世界的“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现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sup>[14]</sup>，作为人类的理性能力，科学不只是一套认识和解释世界的知识原理体系，也是一套控制和改造世界的技术体系、工程体系，同时还是一套有关科技、秩序和效率的意义与价值体系。科技理性、实践理性以及物质理性已牢牢扎根于现代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组织行为之中。可以说，“五唯”教育评价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数量化、数字化以及规范化，对个体或者组织的教育教学状况、价值作出更全面、更准确的判断，进而在此基础上合理调控和改进教育行为，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以及教育活动效率和效益的最大化。

无论是从理论与实践还是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看，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及其功用性程度的高低，都与教育评价数量化和规范化的程度成正比。古代教育评价之所以落后，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发挥识别、促进和引导教育发展变革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教育本质与规律认识不深，掌握的信息不多、不精。在这种状况下，古代教育评价只能靠笼统的主观感受和经验判断，不可能做到数量化和精细化。近现代以来，人们借助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在教育实践中收集和掌握的信息日益丰富，不仅发掘出越来越多的数据，而且处理各种信息数据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当前，教育的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成了重要的基础建设工程。各国围绕教育信息的开发、研究、交流合作与分享，展开一系列活动，促进了教育信息的现代化与一体化发展。以此为基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教育质量保障和评价运动在全球蓬勃发展，发达国家纷纷成立质量评价和保障相关组织机构，开发国内及国际通用的质量标准与评价工具，开展国内、跨国的或者单边与多边的教育质量评价和质量互认活动。



这在高等教育领域最为典型，取得的成效也最突出。高等教育评价工作全方位实施，几乎涵盖了不同层次、类型与形式的所有高校，教学、研究、管理、服务、交流合作、学科专业、课程、实践等全部内容，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等各利益相关主体，定性、定量、综合、单项、周期性、日常性等各种方法，鉴定、改进、共商、奖惩等各种用途。总之，教育评价无所不包、无时无处不在，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20世纪是教育评价的世纪，评价渗透到教育各领域各环节，教育评价成为绕不开的制度存在。<sup>[14]</sup>

教育评价对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影响，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教育评价本应在教育活动中或事后进行，目的在于了解教育过程是符合抑或偏离了预定目标，结果是否达到和实现了预期要求。然而，现代教育评价却成为一种前置性存在，为行动提供指向、标准、蓝本与方法，为教育实践提供动力，为教育资源分配提供依据。具体而言，教育评价为管理者和教师提供了治校和治学的有效工具，他们可依据评价指标和标准要求比较明确地展开相应的行动。教育评价显著增强了教育活动主体的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成果意识、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意识。评价结果也给办学者、管理者、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改进工作的参照系。当然，评价活动及其结果也成为上级对下级、管理者对教师、教师对学生进行层层控制的手段。我们看到，教育评价作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正在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获得更大的收益。例如，指向组织或个人的声誉排名、绩效排名、质量审核、评比评奖等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各教育主体的积极性，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成果，教育评价成为显著的学术生产力工具。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数、申请专利数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这与我国数十年来推崇sci、Ei评价标准以及高校特别重视论文产出指标直接相关，而这种量化的绩效评价也使我国高校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的位置大大提前。

### 3. “五唯”教育评价对教育本体价值的疏离

教育评价的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或者说教育评价的数量化与工程化取向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弊端。其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数据、量化和绩效的过度使用，数量指标不仅成为衡量组织或个人工作效果与质量的重要依据，而且将量化结果与资源分配直接一体对接，数量标准成为利益分配的主要机制，量化教育评价也因此带来了消极的影响。

一方面，“五唯”教育评价的唯数量化取向抹杀和背离了教育实践的本质。教育是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人是最复杂的主体性存在，有着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丰富的情感、独特的个性。每一个体及其组织，如不同时空及社会条件下的师生、学校、学科专业等等，不可能是完全同质性的，就像人们常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然而数据化、量化却抹平了这些个体或组织间的千差万别，在那里没有具体的人，个人消失在数据里，人们计算和比较的仅仅是个体或组织所表现出来的外在数据。即如人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鲜活的人，而是他的身高、体重、各项生理指标以及名头、分数、文凭、论文等社会指标。同样，一所学校也变成了人、财、物、学科专业、学位点、成果等单纯的数据。极致的量化追求不仅将人与组织的生命抽离，将教育本质抽离，而且也将人的情感抽离，教育过程变得没有生命、没有情意、没有温暖和关爱，只剩下冰冷、僵化、枯燥的数据，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剧和人的悲剧。

另一方面，“五唯”教育评价秉持典型的简单化、短期化和功利化价值取向，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偏离了学术发展与创新的正确轨道。对此，一些学者作了深入探讨并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和批判。<sup>[15-16]</sup>但笔者想说的是，简单化有其合理性，它也是人基于已有理论认识和思维水平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人类的语言、概念、数据、理论等，无一不是对复杂现象和事物的归纳、抽象和概括，没有创造概念、理论抽象和概括思维，人类在复杂多样的世界面前就会束手无策。与此同时，这也

意味着人类在运用语言、概念对事物进行分析、归类、抽象和概括，进而揭示事物本质与规律的过程中，总免不了会更多地关注事物的共性而损失一部分个性。因此，人类要形成对事物和现象的完整认识，在经过抽象和分析之后，还必须返回到丰富的具体情境，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但是，“五唯”教育评价的弊端恰恰在于它停留且满足于第一条道路，即一种简单化和抽象化的规定，进而把丰富的个体及其认识活动变成抽象的量，将知情意行等完整统一的发展过程直接等同于孤立分割的考试分数、论文篇数、文章影响因子、课题级别等等，犯了严重的简单化、片面化错误。同样，评价数量化与绩效紧密捆绑，造成教育教学的短期化与功利化，使教书育人这样充盈人与人心灵情感交往的价值性心理活动以及学术探究这样的高深精神活动变形为狭隘的利益交换，教师、学生、管理者、学校以至管理部门之间都蜕变为劳资关系和单纯的竞争关系，教育活动异化为计件化知识生产，教育过程变成了见物不见人的机器运作，从而使个体与组织只关注产量而忽视质量，重视眼前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整体利益，人的主动性、全面性和创造性被消解。这与人的成长规律、学术的发展规律以及教育培养规律相违背，更与时代精神和社会发展要求严重不适应，破除“五唯”教育评价势在必行。

### **三、成本约束下教育评价改革破“五唯”立新规的本体追求**

作为近代以来社会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以数量化、工程化和效率化为标志的“五唯”教育评价如果说在那个时代有存在的合理性，那么面对新时代，“五唯”教育评价不断暴露出弊端，一定程度上甚至成了时代进步、社会创新发展的阻碍力量。

《总体方案》对教育评价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内容对象、组织实施、方法步骤等各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和顶层制度设计。事实上，高考与中考的改革、破除分

数和升学率至上的痼疾、遏制过重的学业负担、扭转高等学校sci论文崇拜等问题已被研讨多年，政府不断强化引导，学校和社会也在不断探索和尝试，但“五唯”已成顽疾，积重难返，必须从根本上予以综合治理。相比于以往的政策文件，《总体方案》不管是在改革全面性、力度、决心和勇气上，还是在领导组织和步骤办法上，都可谓前所未有。从《总体方案》确立的改革目标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立德树人，三全育人；二是建设教育强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前者是本体性、根本性目标，是向后或往回看的，要求教育评价回归教育的原点和初心，遵循并体现教育规律、办学规律、人才发展规律和评价规律；而后者属于功能性目标，是根本目标衍化和派生出来的，是向前和向未来看的，体现时代性，具有超前性。两个目标相辅相成，相互制约与促进。无视根本目标，功能目标就会偏离方向，或急功近利，或无功而返；忽视功能目标，根本目标就会变得空泛虚弱，无所作为。

### 1. 破“五唯”立新规的前提是重申教育的本质与根本任务

《总体方案》强调指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各级各类教育必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标准，把落实立德树人机制作为教育评价改革的根本遵循。可以说，《总体方案》把教育本质和根本使命阐述得明了透彻。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活动是培养人而不是生产物品。“培养”的意思就是以适宜的条件（如土壤、水、阳光、肥料等）促进种子或作物发生、成长和繁殖，也指按照一定的目的和事物自身的逻辑加以培育和训练。<sup>[17]</sup>很显然，培养一词本身即含有自然的、顺乎事物自身逻辑与秩序的意味。当人们说培养的时候，实际上首先是站在对象的位置上，承认培养对象自身具有生长的潜能和品质。作为培养者，其职责与任务在于提供合适的环境或条件，如此才能实现目的和愿望。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无为无不为；古人强调春风化雨顺乎天性，都是这个道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培养阐述得更为深刻，他将教育过程

比喻为人的生产，教师应做知识的产婆，而不是从外面将知识强行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之中。西方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智慧、勇敢、善良、正义等品德就像种子一样先天地潜藏在人身体中，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只是将这些潜在的品质激发出来。这样的理念对后世相关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心理学中有遗传决定论，霍尔认为“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政治学中有天赋人权说，认为自由平等是天定的。而卢梭认为，人在造物主那里都是好的，只是人间使他变坏了，故而人要远离社会去到纯粹的自然中。教育学里的观点更多更丰富。自然主义教育源远流长，发展到杜威那里，他提出了儿童、经验、活动“三中心”，要求充分尊重和释放儿童的天性，教育教学的目标、内容和组织要根据儿童成长规律与特点来设计，教师只是儿童身心展开和发展的助手，他们不应站在儿童的前面，而应站到后边去帮助儿童学习和成长。杜威在芝加哥创办实验学校，一切活动都围绕儿童生活这个中心进行，学校在教学目标和内容的编排上一反脱离儿童生活的教育传统，所有教育教学活动都从儿童当下的生活与接触范围出发。例如，历史先从儿童身边发生的故事讲起，进而慢慢扩展到儿童生活之外，而不是从遥远的过去讲到现在；地理也是从儿童身边的位置和事物讲起，进而扩大到宇宙空间，而不是同过去一样从遥远的宇宙开始讲起。同样，公民教育的出发点是从认识自我、家庭成员、邻里关系、社区和学校等入手，进而认识社会、国家与世界，并非从陌生的制度、国家、世界或民族讲起。这就是充分尊重儿童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和个性，从而能调动儿童的兴趣与积极性。不过这些主张过于理想化，而且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和快节奏的需要。事实上，近代社会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外部及自身世界的能力空前提高，人们越来越依赖人工的、人化的环境及其制造物，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原始而和谐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变，出现了许多现代化病。其中，最根本的是人反受自身创造物的支配

而不能超拔，在生活世界里过分迷恋物质和功利，在思维世界里严重囿于固化的技术和程序，这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发展形成了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改革教育，将人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早就提出了教育旨趣的核心是解放的观点，认为教育过程不是接受现成的知识与技术，也不是复制现成的社会结构，而是教人们如何独立看待和对待外部世界与自身世界。

以“五唯”为代表的教育评价，秉持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现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以及等级至上的评价理念和模式。在这种评价理念与模式中，人退居次要、可有可无的位置，只是分数、考试、升学、文凭、论文与帽子的工具与手段。也就是说，人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人们看到的不是具体的人及其发展的意义，而是个体拥有的分数、文章数量以及影响因子等数据，数量越多就代表地位越高、价值越大，进而人们也习惯性地按照这种统一的标准和模式进行外部生产和自我生产。长此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变成了单纯的外在数量的差别，而自我内在的个性却迷失了，在“五唯”评价笼罩之下，人失去了独立性、独特性，人际关系过度紧张，不平等竞争此起彼伏，道德沦丧不断加剧。即如有人指出的，忘记了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忘记了主体性价值与生命成长的意义，所有分数、标准无非是一些并不重要的眼前利益而已。<sup>[18]</sup>因此，破除“五唯”评价就是要破除缠绕和束缚人们的功利主义、等级主义、理性主义思想，恢复人本有的价值意义。这也就是要求教育实践活动必须从培养人、培养健康和谐发展的人出发，通过破除“五唯”评价，落实立德树人的教书育人机制，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要素“三全育人”。教育相关组织、单位以及个体，都要跳出并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率、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工业社会的教育政绩观和评价观，把人的主体性、生命力、好奇心与求知欲置于教育的中心位置，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办事，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

## 2. 破“五唯”立新规的重点在于新标准、新举措和新办法

教育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位，明确指导思想和转变评价观念只是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还必须有制度和措施予以保证，为此，《总体方案》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在这些要求中，既有22条目标任务和责任等正面清单，也有“十不准一禁止”等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具有预警、防范和问责的功能，正面清单具有倡导和引领作用。《总体方案》特别强调，要改革结果评价、开展综合评价、强化过程性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同行评议制度、特殊贡献制度以及人岗适配的用人制度，这些改革新规是打破唯分数、文凭、论文、帽子等不合理评价观念的重要举措。

结果评价是重要的评价方式，它是以某一时段为背景条件，对个人或组织的活动效果所开展的评价。这种评价通常要对个人或组织的活动效果作出鉴定或者说明，以此比较出高低优劣等级，进而实施相应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面向学生的考试或测验、针对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年终绩效考核与评定、上级部门对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或对专项工作的认定等，都属于结果性评价。结果性评价有利于个人或组织了解和掌握活动成效，纠正与目标的偏差，并且相互之间可以比较借鉴，从而发挥动力机制作用，起到激励效果。但是，结果评价也有不少缺陷，如评价周期一般较长；忽视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过分强调结果而无视行为动机；忽视评价对象的主动参与；相互比较结果容易给评价对象形成过大压力；评价结果不准确会造成资源分配不公平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结果评价还存在严重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功利化倾向，评价形式单一，评价内容不全，过于倚重利益、分数等外部激励的作用，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例如，对学生的评价长期以来重知识轻能力，重智育轻德体美劳各育，重考试分数和升学率轻全面素质；对教师的评价重研究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升学考试科目的评价轻其他科目的评价；对管理部门的

评价则多以升学率、研究成果数量、排名位次、帽子数量等为重点指标。这一系列偏颇的教育评价致使师生、管理人员、行政部门形成了明显的功利思想，行为也越来越短视，重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事情，忽视了关乎根本、长远以及潜在的重要工作，甚至出现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与不良风气，瓦解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成效，对学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健康成长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此，必须认清这种极端结果评价的危害并对其进行彻底改革，而有效的改革举措就是加强过程性评价、增值评价和综合评价。

过程性评价也叫发展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增值性评价是一种相对性评价，即个体或组织以自身在开始阶段或上一阶段的发展水平为参照而对发生的新变化进行的评价，它也是发展性评价的一部分，着重于自我评价与自我比较；综合评价则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利用各方面的资料与各种技术手段对个体或组织开展评价，强化多元性和多样化。这三种评价也是对结果评价的重要修正。教育评价不能只看结果，还要关注过程，关注个体和组织自身的努力以及进步的程度，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与思想，关注手段的正当性或正义与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和公正性。否则，仅仅关注目的和结果，就可能导致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比如加班加点、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甚至是弄虚作假、恶性竞争、损人利己，这些都是以损害人的健康发展、损害社会风气和文化、抹杀人的创造性发展为代价的，必须破除。

除了以上几种评价改革外，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同行评议、代表作制、特殊贡献评价以及人岗适配用人制度等，也是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分类评价主要是针对以往评价中标准单一和一刀切评价方式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不同个体和组织的性质、地位、职责、作用以及发展可能性不可能相同，换言之，先天禀赋与后天环境不尽相同决定了教育评价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用一把尺子进行，否则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影响



个人或组织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正常发挥。为此，需要依据个体与组织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加以评价，既要考虑标准的差异和适宜性，也要考虑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这一点在高等教育各种评价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不同地域的不同高校在发展定位、培养目标、资源条件等方面千差万别，在办学水平评价、学科评价、教学评价、专业评价、绩效评价等方面需要开发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如此才能较好地落实分类评价。同样的，高校教师的岗位职责、任务不同，所在学科专业的性质与发展程度不同，在职称评审、年度考核、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等评价工作中就必须注意其间的差别，不能不分轻重、眉毛胡子一把抓、一个标准一种要求。以往个别工科高校在评价文科教师时也要求专利、年度课题经费入账数等，这非常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文科的健康发展。此外，为防止急功近利、粗制滥造，营造健康的学术氛围，还要适当延长评价周期，应从实际出发，允许学术成果空档期，对学术研究的失误与失败持宽容态度，要鼓励跨学科跨界合作，尽可能减少学术研究中的单打独斗现象。为鼓励产出高水平、创新性成果乃至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不能再以论著数量和刊物级别论质量，要推广代表作制度和同行评议制度，让研究人员安心教学与创作，要探索同行评议信用机制，真正发挥学术同行的作用，促进学术共同体健康成长。用人单位在评价人才时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唯文凭、唯帽子、唯出身的思想，反对人为地将人分为三六九等，应着重考察能力和实绩，杜绝用人歧视和人才高消费。

### 3. 破“五唯”立新规须关注成本约束下教育评价改革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五唯”教育评价是不科学的评价，是工业化时代“GDP主义”绩效观、质量观和发展观的突出表现，实践证明它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培养、评价创新人才的需要，不适应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要求。因此，破“五唯”成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教育评价改革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然

而在破“五唯”过程中，人们深切地感到困难很多、阻力和压力很大，需要确立的新评价理念、评价制度和评价模式一时又难以构建起来。一方面是新的评价理念与模式实践不多，没有较成熟的标准、经验与样式可供参照，而且人们还担心引发新的问题和矛盾，如客观性不足、主观性过强，不合理进而导致新的不公平。尽管人们大多已意识到了“五唯”评价的各种缺陷，但因以考试分数、文章数量与影响因子、工作量为尺子，形式上相对客观、公平且简便易行，所以在传统思维下的优势仍比较突出，这也是破旧立新的难点所在。这启示我们，在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实然、投入与产出、动机与效果的关系，既不能对改革目标怀疑、犹豫进而动摇和观望，也不能急于求成，推进改革要讲究策略、方式和方法。

不难看到，相比以量化为核心的“五唯”评价，评价改革更注重质性评价，不论是综合评价、过程性评价、增值评价还是同行评议、分类评价、长周期评价以及看能力与实绩用人，其评价成本（包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管理成本等）都会大幅增加。以分类评价为例，类别越多、标准越细致，意味着需要考虑的因素越多，评价的内容越丰富细致，人力与时间投入也就越多。在单一刚性标准下可能一个人即可完成评价任务，现在则需要两个甚至更多的人。如此一来，受资源限制，一个国家、地区或者学校能够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和实施教育评价？再以职称评聘为例，原来的评价主要是对教学工作量、论著数和刊物级别、课题级别、经费数等数量指标的加权计算，输入计算机瞬间即可完成，然而新的评价更多的是同行评议、学术委员会讨论等，主观因素大大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过去同行评价只看数量与级别等外显指标，现在要认真阅读每个参评人的代表作品，作出自己的评价，难度显然加大了。同时，在新评价模式下被评者有权怀疑评价结果，进而提出申诉，这又增加了成本。与之相反，在以往“五唯”评价中，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因为一切都是硬性标准，弹性空间很小。

相对于结果评价或者绝对标准评价而言，增值评价、综合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无疑更为人性化、精细化。推行实施这些新评价模式，要求教育管理者、教师和督导评价人员长期跟踪评价对象的学习、生活和工作，详细观察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深入交流思想与情感，倾听他们的声音与建议，从纵向上把握每个对象自我发展和进步的幅度，从横向上了解掌握其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并且及时记录这些信息。信息越多，评价就越准确、公正。但是，这样的信息并非简单的数量信息，而是经由听、看、察、访、诊产生的主观性、过程性、个体性很强的碎片化信息，收集难度大，时间周期长，更不用说观察了解人的行为动机信息。因此，这类主观性评价与依赖分数、文凭、文章等外在信息的“五唯”评价相比，虽然更符合教育本质和规律，但成本过高制约了实用性，也难以持久开展。这也是为什么虽早已提出破除“五唯”却迟迟无法向前推进的深层原因。

当然，成本问题不能成为反对甚至对抗破“五唯”立新规改革的理由，提出以上问题只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问题。破旧立新的改革肯定要付出更多时间、资源、精力等成本，必要的成本必须花费，同时也要尽可能节约成本，从而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的效果。

#### 参考文献

- [1]陈玉琨.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评价本质问题的探讨[J].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1991, (4): 60—65.
- [2]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第一卷）[K].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 24.
- [4]常国良. 试论《学记》的教育评价思想[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2007, (9): 84—85.
- [4]张鹏飞. 古希腊智者学派教学思想探究[J]. 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6, (6): 28—41.
- [5]吴钢. 西方教育评价发展历史的探讨[J]. 外国教育研究, 1992, (4): 10—14.
- [6]谢海涛. 中国古代官学中的学生数量问题研究——以科举学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为中心[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46（6）: 94—99.
-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2.

- [8]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14—15.
- [9]保尔·拉法格, 等.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 马集,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7.
- [10]刘凤山. 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0, (1):42—46.
- [11]王树涛, 顾建民. 国际教育科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趋势——基于 2010—2019 年文献计量的分析[J]. 教育研究, 2020, 41 (9):145—145.
- [12]中共中央组织部, 等.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编(党员干部读本)[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1:24.
- [14]朱学勤. 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EB/OL]. <https://xw.qq.com/cmsid/20220428A005L401>.
- [14]E·格威狄·博格, 金伯利·宾汉·霍尔. 高等教育中的质量与问责[m]. 毛亚庆, 刘冷馨, 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
- [15]周川. 量化评价的泛滥及其危害[J]. 江苏高教, 2021, (5):8—14.
- [16]李均. 教育实证研究不可陷入“统计主义”窠臼[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 49 (11):64—70.
- [17]吴根友. 从“养”字看儒家“化自然过程为德性培养”的方法[J]. 学术研究, 2014, (5):1—8.
- [18]石中英. 回归教育本体——当前我国教育评价体系改革刍议[J]. 教育研究, 2020, 41 (9):4—15.

(本文责任编辑 李晓宇)

作者刘振天系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原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第8—17页。

# 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 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张宗益

**摘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一流大学建设进入新时期。教育评价改革是牵引新时代一流大学建设的重中之重，厦门大学全面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坚持以“人才”为关键，以“学院”为主体，以“创新”为靶向，推进“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关键词：**“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一流大学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特别是通过“211工程”“985工程”和“双一流”建设，一批大学和一大批学科已经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中国高等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方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建设目标转向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强国，一流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过往的教育评价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其改革发展的新要求。

教育评价因应时代发展。不同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决定了教育的目标、地位和作用，继而决定了教育评价的理念、价值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国家对创新的需求、对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教育评价体系，对于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进一步释放创新潜能、激发人才活力，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

面对时代之需、国家之需、民族之需，高校必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先行先试、善作善成，

深入探寻符合一流大学建设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科研创新规律的综合评价体系，努力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作出适应性变革、引领性变革。

2021年4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希望学校“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厦门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领航，抓住“人才”这一关键，依靠“学院”这一主体，锚定“创新”这一靶向，探索推进人才、学院、创新“三位一体”教育评价改革，不断激发办学活力，努力开创新百年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局面。

### **一、为激发人才活力架设“立交桥”，推动人尽其才、人尽其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sup>[1]</sup>。高校是人才重要汇聚地，人才是一流大学建设的第一资源。高校应切实担负起国家建设世界人才中心的重任，努力打造一流的人才发展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一流生态。如何用好评价“指挥棒”，激发各类人才活力，是新时代人才评价提出的新问题。

厦门大学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关注人才发展多样性，逐步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让各类人才实现成长有通道、发展有空间，有效发挥人才集聚效应。

1. 架设人才并轨立交桥。“唯帽子”的人才评价导向脱离了人才计划实施的初衷，与新时期的人才发展理念背道而驰，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为推动人才“帽子”回归学术性、荣誉性，学校重塑人才评价标准，重构人才发展体系，以内外并轨、文理并重、梯次递进、全程激励为原则，逐步完善以讲席教授、南强特聘教授、南强重点岗位教授、南强青年拔尖人才等为主体的卓越人才体系，使做出同等业绩的无“帽子”人才亦能得到同等支持、享受同等待遇，扭转简单以“帽子”确定薪酬待遇、

配置学术资源的倾向，推动实现有“帽子”和无“帽子”的人才同台竞技，营造各类人才竞相成长发展的积极生态。学校不断完善评审体系，对于无“帽子”人才，在评选过程中引入代表作专家评审制度，通过校外同行专家的通讯评审、委托第三方组织会议评审等方式对申报人选进行综合评议，择优确定推荐人选。实施以来，学校有 39 位以非“四青”身份纳入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的青年人才，在支持期内入选国家人才计划支持。

2. 架设人才晋升立交桥。拓宽人才职务职称晋升渠道，对提升高校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动力具有重要作用。更好释放人才潜能，需要破除人才晋升的繁文缛节，推动人才潜心学术、探索创新，引导发现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实现唯才是举、唯能是用。学校坚持以实绩为导向，以“多维”破“五唯”，创造性地建立等效评价，在保持学术水准的基础上，增加可评价成果形式和范围，相较于原有的教学工作量、科研课题、研究成果和获奖等基本评价指标，充分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和教学科研总体要求等，新增教改项目、教学获奖、创新创业、成果转化、咨询报告等业绩等效选项，保障业绩可比性和质量一致性，激励广大教师各尽其能、各建功业。在多元等效评价的基础上，学校架设人才成长“特殊通道”，同等对待相同质量水平的教学成果和科研成果，重视教学工作量以外的教学业绩，以及经费、论文、奖项以外的科研成果和社会服务业绩，为在教学、科研和服务等方面做出特别贡献的优秀人才，建立特别程序申请制度。通过代表作评审、院长特别提名、院士特别举荐或破格聘用等方式，实现择优聘任。2020 年以来，全校共有 27 位优秀人才通过特别程序实现晋升或新聘教师职务。

3. 架设人才流转立交桥。高校是各类人才聚集的场域。人才评价改革的目的是之一，就是不断完善人才流转机制，畅通人才跨系列、跨学院、跨学科流动通道，提高人才流动性，促进人才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学

校秉持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理念，坚持以能力评价人才，不断完善岗位考核评价办法，明确教师系列、工程技术系列、辅导员系列等不同类别人才的发展定位，为各类人才提供更加多元的发展路径。学校推进聘任聘用制度改革，鼓励教师资源在全校范围内充分共享，支持相关学院联合聘用教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对于工程技术系列队伍，不断健全以提供高水平技术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评价机制，推动专任教师系列与工程技术队伍系列互通互转。对于辅导员系列队伍，学校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专任教师岗位中设立“教学为主型”岗位，经个人申请、单位评审、学校审批后可转聘思政课教师。学校还为此类思政课教师架设“教学为主型”转聘为“教学科研并重型”岗位的通道。此外，学校在医学部试点组建人才培养管理团队，探索突破机关和学部、学院的梗阻，打破院系之间的壁垒，畅通人员流动，形成工作合力。

## **二、为激发基层活力创设“权责包”，推动自主评价、自觉发展**

学院是高校的基础教学科研单位，是大学基本职能的具体执行者。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规则是学院为主体的办学模式，如何发挥学院在建设一流大学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基层改革发展活力，是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课题。

厦门大学不断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厘清校院之间的权责关系，赋予学院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坚持上下联动、校院协同，引导学院结合各自学科发展需求、自身发展特点盘活资源，促进资源使用效益最大化，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流大学建设生动局面。

1. 建构“教学包”。人才培养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关乎学校办学声誉和地位。在2006年，学校便启动了一年一度的校内教学评估，形成了常态化的教学质量“年检”制度。在十多年探索实践基础上，学校重新思考教学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新路径，推动校院之间从以评估为驱动向以目标为驱动转变，试行人才培养目标责任制，把目标责任制作



为推动学院不断前行、不断超越的内生动力，推动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学校与各学院就本科教学改革、研究生培养目标任务等，制定目标责任书，为学院量身定做“教学包”。学校通过召开分组预审会、专项推进会等提高目标责任书编制质量，并组织专家开展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划拨改革经费。制度试行以来，促进了学院教学系统的整体性变革，构建了不同阶段、不同教学环节、不同教学岗位的目标责任体系，有效激发了学院教学改革活力。2021年，学校新增4个学科获教育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立项，6个项目入选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60个项目获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立项；全校共有64个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2. 打造“人才包”。人才以及围绕人才的资源配置，是校院之间权责关系的焦点。学院作为人才引育和使用的主体，应当在人才事项上有更大的话语权。学校高度重视发挥学院在引人用人方面的主动权，实施“校院二级、以院为主”的精准引才计划，依托国家、省市和学校的引才政策，面向全球招聘优秀人才。通过举办南强青年学者论坛“请进来”、海外招聘“走出去”、海外引才工作站“建起来”等方式，构建人才引进网络，形成了各类人才互推互荐的合力。学校试点在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A类学科所在学院建立“人才特区”，将年度引才专项经费整体“打包”给学院，赋予学院更大的引才主导权和经费统筹权，更大力度释放用人单位主体单位在人才引育和使用中的动力和活力。此外，学校还试点推进对各学院的工程技术队伍进行校内岗位工资“打包”，推动各学院工程技术队伍优化提升。

3. 实施“绩效包”。绩效评价是完善校院两级治理的关键一环。学校以教师绩效评价考核为切入，按照分权、分科、分类的原则，组织全校各单位制定或修订教师绩效考核评价实施细则，实施教师绩效考核评价“一院一策”，推动教师评价权力向学院让渡，进一步明确各级各类

教师岗位的职责和考评标准，使之更符合学科特色、体现不同岗位特点。分权，即学校管宏观、管大局、管基本，学院管细节、管特殊、管具体。各学院在不低于学校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绩效评价的实施细则，使评价标准充分反映学院发展特点，符合学院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分科，即按照不同学科特点确定相应的绩效评价标准。改变过去只按文理两大类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的做法，在人文与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与生命科学、地球科学与技术等六个学部及艺术、建筑、临床医学等特殊学科制定评价基本标准表，使之更契合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破除“一刀切”的弊端。分类，即针对教学科研并重型和教学为主型岗位分别制定绩效评价标准。以产生最佳业绩为导向，充分尊重教师教育教学和科研创造成果。同时，学校采取以个人或以团队为单位的差异化考核评价方式，着力解决个人和团队相结合的问题，扫除对发展新学科、交叉学科的制度障碍。

### **三、为激发创新活力打造“新杠杆”，推动内核强化、内涵提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sup>[2]</sup>。高校作为国家创新的主体力量之一，不仅要成为开展前沿性、颠覆性创新的策源地，更要成为解决国家“卡脖子”技术突破的攻关地。以“唯论文”为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妨碍甚至扭曲了高校的创新方式，不利于高校真正提升创新能力，高校急需建立能够有效激发创新活力的评价。

“新杠杆”。厦门大学坚决破除“唯论文”和“SCI至上”的科研评价导向，推动完善以质量、水平、贡献为杠杆的创新评价体系，进一步激发师生创新创业创造热情，提升创新内核实力，打造战略科技力量，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1. 突出质量杠杆。质量是科研创新的生命线。质量不是数量的简单堆叠，更不是低层次的重复。依赖科研数量和规模的外延式发展方式，

已经不适应新时代创新发展和现代产业变革的需求。高校迫切需要转变以数量为导向的评价方式，构建以质量为杠杆的评价体系，突出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理念。厦门大学秉持科研创新的质量标准，把开展高质量科研作为评价的出发点，引导教师和科研人员关注质量、关注内涵。学校制定出台新的理工医科、人文社科科研绩效奖励办法，探索分类评价、多元评价，进一步强化科研的能力和质量，鼓励科研人员冲击重大项目，产出重大成果，让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学校加强有组织的科研，积极策划生成重大项目，以大项目、大平台为载体，积极推动科研创新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学校在集成电路、纳米材料制备、疫苗与分子诊断、生物制品、海洋等领域获批建设了一批国家级创新平台和福建省创新实验室。2020、2021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总数连续两年名列全国高校第一，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立项总数位居全国第一。经济学科、海洋学科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基础科学中心相继落户厦门大学，以第一单位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领域12项、人文社科领域18项。

2. 用好水平杠杆。一流大学的创新水平必须是国际水平、世界一流。高校所开展的创新研究、创新突破，其衡量标准不能自说自话，而必须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国际对话，以取得具有国际水平、世界一流并获得国际同行认可的创新成果作为准绳，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展现实力、体现水平。厦门大学始终坚持高水平开放办学，积极支持教师参与高水平对外交流与合作，把取得国际性的重大成果作为评价标尺，鼓励引导教师与国外同行联合开展科学研究，主动参与或牵头组织全球性的重大科学计划，融入国际学术共同体。近年来，学校在能源化学、材料、海洋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创新成果。厦门大学科学家牵头的“全球海洋负排放大科学计划”成功入选联合国十年规划项目，成为碳中和领域我国第一个获联合国批准的国际大科学计划；研发的首个国产宫颈癌疫苗通过世界卫生组织PQ认证，成为第一支由发展中

国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而获得国际认可的宫颈癌疫苗。

3. 强化贡献杠杆。贡献是高校科研创新工作的落脚点。高校一切创新活动，最终都要体现在对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上。厦门大学坚持“四个面向”，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探索构建能够充分体现创新成果的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的评价体系，支持教师产出高质量成果，作出卓越贡献。学校强化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引导支持，出台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组织实施管理办法”，将科技成果转化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教师职务聘任的评价业绩。学校以入选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为契机，让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进入职称评定、岗位聘任、人才评价、绩效考核等评价体系，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推动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近年来，学校在新冠疫苗、新冠病毒检测试剂、长征火箭、冬奥列车等领域产出了重要应用成果、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特别是研制出目前世界上品种最齐全的新冠病毒系列检测试剂，包括六大检测平台的24个检测试剂，取得了46项注册证，已在90多个国家投入使用。

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厦门大学将继续深入探索，大胆实践，坚持破立结合、系统推进，努力构建具有厦大特色的教育评价体系，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贡献“厦大方案”。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 人民日报, 2021-09-29(1).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作者张宗益系厦门大学校长、教授，本文原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9期，第7—10页。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和目录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2022-09-14 来源：教育部

近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新版目录）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 一、请介绍一下目录修订工作的背景。

答：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在高等教育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影响。学科专业目录作为学科专业的制度性呈现，为规模化培养人才、学科专业建设、培养质量评价、学位授予和学位授权审核等工作提供了基本依据。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目录先后有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2011年版等四个版本，这些目录为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已施行10年的2011年版目录及目录管理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主要问题有：一是修订周期过长，对知识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回应不够及时；二是专业学位在目录中的地位还不够凸显，类别、层次还需完善，交叉学科还需稳步发展；三是学科专业设置存在固化、细化等倾向，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型人才培养；四是现有学科专业内涵需要更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学科专业调整工作。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要

求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完善人才培养体系。2021年1月，国务院对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专门对目录修订提出要求。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多次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提出意见建议。同时，按照2009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目录10年修订一次，也需要根据经济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际，修订形成新版目录。

## **二、请介绍一下目录修订工作的意义。**

答：本次目录修订工作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服务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的重要举措。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要靠人才、靠教育。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的主渠道，研究生教育的学科专业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人才供给的基本结构和类型。修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完善学科专业体系，是提升高层次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一招。二是支撑行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行业产业人才需求发生深刻变化，新生学科专业需求不断涌现，对完善学科专业设置提出了现实需求。修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针对性地调整、新增一批学科专业，完善学科专业体系，是集聚人才培养资源并推动关键领域技术突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三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标准学科专业体系的内在需要。学科专业本质上是知识体系的划分组合结果，具有普遍性规律。我国的知识创新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知识体系也在实践中不断加速分化融合迭代，并彰显中国特色。修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更新学科专业内涵，完善学科专业体系，是扎根中国大地，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必然要求。四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体现。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平台和基本单元，是培养单位、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

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修订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完善学科专业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内涵更新、选择更适合、成长成才机会更多、就业去向更准的多样化学科专业选择，是提升教育获得感的具体举措。

### **三、请介绍一下目录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

答：本次目录修订工作的总体思路：一是强化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围绕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际科技竞争的“卡脖子”关键领域、国家发展和治理的薄弱点，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紧密衔接，针对性设置调整一批学科专业。二是尊重学科专业设置的基本规律，核心考察在培养目标、师资、课程、教材、评价等规模化规范化人才培养实践中的科学性、操作性。一级学科设置方面，坚持宜宽不宜窄总要求，突出宽口径，以利于增强学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后劲；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坚持需求导向，突出专业技术能力，强调精准和灵活，以利于增强学生的职业胜任力。三是构建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机制，核心是创新学科专业的组织与建设方式，提升研究生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响应能力，为打造需求牵引的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更有力的学科专业支撑。四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主基调，稳字当头，按照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循序渐进、重点突破的办法推进工作。

### **四、请介绍一下本次目录修订工作的改革举措。**

答：本次修订工作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实现“三并”。一是目录与清单并行，构建“目录+清单”（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的学科专业建设管理新模式。目录是基本盘，突出规范性、普遍性、成熟度，每5年修订一次，以学界业界的共识为基础；清单是补充盘，突出灵活性、创新性，每年动态调整，不求系统性、完整性，着重服务国家重点发展领域和重大需求。二是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并重，改变过去专业学位类别目录是学科目录附表的呈现方式，把两个单子“并表”，将主要知识基础相近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统筹归入相应学科门类，凸显两种类型人才培养同等重要，进一步强化了两类人才的培养均须把创新能力摆在突出位置的要求。三是放权与规范并进，进一步放权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同时明确各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规范程序，加强对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监管，不能保证建设质量的坚决予以退出。

## **五、请介绍一下目录修订工作过程。**

答：目录修订工作于2021年2月启动。目录修订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主要工作程序有：一是系统梳理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以及有关部门、两会代表、学位授予单位、科研机构 and 专家学者对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意见建议。二是组织召开工作部署会，广泛动员研究生教育战线的学位授予单位、学会、科研机构专家参加，启动部署了目录修订工作。三是按照学科领域成立7个专家论证组，对各方提出的近270个学科专业设置建议进行了深入论证，累计召开论证会300余次，参与专家近3400人次。四是在分领域调整建议基础上，组织跨领域的专家研究形成目录征求意见稿，多次召开会议征求各方意见，书面征求了有关行业部门、地方、“双一流”建设高校等近200家单位意见。五是教育部专题研究后，提交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审议咨询。六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通过。

## **六、新版目录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答：新版目录有14个门类，共有一级学科117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36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31个。主要变化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体现了优化发展专业学位、支撑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所有门类下均设置了专业学位，新设了气象、文物、应用伦理、数字经济、知识产权、国际



事务、密码、医学技术等一批博士或硕士专业学位类别，将法律、应用心理、出版、风景园林、公共卫生、会计、审计等一批专业学位类别调整到博士层次。二是加强了对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支撑。新设智能科学与技术、遥感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法医学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并对部分一级学科进行更名。三是更好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新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区域国别学等一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四是加强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科专业支撑。根据艺术类人才培养的特点，重点对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及专业学位类别设置进行了调整优化，在原有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基础上，设置了艺术学一级学科，包含艺术学理论及相关专门艺术的历史、理论和评论研究，另设置了音乐、舞蹈、戏剧与影视、戏曲与曲艺、美术与书法、设计等6个博士专业学位类别。五是进一步推进分类培养。本次修订在统筹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强化了对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类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础支撑，也是夯实分类培养、分类发展基础的重要举措。

## **七、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有哪些重大变化？**

答：学科专业设置与管理将实行放权与规范并进的目录管理新机制。主要举措有：一是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体系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二级学科与专业领域三个层级，统筹设置、调整与管理。二是坚持高起点设置，高标准培育，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实行先探索试点、成熟后再进目录的放管结合新机制。三是对学科门类的设置与调整、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命名规则、编码规则、设置条件、设置程序、编入目录等作出明确规定。四是缩短目录调整周期。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修订周期缩短为5年，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和专业领域每年定期统计发布。五是建立

了调整退出机制。规定了学科门类的调整程序、试点设置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的撤销程序、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退出目录的程序和要求。

## **八、请介绍一下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及其管理办法。**

答：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是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加强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学科专业建设模式的创新，引导推动学位授予单位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培养国家急需领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清单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以问题导向型的目录外学科专业为主，重在快速响应需求，每年动态调整。清单将另行下发，依规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做好实施工作。

## **九、下一步的工作考虑是什么？**

答：新版目录将于2023年启用。为做好新版目录与2011版目录的平稳衔接，主要工作安排有：一是关于完善专家组织。根据学科专业调整情况，采取新设、转设、归并等方式，对专家组织进行调整完善。二是关于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按照托底、保质的原则，制定专门工作方案，平稳开展学位授权点对应调整工作。三是关于完善学科专业有关工作标准。组织专家编写或修订完善学科专业简介、学位基本要求、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核心课程指南及学位论文要求等工作标准。四是关于与研究生招生工作的衔接安排。根据学生备考和招生工作实际，今年下半年启动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仍按2011版目录执行，2023年下半年启动的新一轮研究生招生工作将按照新版目录执行。五是关于在校生及今年下半年启动招生、2023年9月入学研究生的安排。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这些研究生的培养仍按原学科专业执行。六是关于学位授权审核工作。2022年的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仍按2011版目录执行，2023年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学位授权自主审

核工作及新一轮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将依据新版目录开展。七是关于与现有重大建设项目的衔接。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名单，建设学科名称依据的是2011版目录。为保证政策连续性，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按照已公布的建设名单继续推进。在此过程中，我们将要求各省级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单位结合本区域、本单位实际，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切实保障师生利益，严格做好过渡阶段的各项工作衔接。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209/t20220914\\_660966.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209/t20220914_660966.html)

# 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引领学科专业目录调整

李立国

学科专业是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的基本依据，是高等教育的核心支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学科专业是现代大学的立学之本、教学之范。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与优化关系到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关系到教育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协调，关系到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也关系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与协调。培养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是否合理。科学设置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优化结构、提高质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基本保证。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需求及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是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体现。学科专业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划分，既体现着人类知识发展的成果与知识逻辑，也体现着经济社会变化的需求与社会逻辑，学科专业的设置是两种逻辑的辩证统一。学科专业设置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变化的外部需求和知识增长的内部需要，开放灵活地调整学科专业，既能够实现学科专业自身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才。

近10年，我国调整人才培养类型，进一步加大大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规模，特别是加快发展了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满足了经济社会各领域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面向国家战略需要，2021年超常规布局集成电路、公共卫生等人才培养专项，采取专门措施加强中共党史、考古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急需学科专业建设。这些都是以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的生动体现。

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但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若干重大现实问题与挑战。面对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及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的新挑战，必须坚持以经济社会需求为导向引领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推动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类型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促进高校办出特色，培养更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面向经济社会需求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要构建优化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的长效机制。一是坚持学科设置的科学性与适应性的辩证统一。在一级学科设置方面，应坚持宜宽不宜窄的原则，突出宽口径，以利于增强学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后劲；在专业学位类别设置方面，突出精准和灵活，以利于增强学生在实务部门工作的职业胜任力。二是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进一步放权学位授予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同时明确各单位自主设置学科专业的规范程序。三是建立并逐步完善“奖优退劣”的激励机制，提高学科专业设置的质量，促进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四是根据不同时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产业调整、就业岗位变化等情况，健全专业预警机制。建立学科专业调整与毕业生就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的联动机制，使“入口”与需求和使用相匹配，提高学科专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五是适当压缩学科专业调整周期。目录修订周期过长，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回应不够及时，可由原来的10年调整为5年。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科专业目录调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必须遵循知识增长规律与教育教学规律。学科是学者在解决人类共同的科学问题与实践问题中，逐步形成了新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这才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形成。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过程，是知识增长水到渠成而非人为设计的结果。学科专业不是简单的人为设计，更不是由某些部门、机构或者个体所决定的，不能把行业人才需求简单等同于学科专业设置，更要坚决反对为了个人或小群体利益而人为设计和规划所谓的“学科专业”。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原文刊载于《中国教育报》2022年9月13日第3版新闻栏目。

# 解放思想 前瞻视界 谋划发展 规划未来

责任编辑：孙宏健 赵林记

地 址：宝鸡市高新大道1号高新校区

邮 编：721013

电 话：（0917）3566128

邮 箱：bwlfgc@163.com

更多精彩，请点击<https://fzghc.bjwlxy.cn/>